

# 临沂城市名片

LINYICHENGSHIMINGPIAN

- ① 全国双拥模范城市
- ②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 ③ 全国红色旅游重点城市
- ④ 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市
- ⑤ 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先进地区
- ⑥ 中国市场名城
- ⑦ 中国地热城
- ⑧ 中国书法名城
- ⑨ 国家园林城市
- ⑩ 国家环保模范城市
- ⑪ 国家卫生城市
- ⑫ 国家森林公园城市
- ⑬ 全国水生态文明城市
- ⑭ 东夷文化发祥地
- ⑮ 战争年代华东暨山东解放区首府



2018 · 10 · 5

主 办：临沂市地方史志办公室  
编委主任：常红军  
编委副主任：周俊献 刘志强  
编委委员：段 洪 唐少清 于 芹  
          王卫东 王友存 朱洪厂  
          祁桂菊 朱文江 陈永亮  
          高仲平 刘相尚 巩祥军  
          刘 露 公 鑫 张玉杰  
          崔 平 杨晓莉 肖功江  
          徐田宁 杜 帅 徐希冕  
          张艳华  
主 编：刘志强  
副 主 编：段 洪 曲文军 王纪明  
          呼国英 高 雷  
执行主编：呼国英  
责任编辑：杜 帅 宋希芝  
美术编辑：胡拙安  
法律顾问：山东今海瑞律师事务所 刘海亮  
编辑出版：《沂蒙史志》编辑部  
刊 号：（鲁）1310012号

# 目 录

## 【本期特载】

万里的沂蒙情结  
——记万里视察临沂地区 刘振本 04

## 【峥嵘岁月】

鏖战齐鲁（一） 吴瑞林 07  
这是我们的海岸 李宝贵 12  
鲁中斗争片断 邓久武 18

## 【名人素描】

抗日名将马保三 博 雅 21  
晚清著名学者赵嘉肇 赵 炯 25

## 【文化掇英】

铿锵豫剧进沂蒙  
——忆我的父亲、原临沂地区豫剧团团长刘瑞堂 刘云霞 29  
东夷及其文化发展 中国年鉴 32

## 【史海撷萃】

萧鸾杀诸王篡位记 刺史/藩王 36

## 【探索发现】

英雄连长张文祥 高 雷 39

## 【蒙山沂水】

《沂州府志》与蒙山蒙顶茶 丁富强 44  
大美新临沂之——蒙河 本 编 48

## 【文史论坛】

关于抗战时期刘少奇同志一行在山东若干史实的考证

王晓华 49

## 【影像沂蒙】

抗战初期的鲁南百姓（上）

大荒堂主 56

## 【诗画赏析】

智永及其《千字文》

城视牛人 58

## 【史料辑存】

战争年代的鲁中地区兵工事业

吕有礼 61

## 【百家渊流】

山东世家大族的南迁（上）

国家史册 65

## 【文明之星】

三代乡医的暖心故事

邵鲁文 69

## 【沂蒙名医】

“握虎”之回春妙手

——记王德强

刘凤才 72

## 【史志动态】

80

封面：蒙河

（详见本期《大美新临沂之——蒙河》）

封底：人之于文学也，犹玉之于琢磨也。

选自《荀子·大略》 胡石/书



地 址：临沂市北京路17号  
行政服务中心655室

邮 编：276000

电 话：0539-8727562

邮 箱：yimengshizhi@163.com

网 址：<http://www.linyisq.gov.cn>

《沂蒙史志》栏目

印 刷：济南黄氏印务有限公司

印 数：2000册

发送对象：临沂市史志系统内部

# 万里的沂蒙情结

——记万里视察临沂地区

刘振本



1985年11月，万里同志在沂蒙山革命老区时，群众拿出自产的花生招待他

1985年11月8日到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万里视察了临沂地区，同行的有国务院秘书长陈俊生等，山东省副省长马世忠全程陪同。

11月8日下午7时许，万里由曲阜来到临沂。一下火车，顾不上休息，连夜听取了临沂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远东的汇报。汇报中谈到，临沂地区是革命老根据地，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有20多万人参军，有上百万人支前，有3万多人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建国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但由于自然条件差，经济底子薄等因素制约，与先进地区相比，差距很大，而且很不平衡。特别是6个山区县，到1984年还有171万人口人均收入不足150元，温饱问题还未根本解决。

万里听了汇报后说：“你们执行中央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是好的，成绩很大。有些问题，特别是老区问题，解决得不快不好。沂蒙山区不仅对

万里，山东东平人。193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东平县做地下工作，历任东平县委书记，泰西地委宣传部部长、组织部部长，鲁西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冀鲁豫二、七、八地委副书记、地委书记。1947年后，任冀鲁豫区党委委员、秘书长等职，多次往返沂蒙山区，1949年夏离开山东。

山东，而且对中国革命的贡献都是很大的。战争年代，群众参军参战，踊跃支前，吃糠咽菜，省下好粮食供给部队，现在这些地方有的群众还吃不饱，穿不暖，我心里不安。对这些人我们要是忘了的话，就是忘本。我们现在住着高楼大厦，老百姓还挨饿，对得起对不起啊！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叫群众观念，老百姓的语言叫作良心。我看良心还得讲上点吧！一个执政的党，如果忘了群众，那就是大问题。什么叫坚持马列主义？反正没有这个，就没有马列主义。为什么今天晚上谈这个事情？耀邦同志回去讲了（在此之前，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两次来临沂视察），胡奇才同志（原工程兵司令员）又专门和我讲了一下。我还看了一个材料，有的群众没有水吃，水里面含氟过量，心里实在不是滋味。这些问题不解决不行啊！我们过去没有条件，现在可以解决了嘛！这次我来，除了看石臼港，就是看看这个问题解决的到底怎么样了。后天我走的时候，要看看山区、库区。我身体本来不行，还是要走一圈，从孟良崮一直看到莱芜。沂蒙山区这个问题要当成一个大的政治问题，不是一般的贫困户的问题。因为这里的功劳太大了，沂蒙山区对我们国家的贡献太大了，这个问题可要注意啊！北京怀柔县，我表扬好几次了，也是老山区。县委县政府住的地方，本来决定要修，可到山区一看，便觉得不能修；到老区一看，还是不能修。四年了，还是住老地方。中央关于加强教育的决定下来后，县委的房子还是没有修，把钱修了学校。现在就要这种精神。什么时候把老区的问题解决了，中央心里也安定了。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坐在北京也坐不安定，住在中南海就想到这里。这个问题到了彻底解决的时候了。不能再等待了，就是3年解决也不算快。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再过3年就10年了，还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抗战8年，解放战争3年，一共才11年。现在是有条件，不是没条件。石臼港修起来了，兖石铁路也修通了，这些给你们创造了一个发展经济、尽快富裕起来的好条件。对这一点，你们认识了没有？觉悟了没有？早认识，上得快；觉悟迟了，就要误大事。各级党委和政府对于贫困山区问题，一定要引起高度重视，克服官僚主义，树立群众观点，采取有力措施，一年狠抓几次，在两三年内彻底改变贫困山区的面貌。”

当远东汇报到山区基层领导班子老化问题突出，一些老党员还在领导岗位时，万里说：“那就糟糕了。这些老同志打仗很好，支前很好，过去领导生产也很好，现在大部分不行了，好多同志不适应了，这个问题不解决，老区上不来。在太行山区发现了，在河南也发现了。革命老根据地，我们的老同志、‘老土改’有的跟不上了。有个老党员70多岁，没牙了，他一个党员也不发展，一个个都看不惯，都不够党员条件，只有他儿子差不多。就是对那些青年，有创业精神的能工巧匠，想发财的，都看不惯，都不够党员条件，这是很典型的例子。这个事情中央都解决了，你地区还解决不了？要高初中文化程度的、能工巧匠当道，不这样，你们这个村建设不起来。首先对农村老干部先大大地记一功，把历史上的功劳充分加以肯定。然后，就是赶快让位，挑选能干四化的上来。你的历史任务完成了，非常光荣，给予高度评价。要做这个工作，不做这个工作还不行哩！这个工作必须做，而且必须做好，老干部他可是有功劳的。百万雄师下江南，他有功劳，功劳大得很。这些要充分肯定，生活上加以照顾，不能低于中等水平。听说你们有个政策，老支部书记搞退休待遇，这个政策好，山东需要有这么个政策。你们这里老干部、老党员、军烈属多。我后天走的时候，在路上要拜访几户，我亲自去拜访，到军烈属、老区的支部那里去看看，他们的贡献大喽！”

11月9日，万里视察日照市石臼港，同国务院有关部门，省、地、市和港口的同志一起，研究讨论了石臼港和日照市的建设发展问题。万里同志指出：“石臼港要坚持向综合性发展的方向，千方百计加快杂货码头建设，扩大港口功能，提高综合经济

效益，还要尽快把岚山港利用起来。港路建成后，对地方经济的发展是很有利的，要充分利用这个好的条件，发展铁路沿线和港区周围的工业，并注意产品深度加工。现在万事俱备，只少人才，要注意人才的培养，加快沂蒙山区经济的发展。”

11月10日上午，万里从临沂回济南的途中，还听取了中共沂南县委书记辛允岩和中共蒙阴县委书记解植义的工作汇报。之后，万里瞻仰了孟良崮烈士陵园，访问了蒙阴县桃墟乡金山村。在访问农户时，万里亲眼看到有的农户至今还盖着35年前的被子，吃的还大部分是地瓜干和没有油的煮白菜，心情十分沉重。当群众得知来探望的是中央领导同志时，一位军属老大爷说：“感谢共产党，感谢人民政府对我们的关怀！”一位老大娘一定要把家中仅有的一点炒花生送给万里。万里十分激动地说：“这些花生是最宝贵的礼物，我要把它带回北京，带到中南海去。”他向随同的同志们说：“你们看老区人民对党的信任没有变，多么好的人民啊！”万里问一些群众：“如果给你们汽车能搞运输吗？附近有水库能养鱼吗？”大家回答：“我们都能干，就是没有钱。”万里说：“生产门路多得很，我们给你们创造好条件。”

11月10日上午11时许，万里离开蒙阴县。回济南后，万里向省委、省政府的负责同志再次强调了关心老根据地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问题。他说：“我这次来，走的这一路，有两点感受：一是变化很大，成绩很大，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发生了很大变化；二是有些问题早该解决，但没有解决。确实有些贫困的山区和库区，应该很快改变那里的面貌，‘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要在两三年内发生变化。沂蒙山区对全国人民的贡献是很大的，山东人民对全国人民的贡献也是很大的。我这次看了孟良崮，我军曾在那里消灭了张灵甫的王牌师，当时要消灭他们，没有几倍的伤亡是不可能的，山区人民作出了很大的牺牲，功劳很大。老区、库区必须用有效办法，在两三年内彻底解决问题。办法多得很，因为我们经济搞活了。为什么不可以帮助他们搞交通运输？为什么不可以帮助他们搞第三产业？为什么不可以到高、初中生中招点工？可以搞集体企业，也可以当煤矿工人。支援贫困地区的办法多得很，你们这么一个大省，只要注意一下，不难解决。关键问题是思想问题，认识问题。”

万里视察临沂后，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临沂地区被列为全国十八个连片贫困地区之一。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和省直机关开展了对口扶贫支援，中共临沂地委、临沂行署从此带领全区人民展开了长达10年的艰苦奋斗历程。到1995年，实现整体脱贫。

# 鏖战齐鲁 (一)

吴瑞林



延安宝塔山

## 一、延安吹响的号角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炮声震撼了东亚神州，更震撼了中国革命圣地——延安。

这时，我正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这个党校由原中共中央党校和红四方面军党校于1936年10月在陕北定边合并而成。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我作为从红四方面军出来的一名年轻干部，一直在这里学文化、学政治、学理论。1937年1月，党校从定边迁至延安桥儿沟，我继续学习。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即发布通电，号召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中华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驱逐日寇出中国！

“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要“武装保卫平津华北！”要“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这正义凛然的声音，像枪炮里的撞针，强烈地撞击着我们每个共产党员、红军战士一颗颗火红的心。党中央向我们吹响了奔赴战场的号角，每个学员纷纷请缨杀敌，誓与日寇决一死战！

“到敌人后方去！”成了我们当时最响亮的口号和最坚定的愿望。在小组讨论会上，我首先举手发言，报名响应，坚决要求到敌人后方去。会后，又向教务主任成仿吾同志提出了这一要求。第二天，见到校长董必武同志，他把我叫住：“小吴，第一个响应中央号召的是不是你呀？你带了一个好头。第二个报名的是陈庆先同志，其他同志也都报了名。你们高涨的爱国热情和坚定的抗日决心，值得称赞。我准备把你们的情况报告党中央和毛主席，你们等着组织的安排吧。”他那慈祥的目光注视着我，又严肃嘱咐：“在组织作出具体安排之前，还要继续安心学习，认真理解、掌握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充分作好到全国去开创新局面的思想准备，要服从组织决定，听从党中央的统一指挥。”董老的关怀和教导，给了我莫大的鼓励，也给我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日本侵略军继侵占平津之后，又于8月进攻上海，威逼南京。国民党当局迫于形势，同意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并实际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员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我们的红军主力部队随即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所辖第一一五师、一二〇师、一二九师相继从陕西出发，向华北抗日前线挺进。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一一五师分别以吕梁山、恒山为依托，在晋西南和晋东北实施战略展开，并以一部由晋东北逐渐向太行、太岳山区南移；一二〇师以管涔山为依托，在晋西北实施战略展开；一二九师以太岳山为依托，在晋东南实施战略展开。毛主席将三个师展开于敌之侧翼及后方，对以重兵进攻山西夺取太原并威胁平汉线和豫鲁之背进而夺取华北五省的日军，构成四面包围的战略态势，是极其英明的。不论在钳制日军、援助友军方面，还是在扩展回旋余地发展自己、创造敌后抗日根据地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这时，董老遵照党中央的委托，已赶赴武汉工作。行前，董老通知我，不是要我去敌后，而是要我准备去苏联学航空，叮嘱我一定要服从组织安排。

不久，华北的抗战局面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党正面战场，虽然广大爱国将士对日军的进攻进行了英勇的抗击，但由于蒋介石集团执行片面抗战路线和消极防御方针而节节败退。卢沟桥事变后不到4个月，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就结束了，而“以共产党员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在江浙，国民党的战线亦“已被击破”。

在这种形势下，我参加了一次较小范围的会议，有幸聆听了毛主席的讲话，令人感奋，深受鼓舞，至今仍记忆犹新。“我们这支队伍，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是大浪淘沙淘出来的，是千锤百炼锻炼出来的。”毛主席说，“一、二、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都是这样出来的。我必须告诉同志们，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都是好同志，党中央是信任他们的。对三个方面军的干部，都要一视同仁。”毛主席接着说：“现在，我们这支队伍只有四五万人，数量上比过去是减少了，但可以一当十、十当百、百当千、千当万！目前的形势，要求我们担负更重大的责任，我们这几万人的队伍，在抗战中要起超过几十万几百万人的伟大作用！我说这个话，有同志现在也可能不相信，我们能起这样大的作用吗？同志们，只要我们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打到敌人的侧翼和后方去，放手动员组织千百万群众起来抗日，独立自主地实行游击战争，发展和巩固抗日根据地，事实就会出来作证，你们就会看到这种作用的。”毛主席又讲：“但我们若是老在延安这个山沟沟里待起来，革命事业是得不到大发展的，同志们也是得不到大发展的。现在，我们的八路军打出去了，还打了胜仗，同志们也要跟着打出去。你们一旦打到敌人的侧翼和后方去了，就会看到事情的真相，看到群众是多么盼望你们。只要同志们说声‘我当过红军，爬过雪山，过过草地’，就会有人跟你们一道当红军，领导水平高些的同志就会拉起几千人的队伍，



水平低些的同志也会拉起几百人的队伍，不愿当亡国奴的人民就会学着你们的样子干，跟着你们一道抗日。你们看，我们这个队伍不就成了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的浩浩荡荡的大军了吗？”毛主席还风趣地说：“许多同志现在还是单身汉吧？不要紧，敌后有的是漂亮的女学生，你们去了，只要干得好，你们每个人都可以在那里找到称心如意的伴侣嘛！”这一席话，说得大家都乐了，一齐报以热烈的掌声，个个兴高采烈，信心十足。

这次会后不几天，中共中央组织部挑了一批同志作为飞行员人选派到苏联去学习航空技术。陈云同志根据董老曾经提出的名单，决定由我带队前往。当我们一行抵达甘肃兰州准备继续西进之际，适值控制着新疆军政大权的盛世才正在制造捕杀异己的暴力事件，形势紧张，交通被阻，我们只得返回延安。这时恰逢郭洪涛同志要带一批干部去山东敌后，因为中共山东省委在1937年底至1938年初日军侵占山东时，领导人民举行了遍及全省的抗日武装起义，建立了近10支人民抗日武装，为建立巩固的山东抗日根据地，使之成为联结华北和华中敌后战场的重要战略枢纽。党中央同意山东省委的请求，决定增派干部前往加强省委的力量。我立即向中央组织部请示，恳求随郭洪涛同志去山东，获得批准。于是再次告别延安，登上了奔赴山东的征程，决心遵照毛主席当时教导的，要像杨柳一样随地生根成长，要像松柏一样到处挺拔坚强！

## 二、东进途中

凌晨起来，按照统一要求，我整了行装，一切准备就绪。日历牌上指着：1938年3月8日，国际劳动妇女节。这是一个不易忘却的日子。我怀着一种复杂的似乎又有些矛盾的心情等待出发。从长征进驻陕北到这时虽只有一年多的时间，然而，延安已如一座丰碑巍然矗立在我的心目中。想着在这段时间里直接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谆谆教诲，一旦要离开这革命圣地，真有点舍不得；也正是因为想着这些教诲，为了延安，为了党中央和毛主席，为了中华民族和全国人民，一颗要去远征敌后的战士的心，又如箭在弦上。吃罢早饭，我们一百余人坐上3辆大卡车，由郭洪涛同志带领向西安进发。



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

路经洛川住了一夜，第二天到达西安。这是我们从延安东进的第一站。大卡车直开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门前，我们一行人就住进了办事处的几间房子里。因为人多，打地铺，睡起来还得头顶头、脚抵脚，虽然拥挤，却很亲热。大家自觉地遵守纪律，不随便逛大街。特别是由于国民党第十七军团胡宗南的部队从鲁南台儿庄前线撤回以后，他的总部就设在西安。我方为了避免发生意外事故，根据驻西安的中共中央代表林伯渠同志的交待，我们都只在指定的范围以内活动。这时国共两党虽然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但蒋介石并未放弃其“防共”“限共”的反动政策，我们不能不保持警觉。这次我们到山东敌后，是以八路军一一五师游击队的名义去的，要向国民党当局办理证件和佩章，取得合法手续，以免沿途麻烦。就在这个问题上，国民党当局一拖再拖，我们一直等了20多天才办好。至于联系乘火车的事，更是难上加难，一延再延，我们只好耐心等待。

在此期间，没有料到我们党内竟有人趁我们进入梦乡的时候，“演奏”了一个“小插曲”。4月中旬，我们得知张国焘背着中共中央，以祭黄帝陵为名离开延安，经西安叛逃到武汉，投靠了国民党特务集团。我们这一批东进的干部，除了郭洪涛、霍士廉、王文、王海山等几位同志，其他多数同志都是原红四方面军的干部，都曾深受张国焘的迫害，尤其是经过1937年春冬两次开展的反对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斗争和教育，大大提高了识别“左”右倾错误的政治思想水平，早已看清了张国焘所犯的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反党行为等错误的严重危害，对他最后堕落为可耻的叛徒更是嗤之以鼻，个个义愤填膺，有的同志还自告奋勇要去把他捕获归案。林老便以张国焘这个反面教员作教材，及时对我们进行政治思想工作。钱钧、杨国夫和我，是我们这一行人中曾在红四方面军担任过较高职务者，林老就首先找我们谈话。“小吴，你对张国焘逃跑怎么看呢？”他首先问我。“张国焘是我们党的叛徒，革命的逃兵！他叛党投降当特务，是他的右倾机会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我过去在他的错误路线危害下吃尽了苦头，几乎被他杀掉。通过党校学习，早已从思想上彻底同他划清了界限。他的叛逃，无损于我们党的一根毫毛。”我回答说。接着，林老又询问了钱钧、杨国夫同志。他们也都表明了自己的坚定立场和原则态度，并异常气愤地说：“他能逃跑，我们就不能去把他抓回来？！”林老听后笑着说：“他已经钻进了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人家把他当宝贝藏起来了，现在是抓不回来了，就让他去尝尝当特务的滋味吧！”并鼓励我们：“你们谈得很好，态度鲜明，政治思想觉悟高，都是好同志，红四方面军的同志都是好同志，党对红四方面军的同志是一视同仁的，祝你们到敌后的抗日战场上建功立业，做出丰功伟绩来。”

这次谈话后的第二天，我们东进的手续才办齐全，领到了新军衣，经西安“八办”交涉，西安铁路局拨给了我们两节“闷子车”，总算能向山东进发了。提起火车，我们不少同志还从未见过，有的过去偶尔见过，却没坐过，曾惊奇地说是“洋房子跑了”。这“闷子车”，我们都管它叫“闷罐子车”，原是国民党运士兵或牲畜的专用车，这次拨出两节运送我们八路军的百余名中高级干部，不知是被尊称为“蒋委员长”的蒋介石“另眼相看”，还是西安铁路局的“特别关照”，我们一概不作计较，只要能尽快到达山东就好。本来我们这批人就像《水浒》里的戴宗式人物，几乎都曾经靠自己的两个脚板走过了千山万水，至今还保留有厚厚的老茧。若是凭脚板，从西安经河南入山东，约六七百公里的路程，我们延误在西安的月余时间足够我们轻轻松松地走去了。但事已至此，既然有了这“闷罐子车”可以挂在“洋房子”屁股上跑，总比我们的铁脚板快得多，又何乐而不为呢！当我们接到通知赶到车站时，“闷罐子车”里的牛马刚刚从车上赶下来，车里遍是牛屎马尿，腥臊气味熏天。见到此种情景，郭洪涛同志号召大家一齐动手。不多一会，我们便把车内打扫得干干净净。

100多号人，每人都带有行李包，加上郭洪涛同志备用的物件和其他一些同志在西安买的大锅饼、大烧饼等，把两节车厢挤得满满的，人挨着人，勉强地坐了下来。火车穿过渭南的山山水水，越潼关，经洛阳、郑州、开封进入山东曹县的柳河车站（现属河南省），就到了我们的目的地。按正常速度一天时间即可到达，而我们乘上的这趟车一路停停站站，竟然坐了两天两夜。实在困倦了，同志们就互相照顾，有的站立一阵子，让别的同志躺下稍微歇息歇息。如此轮换，减轻疲劳。然而，大家的情绪却十分饱满，意气也特别高昂，一路上欢声笑语，歌声不断，《大刀进行曲》《抗大校歌》《工农兵进行曲》《游击队之歌》《黄河颂》《黄河谣》等等流行的革命歌曲，都被我们唱遍了。列车上的许多乘客，沿站的众多群众，听到我们的歌声，看到我们军容整齐，纪律严明，不像国民党的许多官兵那样骄横放纵，都流露出惊喜的神情，有的还在那里议论：“他们是毛泽东、朱德的红军！”“不，过去是红军，现在是八路军了！”这些异乎寻常的反响，显示出广大人民群众从内心里是多么欢迎我们啊！

我们这批到敌后的人每人每日有5角钱的伙食费。车一到站，只要停的时间长，我和钱钧、周赤萍、何光宇等几个单身同志就下车活动活动，呼吸点新鲜空气，了解点站内情况，并用仅有的几角钱买点热面食吃，大有收获。车到潼关，要停两三个小时。下车后，发现离车站不远的地方，挂着一个“军人接待站”的牌子，我们几个人就进去打听了一下情况。据接待人员说，这是专门为接待过路军人而设立的，吃饭住宿不要钱，只凭证件签字具结，接待站即可报销。当时正好遇上吃中饭，我们也感到饿了，就凭证吃了一顿蒸包，喝了一碗豆芽汤。经接待人员允许，我们还带了几个包子带回给车上的病号吃。潼关这个险关要隘的古战场，出产著名的酱菜、酱蒜，我们也顺便买了一些带给车上的同志们。郭洪涛同志一尝，说味道好，便要我们又去买了两篓。洛阳也设有这样的接待站，我们又和另外几位同志也凭证去吃了一顿。郑州位于平汉、陇海两铁路的交叉点，台儿庄战役胜利后国民党当局调兵遣将，这里车多人杂，秩序混乱，虽然停车五六个小时，我们都只在站内守候。列车在开封站没有停多久，我们盼望的目的地曹县柳河就要到了。

4月下旬，当我们到达柳河车站时，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长、代表省委领导鲁西北和鲁西工作的张霖之同志早已派来三辆大卡车在站内等候接我们。郭洪涛及其夫人史秀云同志，白备五及其夫人曼云同志，以及霍士廉、王海山同志，分别坐在汽车驾驶室里，带领我们向曹县进发。

# 这是我们的海岸

李宝贵

## (一)

在山东黄海之滨，有一个不上千户的小镇子，名叫安东卫。它背向九佛山，位扼海（头）青（岛）路，面对连云港。是日伪的滨海重地。

1945年5月上旬，我滨海区二十三团二连，为了配合军区主力的全面反攻准备，在这个小小的集镇里与日寇千余之众，血战了整整一个昼夜。

5月6日傍晚，我二连跑步来到安东卫西南两里之隔的李庄。这里地势平坦，视界开阔。远处，那茫茫的黄海，海雀似的蓬船；近处，那滨海渔村、盐田、苇塘一一在目。

全庄有四五十户人家，庄内瓦房草房夹杂，院墙环绕；庄外麦地葱蔚。



安东卫连

我们赶到这里，已经是午夜两点了。指导员钟家全同志领着我们几个排长勘探了地形，分配了任务。鸡鸣拂晓，火红的太阳从空阔的海域里露出了半边脸来，指导员指着村北院墙外的一段水沟土坎对我说：“李宝贵，支部决定把你们排放在这里，怎么样？”

指导员是个很重视历史荣誉的人。他常对我们说：“咱二连是老红军，打过硬仗，走过苦路，刺刀见得红。我们要保持长征时的优良传统。”因此，连队战士都觉得自己是老红军连队的战士而感到骄傲。

“二排绝不会丢红二连的脸！”我说。指导员摇了摇头，面容严肃，良久无语。他走近我们排之间，象报告又象批评我：“同志，用丢脸不丢脸来接受党的任务，对一个党员来说，又怎么够呢？根据地的人民流了多少血，流了多少汗，才夺下来沿海几个要点，为我军在山东的大反攻创造了条件。”语音顿止。他严肃地打量着我们，又指着空阔的晨空：“体面和光荣，功劳和荣誉，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是次要的，昨天我已经在团首长面前下过决心：我们红二连是党的一颗钉子，钉在哪里，摇不动，拔不掉，折不断！要和每一个同志都讲清楚，为了全局，为了全区的全胜，我们个人的、全连的小集体的一切，都要拿出来对付敌人，守住安东卫，换取胜利！”指导员的话，激昂之中带着几分急迫、沉重、紧张和不安。我到排里时天已经大亮，战士们一边啃着干窝头，一边讲述着，让识字的“秀才”们给自己写决心书。全排没有一个躺下来休息的，也没有谁把饭吃完。我有点火汹汹地喊副排长：“怎么不叫各班歇歇？”副排长是一个浓眉粗壮、寡言少语的庄稼汉子，他没有答话。战士们一双双热灼灼的眼看着我，有的同志很严肃地擦枪和拧手榴弹盖。

我一切都明白了，便小声地对战士们说：“是好战士好同志，把窝窝头吃下去，然后闭上眼睛，歇一会。”说完，我自己也狼吞起来。

但是，时间已经晚了！西边枪声响了起来。

## （二）

从安东卫涌出来的千余名鬼子，象一头头野牛，与我们拼杀了3个小时，交手9次，李庄依然屹立着。我二连经历了第一次考验。

恶战以后的李庄，已经面目皆非了。墙院、房屋塌倒歪斜着；错纵的沟渠被大炮掘起来，海水泛滥漫流；面前麦地被硝烟熏得焦萎枯黑，塘中的芦苇被弹雨削得根拔腰折；只有几株不怯的老槐，支着遍体的弹伤，和战士们一起傲然站立在李庄之上。

我们沿着沟坎走着，想劝劝那些伤员下去休息，顺便视察一下工事修复情况。我来到了六班，看到高大的副排长谢有山同志。他右臂负伤，还在埋头挖掩体，独手作业，显得有些吃力。他见我来了，便调过身子，把负伤的手遮掩起来。在我们的队伍中，这种“埋伏”我已经司空见惯了。我走上去，拍拍他的肩说：“鬼家伙，放下锹来。枪不响时，你的任务就是休息。”他怔了一下，朝我微笑着说：“你让我在鬼子面前躺下来？那可不成！”谢有山同志是孤身和4个鬼子拼杀而被砍伤的。我不知道如何说服他。此刻，他的眼球全是红的，休息对他来说，是不可想象的。而这样的同志，何尝只是他一个人呢！

六班的刘德胜，还是个刚参军的新战士，他腰伤红肿，剧痛不止。可是他仍然爬来爬去给机枪手送弹药、压弹夹。现在他微笑着看着我。这个地主的放牛娃，在第一次残酷的激战中，面无惧色、伤无呻吟。的确，到现在为止，全排还没有一个走下去和躺下去的。

我拍了拍身上的泥土，掏出小烟袋来，装了满满的一斗烟，送给副排长。他狠狠

地吸了几口，拍着脑门，精神百倍振奋，嘿嘿地笑了起来。我们想利用这个空隙，开个班长、党小组长会议，合计一下尔后的打法。不料，西边“哒哒哒……”敌人机枪响了，响得单调、突然。

副排长站起身来，一拍胸，顿脚大骂：“娘的，毁了！敌人封锁西边的小桥了！”

阵地上所有的眼睛，齐刷刷的投向了小桥，心里都默默的念着，桥！桥！桥！

### (三)

小桥是我二排和连主力的接合部，也是我往返通信、运送伤员和弹药的必经之地，现在为敌人火力控制，我排不得不在此与敌孤立奋战了。如果鬼子直接占领小桥，则我全连的后路势必完全被敌人所切断，而成为三个孤立的小块。

目前，最困难的是没有子弹了。那个受伤的新战士刘德胜在手心上数着五发子弹，拨过来拨过去，又拉开了枪栓，凝神了半天。返过头来探问我：“排长，子弹呢？子弹！”

我望着这位第一次参加战斗的新战士，他还不懂得也不习惯在这样的时候，他应该做什么。我没有回答，也没有办法回答，顺手从脚下捡起一块石头塞给他说：“难道这个不是武器吗？”他眼巴巴的望着我。

敌人的机枪疯狂的啸叫着，同时，西边一排阵地上响起了炮声，滚滚浓烟腾空而起。我抓住副排长的手：“老谢，敌人向一排重点进攻了。”

我们蹲下来，研究对策。决定由我带四班打上去，控制小桥，打敌人的后尾，让进攻一排的敌人返回来。

四班长陈永生同志很是高兴，转身带着8个战士，端起刺刀，拎起手榴弹，向小桥杀过去。

桥头是一帮伪军，见我们9把刺刀，一道道白光，雄赳赳地冲上来，吓得连机枪也扔掉就逃跑了。

我们控制了小桥，一排方向的敌人，遭到我们一阵猛打以后，终于退却了。因为这里不便隐蔽，我告诉四班长，赶紧撤回原地，准备战斗。

我们刚下桥头，迎面便碰到了指导员钟家全。战士们高兴极了，以为连首长一定给我们带来了弹药。便七嘴八舌的问起来：“指导员，我们要子弹，一发也行！”

指导员摇了摇头，朝村子划了个圆圈，带着坚定、激昂的口气说：“同志们，我们被包围了，四面都是敌人，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向上级要东西，而是上级向我们要时间。时间就是胜利。”指导员告诉我们，营里派了三连同志给我们送弹药，但中途都牺牲了。现在的问题，要么是拿战友的血去换子弹，要么是拿自己的两只手去换取胜利。他说：“情况是严重的，可是海岸是我们的，是我们中国人民的。一个党员，一个战士，明明看到胜利就在眼前，自己要去流血流汗，甚至可能看不到这场恶战的胜利。怎么办？退缩？把困难推给上级？不！同志们，如果那样，任何宏伟的理想，灿烂的未来，庄严的口号，都只是幻想，也没有革命的今天和明天……”

钟指导员的一席话，如同猛烈的炉火，在这样残酷的困战中，熊熊地熔炼着每一个人，使一块毛铁去掉杂物，在烈火中成为好钢。刚才嚷叫着要弹药的三个战士，带着自责难言的心情望着指导员，长久站立。战士们纷纷回到岗位上，有的去加修工事，擦拭武器，有的静静地跪在负伤战友的面前，为他们整理绷带，把剩下的一口窝头和壶里的一口水喂到伤员的嘴里。副排长则端着左手，捡起地上的残瓦和石块，送给战士们来当武器。

六班长小刘，这个还带着孩子气的班长，在一块石上“卡卡”地磨铁锹，并朝敌人的方向投去了决以死战的目光。

此刻，钟指导员和我们简略交谈后，正用铅笔在记什么。他是个足智多谋、党性坚定的指挥员。在以往的激战中，他曾代表支部接受过十几名最优秀的工农子弟入党。对自己的要求十分严格。指挥上言语上责任上，一旦有粗心之处，就会再三检查，反复研究，使自己的任何行动，都置于群众和组织的规范之中。刚才小桥一度被敌人控制，他对我说：“战斗打响了，指挥员就要沉着全面。小桥一旦被敌人占领，我是要负责任的。”他转过身去，走到刚才要弹药的那个战士面前，将自己携带的一颗手榴弹，塞在他怀里。战士们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背过脸谁都没有说话。

“收下，打鬼子。但是，打敌人的根本武器还不是这玩意。”说完，他迅速朝三排的阵地走去。

黄海的潮水撞击着海岸，鲁东的苍山良田农舍，在夕阳之下从容而无畏。在怒潮声中，时而夹杂着炒豆似的枪声。副排长喊我：“排长，快来，鬼子又上来了！”

#### (四)

黄昏的战斗达到了沸点。敌人集中了十几门小炮，对我排阵地进行了狂轰滥炸。阵地后面的民房着了火，火舌舔着壕沟，把我们烤得口干舌燥，如置身炉火中。在烟幕掩盖下，100多鬼子突然窜入到我与三排接合部的一间小瓦房。那黑压压的钢盔蠕动着，向我们冲过来。敌人很近了，我想喊一声射击与投弹，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们根本没有弹药了。就连机枪手的弹夹里，也只有五发子弹。怎么办？我们总不能束手等待，看着鬼子冲到战壕里来呀！副排长看着我痛苦的表情，凑过来说：“下命令吧，我们得赶快扑上去，用这个解决。”他摇动着刺刀。

此时，烈火已遍及敌占领的小瓦房。敌人的视线恰好被大火隔断。我们趁机冲进浓烟烈火之中和敌人厮杀起来。鬼子朝屋里退去，六班的4名战士机动灵活，紧随敌人夺门夺窗而入，将敌人追杀到后院。烈火已经舔檐而起，房盖都烧着了，断砖碎瓦哗哗地从上坠落下来。鬼子嚷叫着，要破门突围。战士们用刺刀堵住门口，但是，敌人一个接一个地涌出来，刺刀怎么能解决问题！有的战士习惯性的拉起枪栓。眼看四个身体冒着火焰的鬼子，嚎叫着冲了出来，战士刘德胜拿起钟指导员送的手榴弹打开盖子，但是距离太近，根本没有拉弦待炸的时间。他情急之下，操起手榴弹，对准鬼子的头“卡卡”砸了起来。

屋内的鬼子进行了调整，把两个怕死的枪毙在了门口。随后，一阵乱叫，30多把三八长刺从窗口门缝伸了出来。板壁房柱摇摇欲倒，走廊上火蛇突突，多数战士的衣服也冒着浓烟。我们的立足点处于劣势，歹毒的鬼子想把板壁推倒压住我们，我们干脆冲进去和敌人展开肉搏。为了保住阵地为友军争取时间，谢有山率领7名同志，一手挡住敌人的刺刀，一手拿着燃烧着的木棒冲进屋内，没有弹药有没有弹药的打法，鬼子的枪支此时也使用不起来了。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的火棒在敌人群里旋转起来，满屋火星飞溅刺刀铿锵。有几个鬼子从烧穿了的后墙逃了出来，我命令机枪手射击。战士拉开枪栓两眼直瞪瞪的望着我。我望着屋内烈火中和鬼子搅在一起的战友，心被灼痛着。天近黄昏，外面枪声大作，一匹战马穿火而来，一名手臂胸脯满是鲜血的战士滚了下来，将几个沉甸甸的子弹袋甩给了我，说：“团……团首长……送来的……命令你们坚持……坚持到天黑。”他顽强的将首长的命令传达完后牺牲了。这是营骑兵班李德林同志，和他一起送弹药的共4人，3人已经牺牲在了来的路上。

我含着眼泪，将这血染的600发子弹分给了战士。大家默默的用颤抖的手将烈士

的鲜血擦干。仇恨的子弹射向了敌人，屋内的鬼子逃不出来了。在火战半个多小时，房屋就要被烧塌了，那位新战士刘德胜已身负重伤，他将指导员给的手榴弹，将5名鬼子挤在了门洞上拉开了弦……。副排长谢有山也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 (五)

晚7点多钟，30多鬼子全部被歼灭，而我们全排也只剩7个人。

激战后的夜晚，残火毕剥，天空交织着红绿弹道。我们活下来的7位同志，默默地拾起烈士的枪，在倒塌的房屋前，借着余火的微光挖着掩体。我命令一名战士，骑上刚才送弹药来的马，到营部去报告，感谢首长送来的子弹，并告诉首长，坚强的二排还在坚守着阵地！

我们和连部及一三排已完全失去了联系。更严峻的是，我正面的小桥及沟坎已完全被敌军占领。现在，我排唯一依托的就是跟前的断墙破壁和弹坑了。阵地大大的被缩小了，再往后退一步就是几座零落的房舍和一条直桶式的村路。从枪声里，我们判断连主力已被逼近了村舍，而且一定遭遇到了敌军主力的冲击。虽然按照预定的作战计划，我二排已经完成了守备任务。可连里还没有下达转移命令，此时，谁要是后退一寸，就是对军队的和祖国的犯罪！

于是，我们继续坚守原地。重伤员忍受着剧烈的疼痛无一呻吟；轻伤的战士则紧搂着枪支警惕的随时准备继续战斗。我走到三次负伤的轻机枪手老宋的跟前说：“你应该休息一下，枪由我来操控。”他没有吭声，从绷带下露出鼓鼓的大腿，瞪大了眼睛看着我，并将枪紧紧的抱在怀里，似乎在宣誓：谁都别想从我这里把枪拿走。我无奈的摇摇头，这是我们的士兵，是守卫祖国海岸的不屈勇士！

八点左右，敌人又趁炮击和夜色的遮盖，向我们开始了羊群式的围攻。我们还来不及判断敌人的主要进攻方向，黑压压的日本鬼子已经与我们短兵相接。由于我们的地形的优势，又及时补充了几百发子弹，就和敌军交上了火。冲上来的十几个敌人，被我们消灭了。

正当这时，去连部送信的战士回来了，他一下马就冲着我喊：“二排长，指导员叫你撤！”“撤？”我脑子嗡的一声，暴火怒发。我指着眼前的鬼子，狠狠的反问：“你胡来，传错一个字，我立刻枪毙你！”

这位战士对我的强横大为震惊，痛苦的擦着脸上的汗水认真而困难的重复着首长的命令：“不错呀排长。指导员说我们的守备任务已经完成，一排和三排已经撤了，指导员说，他带领四个同志在村南的坟地里掩护我们撤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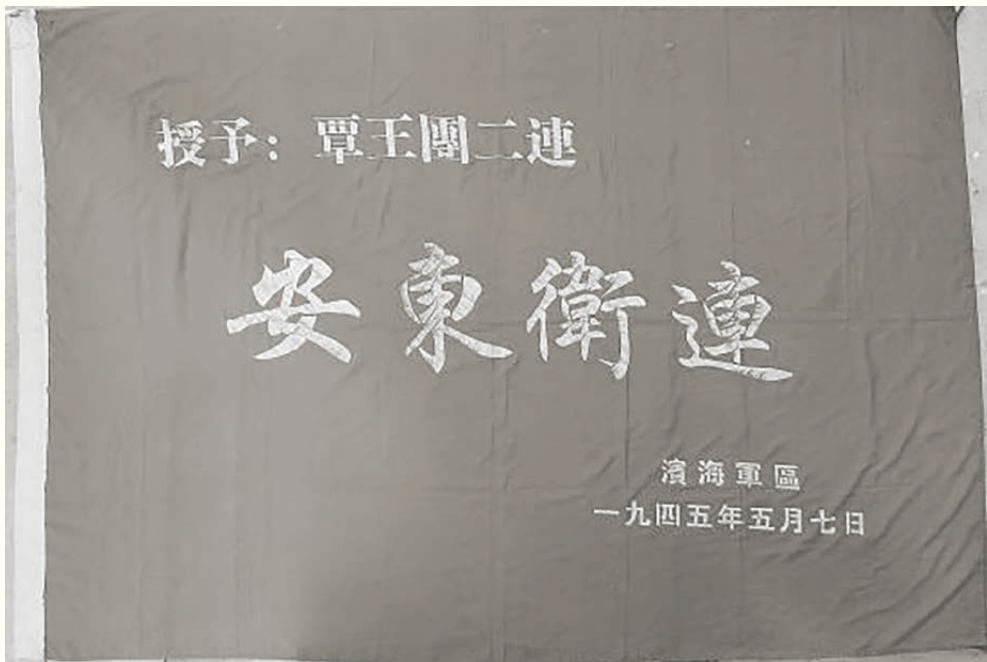
“指导员掩护我们？”我们知道在众多的敌军面前，这意味着什么。指导员要把生的希望留给我们，自己去面对死亡的威胁。战士们不愿意走，他们已经杀红了眼。我说：“服从命令，难道我们是一锤子买卖，现在不是报仇和泄私愤的时候，起来，听党的话，撤！”战士们爬起身，仇恨的看着敌人的方向，搀扶着伤员，转步进村，向南转移。

半个多小时以后，我们和钟指导员会合了。他带着连部的三个勤杂人员，扼守着几个坟包，以火力掩护我们。我向他汇报情况并让全排占领此地，好让他们撤离。但是，很显然，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撤离的意图，他们已经紧逼上来，子弹在嗖嗖横飞。指导员回过头叫道：“李宝贵，快走！误了时间，影响了战斗，我要执行纪律了！”

“不！指导员，你带领连部的同志先走！”我几乎哭着请求。

指导员顿脚踢在一块碑基上，厉声叫道：“李宝贵！”





“有！”

“撤！”他顿然一字，然后手持驳壳枪，目朝敌方不再看我。我，强忍着夺眶涌出的泪水，拖步离开坟地，迈着此生最沉重的脚步向南转移。我听到身后的枪声越来越密，越来越激烈。那小小的坟地，火星飞溅，敌人在嚎叫，我们的指导员……！

我们转过一堵围墙，视线被遮断了。枪声慢慢地稀疏起来，然后逐渐停止，万物静寂。我们良久默立，互不言语。燃烧的火光和激战后的寂静，对于一名老战士的我，一切都清楚了。

由于二连堵住了敌人，胜利的完成了守备任务，我主力部队一举解放了安东卫。

第二天，一位伤员归来，带来了钟指导员悲壮的最后一刻的情况：为了迟滞敌人前进，掩护全连转移，四次负伤的他在拼杀了两个鬼子后，知道自己已经走不出去了，将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他身边的四个同志，除卫生员唐光宝外也全部壮烈牺牲！

辽阔的黄海在咆哮，日夜为勇士歌唱，海岸永远是我们的，是不屈不挠的中国人民的！

**后记：**1945年5月7日在山东安东卫保卫战中，三三八团一营二连打退了1000余名鬼子的11次冲锋，毙伤俘敌包括日本指挥官中田俊郎在内的360余敌军。《解放日报》在1945年6月10日报道了该连的英雄事迹，7月7日滨海军区颁布命令，授予二连为“安东卫连”，追认该连指导员钟家全为战斗英雄。

# 鲁中斗争片断

邓久武



1938年7月，我被地下党组织调到鲁中干部学校学习。

1939年春季，日本鬼子对鲁中南地区进行第一次大扫荡。我们干校被迫停了课，在校学习的同志都拉到东大山参加反扫荡斗争。根据反扫荡的需要，在学校组建了一个14人的联络科，崔兰亭同志任科长，我为助理员，主要任务是扩大我军政治影响，收集武器等资源，装备部队，锄奸和保卫根据地。那时，我们干部学校人多枪少，一个区中队40多人，只有两支步枪和几个手榴弹，多数同志从来没见过机枪、小炮。这点武器装备就是自身防卫来说都很吃紧，更别说上阵反扫荡了。在这种情况下，上级要我们联络科千方

百计地收集散兵和地方枪支，利用一切机会，夺取敌人武器装备自己。我们除了利用各种关系打听哪里有收藏的枪支，动员枪主献出外，还瞅机会缴敌人的枪。那时，我们这些同志简直成了缴枪迷，哪里打仗我们就往哪里跑，哪里枪响就往哪里跑。一个月的功夫，我们就逐渐武装起来了，联络科的同志每人配备了一匹马和一长一短两套武器。一天，部队驻在垛庄沙沟峪。早上一起来，就听到庐山方向枪声响成一片。大家感到缴枪的机会到了。我和科长一商量，带着14个人骑上马向庐山方向赶去，走近时才得知是国民党五十一军的一个连在向我区中队进犯。这下子大家可火了，这些家伙不去打日本，经常欺压老百姓，杀害我地方干部袭扰抗日根据地，专门搞摩擦，这次非狠狠揍他一顿不行。我们立即支援，从敌人背后打了过去。枪声一响，顽军发现腹背受敌，当时就乱了营，向东逃跑的敌人人数多，向西一小股。我们抓住一个未来得及跑的敌人的便衣，从他的口供中了解到向西逃跑的敌人只有十几个，并且带有一挺机枪。“有一挺机枪！”这个消息可把大家乐坏了，纷纷要求追上去，夺敌人的机枪。我们分析了敌情，14个人崔科长带6人，其余跟我，猛追逃敌。当我们赶到一个小山村时，发现敌人正在老百姓家喝水，准备吃饭，没有派一个岗哨。我们便悄悄地包围上去，占领了有利地形，突然用枪指住敌人大喝一声：“不要动！谁动就打死谁！”敌人被突如其来的情况吓坏了，一个敢动的也没有，乖乖地缴枪投降了。就这样，我们一枪没放，俘敌14名，缴获步枪12支、手提冲锋枪一支、子弹3000多发，防毒面具14套和一挺崭新的机枪。

当大家肩扛着闪闪发光的机枪回到部队时，受到同志们的热烈欢迎，首长接见了我们并给予参战的同志们每人30元奖励。

日本鬼子刚进入鲁中扫荡时，见人就杀，见房子就烧，野蛮地施行“三光”政策，驻鲁中的国民党部队闻风而逃，鲁中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为了鼓舞人民起来抗战，打破日寇不可战胜的神话，我们八路军鲁中部队勇敢地向日寇挺进，伺机打击日寇。

七月的一天，我们接到内线情报，得知第二天有300名鬼子从蒙阴到临沂去。接到这个情报，我们感到打鬼子的机会到了。立即制定了作战方案，决定利用从垛庄到尚店之间青纱帐打敌人的伏击。我们向上级汇报了作战计划，很快得到批准。全科14



人紧急集合，当晚就星夜行军，第二天一早到达指定的位置。

从垛庄到尚庄的公路两侧是一望无际的青纱帐。我们隐蔽在青纱帐里观察公路上的情况是一清二楚，而在公路上看不到我们。同志们修筑工事后，悄悄地隐蔽起来。因为这是第一次和鬼子交锋，说不上怕，可心里还真没有数呢！

上午八点多钟，听到远处传来了杂乱的脚步声，又过了一会，我看到公路上的日本鬼子排成四路纵队走了过来。我向同志们打了个手势，叫大家沉住气，把敌人放近一点再打。日寇侵入鲁中南以来，还没吃过苦头，全然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连战斗警戒也没有。敌人越走越离我们越近，当他们一进伏击圈，我喊了声“打”！一排排仇恨的子弹立刻射向敌群。鬼子被打蒙了，顿时鬼哭狼嚎地乱成一团。当他们清醒过来发现我们兵力不多组织反扑时，我们早已借着青纱帐的掩护向尚庄方向转移了。敌人枪炮打了半个多小时，发现我们早已无影无踪了，只得抬着尸体和伤号继续赶路。

当时，日寇以为我们是游击队，扰乱一下就完了。其实，我们又转移到前边的青纱帐里等着他们了。当鬼子再次进入伏击圈时，我们又一次集中火力，猛烈射击，打得敌人人仰马翻，日寇气急败坏地使用机枪、大炮向我们射击，掩护敌步兵向我冲击。我们一看敌人势头不小，就立即撤出了阵地，又向前转移了。敌人仍以为把我们打跑了，可以放心地走了，实际上我们又在尚店东不远的地方第三次伏击了敌人。就这样，在从垛庄到尚店的12里路地段上，我们连续三次伏击敌人，共打死打伤20多个鬼子，我无一伤亡。

这次伏击战胜利的消息迅速向四乡传开，打消了笼罩在人民心头上的“恐日”的阴云，打击了敌人的气焰，增强了人民的抗战信心，扩大了我军的政治影响，老百姓知道八路军是真正打鬼子的队伍。当我们胜利归来时，乡亲们抬着猪羊，担着酒菜来慰问，并纷纷送自己的亲人参加八路军。不长时间，区中队便由20多人扩大到130多人，县大队由90多人扩大到260多人。

# 抗日名将马保三

博 雅



马保三，原名马鉴堂，曾化名张炳炎，寿光县台头镇牛头镇村人。1924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4年2月病逝。在长达40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历任中共寿光县委宣传委员，国民革命军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八支队司令员，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副参议长，青岛市市长，山东省政协副主席，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二届委员会委员，省委统战部部长等职。“一贯忠于党的事业，勇于坚持原则，在对敌斗争中顽强不屈，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这是中共山东省委对他所作的评价，也是马保三革命生涯的真实写照。

## 初露锋芒

1888年，马保三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10岁入村塾读书，他自幼聪慧、好学，深得塾师赏识。7年后，因家庭困难，辍学务农。此后，他种过地，开过布店，挑过镢漏子扁担。曲折的生活经历和广泛的社会阅历，使他深知广大群众的疾苦。

同时，他勤于自学，善于健谈，主持正义，勇于斗争。当时，牛头镇的村长是封建阶级的代理人，倚仗本村封建势力，在村里称王称霸。马保三看不过眼，主动找其说理，把村长驳得理屈词穷。1921年，国民党县长带领武装人员来到牛头镇，划界插标，硬要掠夺400亩地作为“学田”。这一蛮横行为遭到村民强烈反对，大家推举马保三

出面交涉。马保三带领村民与官府、豪绅进行了坚决斗争。通过斗争，马保三增长了不畏强暴的勇气和领导群众的智慧，也在群众中赢得了较高的声望。

1922年夏，马保三与从山东省立第一师范毕业返乡的进步青年张玉山相识，二人志同道合，谈话投机，结交深厚，在张玉山的启发、引导下，阶级觉悟逐步提高。

## 投身革命

1924年8月，经张玉山、李铁梅介绍，马保三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寿光地方党组织建立后发展的第一批党员。为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更好地开展革命活动，他在自家的芦苇地里盖了一间草房子，名义上是为看芦苇，实际上是为党组织提供一个秘密联络点。为筹集党的活动经费，他不惜卖掉一个自家场院。同时，他积极建立农村基层组织，在本村发展了7名党员，建立牛头镇第一个党支部，并担任支部书记。

1926年8月，中共寿光地执委成立，马保三任执委委员，负责农运、宣传等工作。1926年10月，马保三任寿光县农民协会主席。他经常到各村发动农民，组织农会，积极开展反对封建军阀和苛捐杂税的斗争。

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疯狂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为躲避敌人的搜捕，他出走东北，辗转朝鲜仁川，在那里与原在朝鲜的中国同志组建了中华劳动组合会，积极开展抗日活动。

1933年7月，马保三由东北回到寿光，不久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开始被关在县城监狱，不久被解往济南，关押在伪省府监狱。在那里敌人对他严刑拷打，但他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气节。1934年春，通过党组织营救，加上敌人无可靠证据，马保三被保释出狱。

马保三出狱后，因当时寿光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一时没有接上组织关系，但他仍同过去一样，积极领导群众进行革命斗争。期间，他深入调查，了解到湖东乡乡长马秉修欺压百姓，把全乡筑墙、修路、架桥等收来的款项用以肥己的事实，便以此为突破口，走门串户，发动群众，揭露伪乡长的罪行。1934年底，他带领群众千余人突然包围乡公所，通过查账，搞清了马秉修的贪污行为，强烈要求撤销马秉修的乡长职务。县长宋宪章感到众怒难犯，只好撤销马秉修的乡长职务，并令其交出赃款，答应群众推荐马保三担任湖东乡乡长的要求。反霸斗争胜利后，恶霸地主垂头丧气，贫苦农民扬眉吐气。经过这场斗争，马保三的群众声望更高了。

## 驰骋疆场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在中共寿光县委领导下，全县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马保三以湖东乡乡长的合法身份，搜集枪支，举办抗日民众训练班，积极投入组织抗日武装的准备工作。他利用集市等群众集体场合，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揭露日寇的烧杀抢掠暴行，号召大家积极参加抗日武装，奋力抗击日寇，拯救民族于危难之际，一时群情激奋，应者云集。为组织抗日武装，一个多月的时间，他跑了8个乡，串了几十个村庄，组织了七八十人的队伍，为后来的武装起义培养了骨干，打下了基础。

1937年11月，中共寿光县委在马保三家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会议传达了省委关于分地区发动武装起义的指示，决定以牛头镇为起义中心，起义后部队番号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队第八支队”，马保三被推举为总指挥和八支队军政委员会成员。12月29日，各地游击队员陆续到牛头镇集结，在乡公所门前竖起“国

民革命军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八支队”的大旗，八支队总指挥马保三宣布八支队正式成立，宣读《八支队成立宣言》；八支队军政委员会主席张文通宣读《告全国同胞书》。誓师大会后，游击队员进行了编队，支队共计700余人，编为一、三、五、七和特务队共五个中队。牛头镇起义后，八支队军政委员会将八支队成立的消息报告了民国县政府，同时指出应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牛头镇起义后，八支队在牛头镇进行了集中整训。整训一开始，马保三就打开自家的粮仓，腾出自家的房子，让战士们食宿。他说：“先吃完我家的，然后再吃大伙的。”他全家老小整天磨面、做饭，全力为部队服务，被指战员亲切地誉为“八支队的后勤部”。为鼓动参军，他率先垂范，带领子孙三代一起参军。在他的带动下，全县掀起了参军的高潮。

1938年1月，红军干部韩明柱、鲁东工委委员杨涤生来到牛头镇，加强了八支队的领导力量。马保三虚心向他们学习，与他们密切配合，相互协作，使这支新生的人民军队得到迅速成长壮大。2月5日，马保三、韩明柱亲自组织指挥的三里庄伏击战一举击毙日寇官兵3名，缴获汽车一辆及一批枪支弹药等军用物资，取得部队组建以来第一次对日作战的胜利。首战告捷，军威大振，群情沸腾。2月23日，发动三合庄战斗，收编67名伪军，由此声名鹊起。

1938年3月，鲁东工委决定，调八支队东去昌邑，与七支队会师，扩大武装，协同作战。马保三以大局为重，坚决服从决定，并在出发前为适应东进会师的需要，积极地对部队进行教育和整编。4月，八支队到达潍北与七支队合编，组成八路军鲁东游击队指挥部，统一指挥七、八支队，马保三任指挥，韩明柱任副指挥。合编后，应胶东特委邀请，马保三率部继续东进，帮助山东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开辟蓬（莱）黄（县）掖（县）地区抗日根据地。在马保三的指导下，鲁东游击队与第三军一起，智取黄县城，解围黄山馆，收编龙口公安局和水上警察队，名声大振。部队很快发展到6000多人，钢枪5000多支。5月12日，在第八支队队部，马保三主持召开第三军、第八支队和第三支队负责人联席会议。会议决定第三军、第八支队、第三支队组成抗日联军，由马保三任指挥，林一山任政治委员。同时决定成立前敌指挥部，韩明柱任指挥。会后，前敌指挥部率领鲁东游击队一部向掖县进发，攻克白沙，再夺夏丘堡，以解三支队之围，将掖县、黄县、蓬莱等县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

1938年7月，根据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指示，马保三率部回师邹（平）长（山）地区，与清河三支队并肩作战，巩固扩大清河地区抗日根据地。10月，鲁东游击队主动出击周村城日军，战果显著，创造了攻城范例。11月，在长山蒙家庄战斗中，韩明柱不幸壮烈牺牲。12月，马保三按照省委指示，率领部队越过胶济铁路挺进鲁中，参与创建沂蒙山区根据地。下旬，部队被改编为山东纵队第八支队，马保三任支队司令员。从此，在寿光大地上揭竿而起的八支队，成为驰骋鲁中抗日战场的正规八路军。在八年的抗日战争中，八支队与日伪军作战200余次，计毙伤俘日伪军1万多人，为全民族的抗战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 主政地方

1940年7月，在沂南青驼寺召开了全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成立了山东省战时推行工作委员会，即山东省政府的前身，马保三被选为临时参议会副议长。从此，他离开多年的戎马生活，开始做地方工作。当时，省临时参议会代行省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议长范铭枢是党外人士，年高多病，因此一些重要工作都由马保三主持。根据党的政策和解放区的实际情况，他领导着参议会的人员，制定了民主选举法、双减法、婚姻法、财经法，使各项工作做到有法可循。为建立巩固根据地，他亲自到基层帮助

建立各级政权，选举县长、区长，并发动群众开展大生产运动，进行生产自救，从而粉碎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有力地支援了前线所需的作战物资。

1949年青岛解放后，马保三任青岛市市长。进入城市后，他牢记党的教导，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严于律己，自觉抵制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他生活十分俭朴，吃饭从不超过供应标准。秘书看到他的被单破了，要给他添件“太平洋”被单，他婉言谢绝了。离开青岛时，市委送给他两个皮箱、两个木箱，他告诉秘书说：“进青岛时带的什么，走时还带什么，多一件也不要。”随即要秘书把箱子送还市委。在他的教育和影响下，当时市政府的绝大多数干部能够做到艰苦朴素、公正无私，身居闹市而一尘不染。

1950年4月，马保三满载人民的盛誉离开青岛到省里工作，同年当选为山东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副主席。1955年当选为山东省政协副主席，1956年当选为中共山东省委委员、统战部部长，1958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59年继续当选为山东省政协副主席，1963年继续当选为山东省委委员。

在省委工作的十几年，虽然年届古稀、疾病缠身，但他斗志不衰。那时他身兼数职，昼夜操劳，不论是土改、镇反、抗美援朝，还是三反、五反、社会主义改造，不论是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还是纠正左倾错误，他都积极地发动各界人士，投入火热的斗争，经受斗争的锻炼，为党的事业贡献着毕生的力量。同时，他勇于坚持原则，不计个人得失。特别在反右倾等问题上，他直言不讳、旗帜鲜明，曾承受着以右倾和“地方主义”批判的压力，顽强斗争，坚持原则，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无私无畏、光明磊落的革命品德。

1964年2月15日，马保三积劳成疾，不幸病逝于济南，享年77岁。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发来唁电，中共山东省委和山东省人民政府为他成立了治丧委员会，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德志，副司令员王建安、杨国夫等领导同志和山东省各界代表参加了追悼大会。会后，他的遗体安葬到济南英雄山革命烈士陵园最高层的第一排位置上。

马保三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在青年时期嫉恶如仇，敢斗、善斗；在壮年时期杀敌报国，驰骋疆场；在老年时期，投身建国大业，呕心沥血，为党的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他那不朽的功绩，将永垂青史，他那顽强的革命精神和崇高的革命品德，将永放光辉。





# 晚清著名学者赵嘉肇

赵 炯



赵嘉肇手札

赵嘉肇，字孚民，号秋厓，别号倔道人，堂号“四槐堂”。生于清朝道光四年（1824）岁在甲申，卒于光绪十八年岁在壬辰（1892），沂州府兰山县西南乡管家庄（现属兰陵县卞庄镇）人。自幼聪敏，勤奋好学，精于诗律，善属文，好书法，博学多才，入仕前在当地就已负才名，乡里谓之才子。咸丰壬子（1852）科举人，清制，举人会试三科不中者，准予铨补知县，一科不中者改就教职，以州学正、县教谕录用，是为拣选。赵嘉肇后屡次入都参加会试，皆未中式，至同治七年（1868）拣选至陕西，以知县差遣委用。同治八年丁忧回籍，同治十一年起复回省。此后的20余年皆在陕西为官。光绪三年（1877）十月署富平县知县，编查保甲举办团练，参与围剿蒲城刀匪。光绪八年（1882）十一月任郿县知县。光绪十年（1884）任三原县知县，多有善政。《三原县志》云：“（赵嘉肇）廉明敏干，善知人。一时败类无敢至衙署者。勤课士，尤有好贤风。清均粮地，专委任精，剖决剔厘邑二百余年积弊。惜未蒞事，以调帘去。”光绪十一年署任洵阳县知县。光绪十三年陕甘总督谭钟麟上奏，以赵为精明廉干之员，能胜任政务殷繁之咸宁县，请调补咸宁县知县。奏折略曰：“查该员赵嘉肇，现年六十三岁。山东兰山县附生。中式咸丰二年壬子科本省乡试举人。赴部投供候选。同治七年拣选发陕，以知县差遣委用。是年十一月到省。八年丁忧回籍，十一年起复回省。加捐本班尽先补用。历署三原、富平、郿县等处知县。任内交代，均据后任结报清楚。光绪十年请署洵阳县知县。十一年十月初二日先行到任署

理。十一月初五日奉文准作署任日期，计至十二年十一月初五日，试署一年期满。本年闰四月十七日，业经臣加考题请实授。查该员心地朴茂，勤求治理，任内并无一切违碍处分，以之调补咸宁县繁缺知县，实堪胜任。”光绪十五年（1889）正月任华阴知县。光绪十五年又转任渭南知县，任渭南时“详准闰月差钱由盈余项下动支，俾里局永不赔累”，光绪十七年（1891）二月卸事。嘉肇公所到之处，勤于政务，关心民生，注重教化。据史料记载，“历官有声”“宰关中十余年，所至多惠政，然性憨直不善逢迎，以是郁郁不得行其志，苟守其志而不变。”蓬莱进士慕容幹在其为《太华太白纪游略》所作序言中谓：“孚民赵侯吾乡名宿，宦游关内垂二十年。”（民国）《临沂县志》云：“（赵嘉肇）出宰关中，历任三原、郃阳剧邑，所至金着循声。”曹季凤跋《忠孝节义见闻纪略》亦云：“吾师秋厓先生，官秦中数十年，所至多惠政。上下之交，主诚敬而无诡随，正人君子莫不爱重之。”可见嘉肇公一生最好的时光是在关内度过的，其主要政务活动、社会活动和文学创作及学术活动亦是在关内开展的，故故乡后人多所未闻，但其在晚清文坛、学界的地位是明确的，其影响无论在当时和后世乃至当代，都是显著的。

嘉肇公著述颇丰，其主要著作为《太华太白纪游略》，该书成于清光绪八年壬午（1882）。公久有游太华之愿，然终因公私事务繁杂，虽“自戊辰（1868）迄于丁丑（1877）四过华麓，或至玉泉院仰莲花峰而止，心赚焉。萦诸梦寐，思约知交数辈，联袂三峰，遍历诸胜迹而未得。”延至光绪八年壬午，公“授洵阳，赴官之路实出终南涧谷间”，延宕数日，遂得一游，方偿夙愿。光绪九年癸未（1883），又游太白山，“公余之暇亦尝随笔纪事”，遂成《太白纪游略》。二稿既成，公亦了却一桩心愿。

该书甫一脱稿，就不胫而走，受到广泛的关注。多方人士或当面或书函向其索稿，或欲先睹为快，或欲刊刻行世。先有友人汉南令李云生“邮筒索稿，既而覆书属将前后两纪合刻”，会“甲申（光绪十年，1884）秋再涖池阳，旧日两书院同社诸子知游太华太白，咸就索稿，亦以两纪合刻为请。”当地两书院学社近水楼台，先索得手稿并请准两纪合刻，遂将其合刊行世，一时风靡，洛阳纸贵。这大概是最初版本。后被《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丛书集成续编》《关中丛书》等多种文集作为重要文献资料收录。

改革开放后，《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曾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丛书集成续编》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关中丛书》由陕西出版社出版。《太华太白纪游略》至今仍是研究区域文化、风俗人文、名胜古迹沿革、旅游景点线路设置等诸领域的重要参考资料。笔者孤陋寡闻，蛰居偏僻的沂蒙山区，所见甚少，仅翻了一下手边2004年出版的张晓虹《文化区域的分异与整合》一书中，粗略统计，这部20余万字的书就引用《太华太白纪游略》有12处之多。在一书中引用率如此之高也是不多见的。此书为张晓虹的博士论文，由此足见《太华太白纪游略》一书的学术价值和作者的学术贡献及其在当代学术界所受到的重视。

《太华太白纪游略》前人多有评论，笔者才疏学浅对此书亦无研究，故无资格置喙，仅将前人论述略加梳理，以供读者参考。

该书最鲜明特点首先是思想性，能在奇峰峻岭中敏锐地看到其护民佑民的社会功能：“至第一关，名五里关，扼隘设险，地势奇胜。土人告曰：同治初，匪首张宗禹窜陕，踞玉泉院四十余日。百姓避贼入山者数十万人，贼屡欲搜山至此不得入。男妇数十万人获保全者，山灵呵护，仰此关之力为多。”既而在游历结束时梦中所作诗中仍念念不忘百姓，替民祈福：“梦复快游西峰，入庙，若具衣冠状，礼神为百姓祈福，迴视笔砚列几，静观立于后，余蘸墨向东壁题句”。其纪梦诗：

重向西峰顶上行，  
出山霖雨慰苍生。  
为民祈得升平福，  
被野桑麻官吏清。

这超出一般游记的范围和水平，足见作者时刻心系百姓与民息息相通的情怀和诉求，作为封建官吏，是难能可贵的。故而蓬莱进士慕容幹在为该书所作的《序》中特别指出了这一点：“记游之文大率述风景之美，侈游观之娱而已。孚民于华山独详关隘为百姓避贼之资”。丛书编者长安宋兴奎、蒲城王健、兴平冯光裕等在其《跋》中亦谓：“太华太白纪载多矣，大抵侈三峰之伟奇，夸三池之神异，鲜有言及民莫者。兹虽纪游，而正疆界询疾苦，梦中栩栩犹礼神为百姓祈福。吾又一叹！承平儒吏之风规，念念常切乎民依，虽一游观，莫之替也。昔欧阳公治滁，山水游记均有与民同乐之意。赵侯兹纪其殆庶焉！故印入丛书，特彙兹意於卷尾。”可见无论当时和后世，人们对其关心民瘼，梦中犹为民祈福的思想品德都是极为推崇的。

其次是手法灵活、语言清新挺拔、描摹生动逼真，不落俗套，表现了作者驾驭语言的高超能力和深厚的学识及文学修养。蓬莱进士慕容幹谓：“摹写山中诸名胜及峰峦斗绝、草木深邃、蹊径危逼之状，惟妙惟肖，纤巨靡遗。”汉阳黄嗣东谓：“至其叙事之缜密，数典之博洽，文学之士优为之不足以重。”两山虽同是纪游，但在写作手法上也是因势为文，描写对象不同而手法各异。“太华譬诸行文挺拔修洁，局势紧密，读者为赏心；若太白则汪洋恣肆，叠矩重规，非拓开心胸放宽眼界，未易得其起复回环层折不穷之妙。”楚南杨翰霄谓：“以清峭之笔，写幽险之神，摹绘其箕叶峻厉之状，变幻离奇无美不至。得此一《纪》，足令灏灵生色。”

三是知识渊博，记述周详，展现出深厚的人文地理历史知识和丰富的气象学知识。移步换景，步步有典故，处处显文化；人文沿革、山峦地势、风霜雨雪、四季变幻，信手拈来，娓娓动听，如数家珍，若非饱学之士断难成就。浙江箫台进士陈爵之谓：“考据精详，叙次疏古。未游者慕其景之奇，已游者服其笔之妙。”福建陈兆焕谓：“考据精核如王阮亭，脉络分明似魏叔子，若纲在纲有条不紊，令读者不啻俛玉女之鬟，仰仙人之掌，置身三峰间矣，纪游中大观也！”海丰张守峤谓：“胸中有竹，舌上生莲，如淮阴将兵多多益善，驱使综核之才，诺复以斗石计，至结处天然一梦，与古为新。前有东坡后有秋崖。”长山焦云龙谓：“于东坡同一梦游，而一在观物一在济物。有心者不以游观忘斯民，固于纪梦诗中见之也，且历叙山中景物，句峭笔爽，引古证今，至详且确，披读一过，觉三峰如在目前。”

三原举人贺瑞麟则独具慧眼，另有所见，从中看到了寓意，曰：“接到尊函并《华山纪游》时，有寒疾不可以风。此山尝六七游，亟开卷读之，觉旧日经行历历如在目前，恍复置我于三峰间，心旷神怡，病忽去，亦一奇也。再三玩诵，尚多前此足目所不及处，益见心细量宽无微不搜。尝谓：登华山如读数十种奇书，其豁朗如《论语》；其岩岩如《孟子》；其广大宏博如《大学》《中庸》；敦厚处似《诗》；高古处似《书》；阴阳变化处似《易》；有《檀弓》之奇峭；有《离骚》之幽艳；有庄列之恍惚离奇；有马迁班固之峻洁，密塞盖无所不有。今《纪游》亦无所不有，知此游所得深矣！然或谓山径之崎岖易游，仕路之崎岖不易游。窃以宦游之与山游一也，《纪》中有之矣。履险若夷，不必涉险。虽曰仕路之险更甚於山径之险，持此二义自得其所以游者，此其所以为偃道人也。若躁气不除之道人尚可语入乎险出险哉！”真是见仁见智。

赵嘉肇能布衣麻鞋，风餐露宿，随遇而食，放下官吏的架子，跻身山民野客间，以普通旅游者的身份，深入荒山野岭，寻胜探幽，吃苦耐劳，实属不易。“太白山真



眉县张子祠

奇文真奇观也，惜地僻山深，风雪不时；庙宇无多，宿食未便，故游者常少；又无古碑旧迹堪令寻味，以故词客文人至者益缈……然登此山亦正复不易，非多携衣物食具，自度其筋力足耐劳苦，未许冒昧，否则恐有性命之虞。”

嘉肇公不仅忠于政务勤于写作，且热心于兴学校、施教化、推动传统文化的发展等社会公益事业，造福社会。眉县张子祠当时已是断壁残垣破败不堪，有名无实。公倡议重修，得到同僚和各界人士的响应，多方募捐，短期内事竟成。据重修张子祠碑文记载：

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前眉县知县赵嘉肇，现任知县颜璇敏，三原五品衔举人贺瑞麟，进士出身的户部司主事眉县里人王步瀛等倡议修建张子祠，得到各阶层人士赞同，于是鸠工集资，重修了张子祠，竣工后举行了谒祠仪式，并由赵嘉肇撰文，颜璇敏校阅，王步瀛书丹，立石作志。贺瑞麟作楹联曰：“近马帐而传经砭愚订顽百代均沾化雨；设虎皮以讲易经明德立群论共被春风。”张子祠的重建不仅推动了当地教育、文化、学术的发展，对全社会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改革开放后张子祠又重修，并且建有专门的张子祠管理所，该碑现藏所内。

嘉肇公除了有《太华太白纪游略》存世外，还将自己所闻见之忠孝节义之人之事，写成传记，汇集起来，名曰《忠孝节义见闻纪略》。又重修《琅琊赵氏家谱》，刻于渭南任上。另有《四槐堂藏书录》《四槐堂金石录》。为官三原之时，曾辑录他曾祖赵德懋的诗集《妙香斋诗集》，刻印行世。

说来惭愧，我对嘉肇公的生平著作其实知之甚少，本无资格言及。奈友人错爱，约稿甚急，盛情难却，勉为其难，遂成以上文字，算是抛一块引玉之砖，以期引起各方专家学者对该公研究的兴趣。时间仓促，错讹不当之处还望各位大雅不吝批评赐教。

# 铿锵豫剧进沂蒙

——忆我的父亲、原临沂地区豫剧团团长刘瑞堂

刘云霞

六十春秋一甲子。

60年前的1958年岁末，临沂地区专员公署通过山东省文化厅协调，从菏泽地区挑选一个豫剧专业剧团来临沂，以活跃丰富沂蒙老区的文化生活。经过数月的考察和现场观摩遴选，最终以我的父亲刘瑞堂为团长的定陶县华光剧团被选中。1959年8月，这个曾叫响苏、鲁、豫、皖边界地区的豫剧团整体东进沂蒙，组建了临沂地区豫剧团，刘瑞堂任团长。

富有中原地区方言特色的豫剧，在我国五大地区戏曲剧种中名列首位。该剧种曲调以板腔体为主导，伴奏音乐丰富多彩，唱词清晰易懂，行腔酣畅刚柔并济，特别是传统古装戏特色浓郁，质朴通俗，剧情矛盾冲突尖锐，剧中人物个性鲜明，演员的感情很容易与观众融为一体，常常演喜剧时让观众开怀大笑，演悲剧时台上台下泣不成声。

父亲刘瑞堂1925年10月生于定陶县城一个贫苦家庭，迫于生计，七岁起先后在菏泽临圣湖、黄儒秀等戏班学习豫剧，还到河北省邯郸河北梆子剧团学习武功。经过各路名师的指点和自己刻苦努力，加之自身长相俊逸，身段适中的优势，他的腰功、腿功、把子功，以及身形、功架诸方面的武生戏基本功底深厚，13岁开始搭班登台演出，凭借文武兼备生旦俱佳的出色特长崭露头角，不到20岁就成为戏班的主角。在江苏徐州黄河舞台、河南开封、安徽蚌埠、河北邯郸等地剧场所主演的《闹天空》《劈山救母》《黄鹤楼》《烈火扬州》《打宝府》武生戏；所主演的《天河配》《桃花庵》《莲花庵》《日月图》等文生戏，所扮演的角色武打刚健有力，文戏细腻大方，表达的人物内在情感细致入微，一人一貌，栩栩如生。有时在一地连演数场，场场观众爆满，票友和戏迷形容他演武生是“燕子刘”，演文生是“赛嬷嬷”……1950年，定陶县组建华光豫剧团，刘瑞堂任团长。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父亲积极拥护党的主张，带领剧团配合国家中心工作排演剧目。在抗美援朝时期，以河南豫剧名角常香玉为榜样，通过义演募集资金支援战事；特别是1958年，他带领华光剧团深入周边数省农村一边演出——边参加生产劳动，鼓舞激励广大农民群众积极投入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潮中。1957年，父亲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临沂地区豫剧团组建时，正赶上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城内没有合适的落脚之地，剧团曾先后在矿务局厂矿、临沂城西衙庙、天主教堂作为排练和住宿场所。在临沂城内的演出地点也十分简陋，当时那个称作新新剧场的剧院不过是草棚搭建的，仅歹设有板条凳座位和简易舞台。

“党组织调我们来临沂，不是让我们来享福的，而是让我们为沂蒙人民唱戏鼓劲的！”面对工作生活重重困难，刘瑞堂经常在剧务会议上为全体演职人员鼓劲，同心协力牢固树立起热爱临沂、敬业奉献的坚定信念。常言道拳不离手、曲不离口，所以他把排练演员的基本功作为剧团业务建设的重头戏，以唱、念、做、打“四功”，手、眼、身、法、步“五法”为要领，严格要求演职人员不断提高业务素质，养成“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职业习惯。至今剧团的老演员们都清楚地记得，在那个特殊的艰苦创业的年代里，临沂城东边的沂河防洪大堤上，城北边的沂河沙滩上，晨曦初露的早上，人们总能看到身着练功服的豫剧团演员们站在那里仰天呼啸吊嗓子，汗流浹背练功夫。有的年轻女演员为检验声调的回放程度，干脆在河边挖出一个个脸盆大小的沙坑，待河水渗满后低首对着水坑放声呐喊，顿时声波的震荡激起水坑内的水出现层层涟漪，同时人的嗓子也得到水气的滋润。武生演员的十八般武艺，排练时刀枪剑影和阵阵响声，更成为城郊河畔一道亮丽的独特风景线。

豫剧团来临沂的前十多年里，所演出的剧目多以传统古装戏为主。团里的口号是“基层是舞台，戏给人民听！”当时临沂地区13个县250多个公社几乎都留下豫剧团的脚印，每年巡回演出250多场戏。剧团每到一地，刘瑞堂率领大家像当年老八路那样锅灶一支能开饭，舞台一搭能开戏，铺上麦草能睡觉，不给群众添麻烦，有些青年演员还利用短暂休息时间争先恐后为老乡挑水扫院子。80多号人的演唱队伍，一年在农村乡镇、厂矿企业、驻军部队巡回演出半年以上。

沂源县的乡亲们清楚地记得，1964年临近春节，临沂豫剧团在这里演出十几场后准备班师回临沂。谁知天公无常，一阵凛冽北风吹过，天空铅云密布，鹅毛大雪三日未停歇，满山遍野银装素裹，进出该县的道路全部被阻断。怎么办？刘瑞堂马上召开临时会议决定，在县城南麻镇就地过年，冒雪给群众唱戏贺春！当地乡亲闻讯后奔走相告，有的戴着蓆角子、披着蓆衣顶风冒雪前来看戏，那些天所演的《三岔口》《三看御妹》《杨八姐盗刀》《劈山救母》《罗焕跪楼》《打宝府》等剧目格外叫座。

上世纪70年代，临沂地区豫剧团与时俱进，排练现代戏《社长的女儿》《黎明河边》《白毛女》《夜海战歌》《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剧目。刘瑞堂针对有些演员不习惯现代戏的技法问题，便组织大家到工厂、农村、边防哨所体验生活，日积月累增强感性知识，所排演的每出戏，他都在角色中。

临沂豫剧团时刻把为基层大众演出视为乐事，而广大群众的共鸣和欣赏也滋养了剧团演职人员的艺术情怀。1972年初夏，剧团来到莒县爱国公社。白天，演员们头戴草帽，挥舞镰刀同社员一道割麦子，晚上化妆挑灯演出。闻听有个村有几家病灾户，想听戏又无能为力出不了门。刘瑞堂即刻派出五名演职人员带着弦子、梆子来到患者家中炕前，为这些老人面对面清唱现代戏片断。久病卧床的老农一边听戏一边抹泪感叹：这样的剧团，这样的演员，也只有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社会才有啊！在爱国公社的日日夜夜里，豫剧团既整场演出，也根据收集到的热爱集体、孝敬老人等文明风尚的实例，编排出五场短剧，随时在田间地头为社员群众演唱，传播了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凡人善举美德。这天中午，刘瑞堂在麦地和乡亲们小憩时，有几个老乡随意说道：刘团长，你看我们这里今年小麦大丰收，你能现场给俺编个段子唱唱吗？刘瑞堂满脸笑容应声答道：“中中中！”他环视四周略思片刻，即兴摆出架势，当场激情献艺：“乡亲们抬头山上看，红旗招展玉皇山，东边的渠水村前哗哗过，地里的麦个子像宝



娃滚落田间，大伙儿镰刀锃亮干劲那个冲天……”。“刘团长编得好，唱得好！”父亲即兴演唱博得大伙一阵热烈的掌声，暑夏劳作的疲劳感也顿时消失殆尽。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父亲刘瑞堂正处在艺术人生的辉煌时刻，“文革”的风潮一夜间模糊了一些人的常规理性，他们挖空心思寻找临沂文艺团体中的所谓“黑五类”，“豫剧团戏霸”的帽子就这样栽在了父亲的头上。在那个是非难辨的日子里，他被造反派戴上纸糊高帽游街示众。面对厄运，他心地乐观坦然，把被拉出去挨批斗看成是向观众的另一种舞台“艺术亮相”，把身躯受折磨视为强化武功训练的天赐良机。当那段荒唐闹剧结束后，父亲忠诚党的信念更加坚定，对豫剧艺术的追求老而弥坚；直到他已过知天命岁数上，仍潜心练习须生角色的唱念做打功夫，所扮演的老生角色，唱腔字字厚重，嗓音句句苍劲有力；略带武打动作的老生角色，身手轻灵，开打干净利落，大有英雄气概不减当年的威武之气。

父亲十分重视对青年豫剧演员的培养。剧团每进一批新演员，他都从点滴入手传授舞台经验，从旦角勒头到上场前的服装道具，唱腔发音方式、手脚动作要领等细微处言传身教，鼓励青年一代勇敢登台早日脱颖而出。1981年春天，刚从临沂艺校毕业来到剧团的20多个学生，没有舞台演出经验，这些青年有些畏难发愁。刘瑞堂为他们鼓劲：要成才早登台，演员只有多演戏路才能宽！不几天，他便带上这批年轻人打出“青年演唱团”的旗号到外地排戏巡回演出，几乎每场戏演出前他既当导演仔细说戏，又手把手指导青年们各种化妆技巧，使之达到所扮角色的形式美与内在美的统一。巡回演出一年之后，当这批后生都成为豫剧团的中坚力量时，他们无不感慨地说：“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德艺双馨的老团长为我们付出了心血，我们也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2011年8月，已届87岁高龄的父亲在生命的弥留之际，还念念不忘培养青年人的事，念念不忘他所挚爱的舞台生涯。

临沂地区豫剧团虽然经过文化体制改革发生了变化，但通过父亲刘瑞堂和剧团全体演职人员几十年的不懈奉献，以及剧团演艺影响培养出各地的无数豫剧爱好者，使倍受人们喜爱的那铿锵有力、激情高亢的豫剧之声，依然回响在沂蒙大地上。

# 东夷及其文化发展

中国年鉴

山东地区的原始居民为东夷族。山东是古代文明发展最早的地区之一，从旧石器时代起，这一地区已有古人类居住，创造了人类的早期文明。山东已发现的最早的猿人化石是沂源县骑子鞍山出土的“沂源猿人”，距今已有四五十万年的历史。新泰乌珠台曾发现了一枚古人类的左下臼齿，距今约一万余年。进入新石器时代，东夷文明获得了更大的发展，并形成了自成体系的文化发展序列，即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这种自成体系的文化发展序列表明，生活在远古山东地区的原始居民是东夷族属的居民，他们创造的远古文明成为中国远古文明的主要代表之一。

关于“东夷”，《说文解字》说：“夷，东方之人也。从大从弓。”段文裁注：“东夷从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寿，有君子不死之国。”从“夷”字的字形看，由“大”和“弓”组成。“大”字即人的正面形象，人负弓，表明了东夷族人最初以射猎为生，并具有尚武的习俗传统。所以《说文通训定声》说：“夷，东方之人也。东方夷人好战，好猎，故字从大持弓会意。大，人也。”东夷人还以“仁”德著称，联系到在以后于这一地区产生的讲求仁德的邹鲁文化，可知东夷文化影响的深远。古代东夷族的领袖有太昊、少昊和蚩尤。

太昊是传说中东夷族最早的领袖，现在也把“太昊”看做是东夷最古老的部落集团。太昊又作太皞，据《左传·昭公十七年》，太昊部落活动的中心地区在陈，也就是现在河南的淮阳。但又据《左传·僖公二十一年》，其中有“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太皞与有济之祀”的说法。而根据杜预的注释，“任”即任城，在今山东济宁境内；“宿”为无盐，在今山东东平境内；“须句”为须昌，在今山东东平境内；“颛臾”即武阳县，即今山东平邑县境内。也就是说太昊的后人封地都在今山东鲁南地区，所以可





以断定，太昊部落的活动区域在豫东鲁南一带，且有一种沿着古济水由西向东发展的趋向。太昊为风姓，有学者认为“风”即“凤”。从中也可以得出这样一条信息，即东夷族是以“鸟”为图腾的古老部族。

少昊又作少皞，是古东夷族的另一位领袖人物，亦被视为继太昊族之后兴起的东夷族的又一支部族。少昊亦以鸟为图腾，在族源上与太昊大概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少昊族的故地在曲阜，曲阜被称为“少皞之虚”。少昊族的后人封地如费、莒、郯，在今费县、莒县、郯城一带，鲁南是少昊族的主要活动区域。

蚩尤是东夷族的又一个重要的部落。蚩尤曾一度是一个以武力强盛称雄天下的部落集团，所以东汉学者应劭说：“蚩尤，古天子。”《周书·尝麦》说：“命蚩尤于宇少昊，以临四方。”所谓“于宇少昊”，应为“宇于少昊”，亦即居于少昊故地的意思。蚩尤族曾沿黄河西进，先后与炎黄族在中原地区发生了剧烈冲突，虽一度得势，最后却被击败。但由于他们骁勇善战，死后被奉为战神。传说蚩尤的陵墓在东平郡和山阳郡，即今山东的鲁西南地区，蚩尤的族属为东夷族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自蚩尤之后，炎黄集团与东夷集团的关系日趋缓和，并组成了一个庞大的部落联盟，共同创建了最初的华夏文明。唐尧、虞舜之际，东夷族与炎黄族和平共处，他们的领袖轮流担任当时部落联盟的领袖。如尧为炎黄族，他担任部落联盟的领袖时建都于平阳，平阳在今山西省临汾境内。尧后舜为部落联盟的领袖。舜为东夷之人。

《墨子·尚同》说：“古者舜耕历山，陶河濒，渔雷泽，尧得之服泽之阳，举以为天子，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历山在今山东济南，河濒在山东定陶，雷泽在山东菏泽，都在现在的山东境内，所以孟子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诸冯，即今山东诸城。舜后炎黄族的夏禹担任部落联盟的领袖。但随着当时生产力的发展，逐渐出现了剩余产品，私有观念也逐渐形成。夏禹利用自己的地位与权力，开始为自己的宗族谋利益。按照夷、夏轮流掌权的原则，夏禹应该在身后把权力交给东夷族的领袖皋陶，但皋陶死得很早。东夷族又推举伯益作为皋陶的继任者。但夏禹却暗地积极培植其儿子启的势力，以图传位于自己的儿子。夏禹死后，启公然破坏了夷夏同盟，自己夺取了权力。据《竹书纪年》记载：“益干启位，启杀之。”也就是说启杀伯益，自己取得了政权，开了世袭制度的先例。在中国古代的传

说中，尧舜禹时代实行“禅让”制度，即“选贤与能”，担任领袖。这是以后的儒、墨两家杜撰出来的一种理想的制度，而在历史的真实中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真正的民主制度应该是文化发达民智开启的先进时代的产物，在远古的蒙昧时代是无法实行的，而部落联盟内部部落领袖的轮流执政掌权却是可能的。这也是维护夷、夏联盟的重要政治举措。夏后启杀伯益建立夏朝后，东夷族与炎黄族的同盟宣告破裂，从此开始了新一轮的夷夏之争。

东夷族人曾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他们在文化上的贡献，不仅见诸传说与史载，而且还得到了考古发现的印证与支持。著名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是东夷族的文化遗存。将这些资料加以综合，主要有以下发明创造。

弓箭是东夷族人最先发明创造的。弓箭的发明是远古人类的一个重要的创造，它使得狩猎经济有一个飞跃的发展，使人类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有一个质的进步。从传说看，《山海经·海内经》说：“少暉生般，般始为弓矢。”《礼记·射义》疏引《世本》说：“挥作弓，夷牟作矢。”《说文解字·矢部》也有“古者夷牟初作矢”的说法。“夷牟”即“牟夷”，是东夷族的一支，最初居住于半岛地区。尽管对弓箭具体的发明者说法不一，但弓箭为东夷族人首先创造似乎没有歧见。联系到“夷”字为人负弓之形，更印证了这种说法。从考古发现的材料看，从后李文化（距今约8000年）、北辛文化（距今约7000年）遗址中，都发现了骨质和蚌质的箭镞，从实物资料上说明了传说的可信度。

在陶器的制作方面，东夷人处于当时的领先地位。大汶口墓葬中出土的陶器极为丰富，前期的陶器大多采用手制，后期出现了轮制，陶器的数量和质量都有长足的发展。陶器中有精美的彩陶和光洁的白陶，器形已有鼎、觚形杯、豆、壶、背壶、罐、盆、高柄杯、盘、缸、瓶、尊、钵、碗、陶鼓等。龙山文化中最令人瞩目的文化成就是黑陶。在龙山文化时期（距今约4500年），东夷人在制陶技术上取得突破，他们使用较先进的轮制技术，制造出了一些薄胎黑陶。这种黑陶壁薄如蛋壳，强度又高，号称“蛋壳陶”。又由于用鹅卵石等坚硬而光滑的东西在半干的陶坯上精工打磨，使陶器表面光滑且带有光泽。加之陶窑经过改进，封闭严密、窑温较高，又用烟熏法对陶器进行渗碳，烧制出的陶器呈现出乌黑色，质地致密，防渗性强。其中有一部分黑陶在制坯过程中经过刻镂，造型纹饰美观，反映了东夷人较高的审美观念，成为极富价值的工艺产品。在制陶的材料中，除利用天然粘土外，东夷人还使用了高岭土作原料，烧制了少量表里很白净的陶，为原始瓷器的出现做了最初的尝试。鉴于龙山文化时期东夷人高超的制陶水平，龙山文化又被称为“黑陶文化”。

东夷人还在古代的乐舞艺术方面有重大的贡献。古代有太昊“灼土为埙”的传说，埙是中国最古老的乐器。《山海经·海内经》说：“帝俊生晏龙，晏龙为琴瑟。帝俊有子八人，是始为歌舞。”帝俊，许多学者考证其为契，亦商族的祖先。东夷人善乐舞，自古已然。《后汉书·东夷传》说：东夷“喜饮酒乐舞”，这和东夷人豪爽的性格也相符合。从考古资料看，东夷的乐器发明历史悠久。1979年在山东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墓葬中曾出土了一个笛柄杯，能够吹奏出4个不同的乐音，音响清脆悦耳动听，与近代横吹竹笛不贴膜时发出的音响相似。这是迄今已发现的我国最早的陶制横吹管乐器。据有关专家研究，与仰韶文化出土的陶埙相比，“笛柄杯发出的音乐更多，且出现了半音程，这是迄今发现夏以前的乐器中前所未有的”。

东夷族文明的发展还表现在金属冶炼和制作中，他们可能是古代中国铜和铁的最早发明者和使用者。据《大汶口发掘报告》称：“大汶口晚期的成年男女合葬墓1号墓曾发现一个带有孔雀绿色的骨凿，经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化验，含铜量为9.9%，证明为铜质所污染。”至于污染源，或认为是铜器，或认为是含铜的孔雀

石，但当时的东夷人已经对铜及铜矿石有了认识或利用，却是不争的事实。到了龙山文化时期，铜器的使用较为普及，出土铜器的地点较多，虽然多为小件铜器，却是处于发明的领先地位。铁的发明使用也与东夷族有密切关系。最早的“铁”字是“从夷”的。《说文》说：“𦍋，古文铁，从夷。”夷人可能是铁的发明者。由上可知东夷人为中国古代冶金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东夷族相当发达的物质文明，为其精神文明和制度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所以东夷族无论在文字的创制，还是礼制、宗教的形成上，都走在了时代的前列。

文字的创制是古代文明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是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最早的文字，当是东夷人的创造。《潜夫论·五德志》有“少皞始作书契”的说法。这一说法得到了考古发现资料的证明。最早的图形文字“陶尊文字”出现在大汶口文化晚期的文物上。这些文字以图象为主，均刻于一种特殊的陶器——大口尊的外表，并且每件器物上一般只刻1字。至今已发现了20余件标本，其中不重复的单字近10个。如仅在莒县陵阳河遗址就出土了4件灰陶尊，各刻有1个图形文字，分别为“皞”“炅”“戌”“斤”字。1992年，在邹平丁公遗址发现了龙山文化的文字。这些文字刻在一件平底盆底部残片的内面，现存文字计有5行11个字。综观这11个字，个个独立成字，笔划比较流畅，整体排列也比较规则，刻写有一定章法，显然已脱离了刻划符号和文字画的阶段。与大汶口单个图形文字相比较，这11个文字组成了一个短句，记述了一个特定内容，已具有了记载的功能，表明至此已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文字。文字的发明，是东夷族对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做出的伟大贡献。

东夷族是原始礼制的创造者。礼制是一种体现社会尊卑等级的制度形式。东夷族因其经济的发展，较早进入文明阶段，随之原始礼制逐渐形成。东夷族的原始礼制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宫室制度。在山东地区已发现了龙山文化时期古城址4座，即章丘的城子崖、寿光的边线王、邹平的丁公和临淄的田旺。从古城址的发掘看，已具有宫室制度的一些迹象。二是埋葬制度。在墓葬中，已表现出社会的不平等关系。如大汶口文化早期遗址已出现了墓室面积8平方米以上的大墓。到了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址，墓葬的分级制日趋成型，至少形成了7个等级。第一级特大型墓，墓室面积在20平方米以上，多为两椁一棺，并随葬有大量精美礼器、生活用品及装饰品。第二级大型墓，墓室面积10平方米左右，多为一椁一棺，随葬品亦精而多。第三级较大型墓，墓室面积5平方米左右，均为一棺，随葬品较多。第四级至第七级墓葬的规格依次递减，差别趋小，不如前三级明显，说明了“礼不下庶人”的观念已初步产生。三是礼器。礼器是主要用于重要礼仪社交活动的器具，是人们社会等级名分的象征与标志。礼器源于日常生活器具，后逐渐具有了政治功能而成为礼器。最初的礼器大概产生于大汶口文化的早期阶段，主要礼器有玉钺、大口尊、觚、骨雕筒等。随着礼制的不断发展，礼器的种类不断增多，在大汶口文化的中后期，已有玉钺、石钺、骨牙雕筒、大口尊、鬻、觚、高柄杯等。至龙山文化时期礼器趋于专门化，主要礼器有玉钺、玉版、玉冠饰、蛋壳陶杯、黑陶鬯等。其中特别是玉钺，是日益尊贵的最高权力的象征。

值得一提的是，在古代东夷族中已产生了原始的宗教文化。如在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墓葬中龟甲已是常见的随葬品，其中可能具有一定的宗教涵义。至龙山文化时期，已用牛、羊和鹿的肩胛骨作为占卜材料，但有灼痕而无钻凿，攻治方法还比较原始。但这种方法与以后殷商的骨卜和龟卜，却有着前后相承的关系。《管子·五行》篇曾说：“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可见“天道”之学也最早流行于东夷地区。“天道”之学是一种原始宗教与原始自然科学的混杂，其中还包括历法之学和阴阳、八卦之学，由此可以看出东夷文明的博杂和精深。

# 萧鸾杀诸王篡位记

刺史/藩王

南齐江州刺史、晋安王萧子懋（武帝第七子）得知鄱阳王萧锵（高帝十六子）和随王萧子隆（武帝第八子）已经被萧鸾杀死，准备起兵讨伐。他对陆超之说：“事情如果能够成功则朝廷获得安宁，如果失败了，我们也死而犹荣。”

董僧慧说：“江州虽然地域狭小，但是宋孝武帝就曾经从这里起义兵，讨伐杀死了宋文帝的刘劭。现在，我们如果发兵进朝，讨伐萧鸾杀害郁林王之罪，谁能够抵抗呢？”

萧子懋的母亲阮氏住在建康，萧子懋派人秘密传书把她接来。阮氏把情况告诉了自己的同母哥哥于瑶之，与他商议，谁知于瑶之立即快马报告了宣城公萧鸾。

朝廷授萧鸾黄钺，内外戒严，派遣中护军王玄邈讨伐萧子懋，另外又派遣军主裴叔业与于瑶之先去袭击寻阳，并且让他做郢府司马。

萧子懋得知消息后，派遣300人守卫湓城，裴叔业逆流而上，到了夜间，又突然回过头来奔袭湓城，城局参军乐贲打开城门，迎接裴叔业的军队进入城中。

萧子懋听说湓城落入裴叔业手里，便带领府州兵力据城固守。萧子懋的部下大多是雍州人，都自告奋勇，跃跃欲试。

裴叔业害怕了，派遣于瑶之去说服萧子懋。于瑶之对萧子懋说：“你现在如果能够主动放弃，回到京城去，一定不会有什么担心之处，正好可以做一个闲散之官，仍然不失富贵荣华呀！”

萧子懋由于没有出兵攻打裴叔业，部下的情绪就渐渐沮丧低落。中兵参军于琳之是于瑶之的哥哥，他力劝萧子懋以重金贿赂裴叔业，可以免除灾祸。

萧子懋于是派于琳之前去，但是于琳之又劝说裴叔业捉拿萧子懋。裴叔业派军主徐玄庆带领400兵士随于琳之进入江州城，萧子懋手下的官员们见状



纷纷奔散逃命。

于琳之领着200人，手执刀剑进入萧子懋的住处。萧子懋见此情形，大骂于琳之：“你这无耻小人，怎么能忍心干出这样的事呢？”于琳之用衣袖遮住自己的脸，让人杀死了萧子懋。

王玄邈抓住了董僧慧，将要杀他，董僧慧说：“晋安王萧子懋举义兵、讨逆贼，我确实参与了策划，现在能为主人而死，死而无怨！但是，希望能在晋安王的大殓之礼举行完毕后，我再回来受死。”

王玄邈觉得董僧慧非常有义气，把前后情形报告给了萧鸾，结果董僧慧免于处死，被发配到东冶去做苦工。

萧子懋的儿子萧昭基当时年龄才9岁，他以二寸见方的丝帛写成一封信，打听董僧慧的情况，并送去500钱，信与钱都送到了，董僧慧看了后说：“这是小公子写的啊！”于是悲恸万分，气绝而死。

于琳之劝说陆超之逃跑，陆超之却不为所动，并且对他说：“人迟早都有一死，这丝毫也没有什么可畏惧的。我如果逃亡了，不但已经死去的晋安王的家眷孤单无人照料，恐怕田横的门客也要笑话我！”（田横，齐国贵族，汉高祖刘邦统一天下后，田横不肯称臣于汉，在距洛阳30里地的首阳山自杀，他的500部属听说田横死了，亦全部自杀）

王玄邈等人想把陆超之押送到京都，陆超之端坐不动，等待他们前来抓捕他。他的门生认为杀了陆超之一定能得到重赏，就偷偷地从背后把陆超之杀了，但是他的头虽然落地了，身子却不倒下去。

王玄邈以丰厚的物品装殓了陆超之，为他殡葬，那个门生也来帮忙举棺入葬，结果棺材突然坠下，压住了门生的脑袋，折断了脖子而死。

萧鸾秘密派遣平西将军王广之去袭击南兖州刺史、安陆王萧子敬（武帝第五子），王广之到了欧阳，就派部下将领陈伯之为先驱，前去袭击。陈伯之到达之后，见萧子敬毫无防备、城门大开，就率先而入，斩杀了萧子敬。

萧鸾又派遣徐玄庆去西边杀害诸位藩王。临海王萧昭秀（高帝孙）为荆州刺史，何昌主持州中事务。徐玄庆到了江陵之后，想不经奏报直接作出处置杀了临海王。

何昌义正辞严地说道：“我受朝廷之委托，辅佐临海王，殿下并没有什么过失，你只不过是别人派来的一个使臣，如何就能让我把殿下交给你呢？如果圣上一定索要



殿下，我自己会启奏陈述，等待圣上的答复。”

徐玄庆的目的没有实现，于是，萧昭秀才得以回到健康。

萧鸾派吴兴太守孔琇之主管郢州事务，想让他杀害晋熙王萧铄（高帝十八子），孔琇之坚决推辞不干，但是萧鸾不同意，一直逼迫，于是孔琇之绝食而死。

裴叔业从寻阳出发，直奔湘州，想要杀掉湘州刺史、南平王萧锐（高帝十五子）。萧锐属下的周伯玉对众人大声说道：“这并不是天子的命令，如今，我要杀了裴叔业，举兵匡扶社稷，谁敢不从！”

萧锐的典签喝退左右的人，斩杀了周伯玉，又杀害了南平王萧锐，郢州刺史晋王萧铄、南豫州刺史宜都王萧铿（高帝十六子）也同时被杀害。

宣城公萧鸾又被加封为太傅、领大将军、扬州牧、都督中外诸军事，加殊礼，进爵为王。

萧鸾本是齐高帝萧道成的侄子，自幼父母双亡，由萧道成抚养长大。萧道成不仅养大了他的人，也养大了他的野心。身为萧氏旁支的他一心想篡位当皇帝，因此广为招揽朝廷名士参与筹谋。

侍中谢朓心里不愿意，于是就请求出任吴兴太守。他到任之后，给担任吏部尚书的弟弟谢朓送去好几斛酒，并且附信一封，信上说：“可以尽量饮酒，不要参与人事。”

萧鸾虽然一手专权、独断国政，但是人们并不服气。他的肩胛处有一个红色的痣，谏议参军江祐劝他出示给人看。

萧鸾就出示给晋寿太守王洪范看，并且说：“人们说这个痣是日月的贵相，你一定不要向外泄露。”

王洪范回答说：“大人您有日月在身，怎么能够隐瞒呢，我应当转告给别人。”

桂阳王萧铄（高帝第八子）与鄱阳王萧铿名气相等，萧铿爱好并擅长文学，萧铄爱好并擅长玄理，当时人们称之为鄱、桂。萧铿死后，萧铄即感到不能心安，他到东府去拜见宣城王萧鸾，回来之后，对手下的人说：“刚才萧鸾接见我的时候表现的十分殷勤周到，一付流连忘返的样子，可是脸上有惭愧的样子，这一定是想杀掉我。”当天晚上，萧铄即遇害。

宣城王萧鸾每杀害一个藩王，总是于夜间派兵包围其住所，翻墙破门，呼喊而入，把他的家产全部查封没收。

江夏王萧锋（高帝十二子）德才兼备，萧鸾曾经对他讲道：“始安王萧遥光极有才干，可以委以重任。”

萧锋回答说：“萧遥光之于殿下您，正如殿下之于高皇帝一样。卫护宗庙、安定社稷，他确实可以寄予厚望。”

萧鸾听萧锋如此一说，被人点破了心事，不禁大惊失色。等到萧鸾大杀诸位藩王之时，萧锋派人给萧鸾送去一封信，在信中嘲讽、斥责他。

萧鸾因此非常害怕萧锋，不敢到萧锋的住所去抓获他，于是就让萧锋在太庙中兼任祠官之职，然后在夜里派兵去庙里捕获他。

萧锋从太庙中出来，进到自己车中，那些前来杀他的兵士也要上车去，但是萧锋不让他们上来，他力气非常大，徒手与这些人击打，使好几个人倒在地上起不来，然后被杀。

# 英雄连长张文祥

高 雷

张文祥，短小身材，脸孔瘦削，有些麻点，眼睛不大。1920年出生于江苏省丰县。他7岁就给地主放牛、帮工，16岁被国民党军抓了壮丁，曾在七支不同番号的队伍里当兵。1939年8月，身为班长的张文祥带领全班11人、四支匣子、四支手提式投奔八路军，在山东微山湖西的八路军一一五师苏鲁豫支队第二大队当战士，不久任代理班长。

张文祥参加八路军后，思想进步很快，作战非常勇敢。在谷亭、玉皇庙、兑头沟、小岗、半庄等战斗中，他猛打猛冲，敢于刺刀见红，多次负伤不下火线。玉皇庙战斗，他负伤昏死过去，是群众把他抬下来的；兑头沟战斗，他被日军刺破肚皮，还坚持搏斗，终因体力不支被鬼子兵压倒在地，是李排长一枪结果敌人才救了他的命；半庄战斗，他只身冲上炮楼，连续消灭十几个敌人，自己腰部中了十几块弹片，但他满不在乎，直到全部消灭敌人，才去治伤。在这以后的华岩寺、金堂、陈庄等战斗中，他都挂过花，这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根本不当做一回事，治好了照样参加战斗。张文祥自嘲说：“奶奶个逼，真倒霉，每次战斗总要打个窟窿。”他先后负伤13次，从头上到脚下，大大小小总共有40多处伤疤，每个伤疤都记载着英雄的故事，浑身上下简直就是一本功劳簿。医生给他的残废证，前后有三张，但他仍留在前线。他常说：“想起为民族解放，为党的革命事业，就觉得浑身都是勇气。”

---

张文祥参加八路军后，随队在微山湖西开展游击战，打的头一仗便是1939年3月的谷亭镇战斗。

“这是到八路军的头一仗，一定要打得漂亮。”这种心理支配着他，鼓舞着他。夜间，他带着投弹组，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因为性急，光想打好仗，走得太快了，和后面队伍失掉了联系，结果被对面的敌人发现，两边打上了。

“奶奶的，不管那个，冲呀！”他一面喊着，一面带着五个战士冲了上去。

直到把前面伪军的枪缴了，后面的队伍才赶到，立即包围了围子。

第二天白天，他又带了五个人，在火力掩护下，一次又一次地冲锋。最后五个人，一个牺牲四个挂花，他才退下来。

晚上，他当了突击班长，在猛冲的时候，他第一次负伤。谷亭战斗后，张文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紧接着是玉皇庙战斗，一万多日伪军扫荡冀鲁豫，张文祥带着敢死队在玉皇庙阻击敌人，苦战一整天，血流成河。黄昏时分，张文祥脑袋像被重锤击打一样，血流满面，软绵绵倒在了地上。

他昏迷之中似乎听到了枪炮声，听到了鬼子的嚎叫。

他清醒过来的时候，远处的公鸡在打鸣，他像做梦似得，不明白为什么睡在这荒郊野地。他晃动了一下脑袋，头痛欲裂，他侧着身子，慢慢睁开眼，在晨曦中，他看见身旁躺着几个死去的鬼子，看见自己流下已经凝固的血迹，他记起了昨天的血战。

他翻过身，看见这边有一老头，背着粪筐，拿着粪叉子，正在死人身上寻找东西。

“老大爷！”微弱的喊声惊动了老人，恐慌中老头转身欲跑。

“大爷，不要走。”张文祥喊住了老人。

“大爷，队伍哪里去了？”

“昨天晚上开走了。”

“你送我找队伍，我给你钱。”

“送你回家吧。打仗挺可怕。你看死了怎么多人。”

“不回家。我要找队伍，给你400块钱。”

老人找来几名老乡，抬着他，去寻找队伍。从老乡的嘴里他才知道，昨天的血战，天黑后双方很快都撤走了，留下了一地的鬼子兵尸体。

三天后，张文祥又重新回到了部队。

## 二

鲁南兑头沟战斗，是八路军东进支队（一一五师苏鲁豫支队第二大队）进军抱犊崮途中的神来之笔，这次战斗中歼灭了鬼子一支运输队。张文祥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9年12月25日拂晓，90余名鬼子羁押着60余辆牛车，装载了在扫荡中抢掠的大批物资和部分弹药，缓慢地行走在滕县到费县的土路上，行至兑头沟，枪声突起，日军遭到伏击，措手不及，被毙伤一部后深陷东进支队的包围圈。

战斗持续到下午，日军突围未逞，以部分兵力抢占了东南侧小岭，固守待援。东进支队第二大队坚决不让敌人喘息，集中兵力向日军发起连续进攻，张文祥他们排五班冲到前沿和鬼子拚起了刺刀，张文祥带领四班，抄到鬼子背后，一阵猛袭，打死了七个鬼子。

黄昏，第二大队将日军逼至沟底，队伍冲锋五次都没有成功。张文祥气愤极了，召集了七名战士，带足手榴弹，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冲上前去。随着一阵手榴弹的爆炸声，鬼子向牛车后面退去。

战士们一天没吃饭，占领了前哨阵地，把敌人煮好的大米饭和罐头，饱餐了一顿。



冬夜的月亮把小岭周围照得惨白惨白，火光中，日军开始突围，二大队集中9挺轻重机枪以密集火力，掩护反冲锋。战士们在沟底与敌人展开了肉搏。瘦小的张文祥与一个粗壮的鬼子拼在了一起，边退边寻找着时机，一不留神，被后面的石头绊倒在地，鬼子的刺刀划破了他的肚皮，血流了出来，张文祥正想爬起来，鬼子乘势把他摁倒在地，他心里想：“这回可完了。”

枪声中，鬼子颤抖了一下，血淌在了张文祥脸上，他翻身爬起，一刺刀将鬼子捅死，看见排长正站在他的身旁，是排长开枪救了他。

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二大队将日军运输队长小林等95人全部歼灭，缴获迫击炮1门，电台1部，及牛车60余辆所载的全部物资。

### 三

张文祥伤愈刚从医院回来，又参加了半庄战斗，他又被任命为投弹组长。

战斗打响不久，排长就牺牲了。张文祥捡起排长的匣子枪，在机枪的掩护下，顺着梯子向炮楼上爬。刚爬到梯子的半截，炮楼枪眼里伸出一只匣子枪，朝正在登梯而上的张文祥“叭”地打了一枪。

张文祥从梯子上掉了下来。他定了一下神，身上并没有中弹，只是胸部难受，咳嗽出一口血来，旧伤口有些隐隐作痛。

指导员在远处向他喊，让他撤回阵地。他口里骂着：“奶奶的，打不死非爬上去不行。”

我们的机枪又开始射击了，张文祥迅速地爬到炮楼顶层，身子紧贴炮楼，掏出四枚手榴弹，将铁环全都抠出来，起劲一拉，塞进了炮楼的枪眼，随着里面的爆炸声，张文祥双手勾住枪眼边沿，一纵身翻进炮楼。他看到楼板上躺着六具尸体，一挺捷克式轻机枪和四支步枪横在地上。

后面战士上来了。张文祥接过战友递过来的一袋手榴弹，拉开弦，向炮楼底层投下，炸得敌人哭爹喊娘。

突然从下面飞上来一个手榴弹，在张文祥身后爆炸了，张文祥的腰部中了十几块碎片。他又负伤了。

### 四

“可倒霉了！”张文祥感叹说，“打小岗子，我们两个人追敌人，缴了一箱子子弹，奶奶个逼，一颗子弹打在我的脊梁上，一休息就是5个月，在后方住那么久，真是急死人！”

回到部队后，他马上参加了邳县的铁佛寺战斗。

太阳偏西南，张文祥他们连攻入了围里，敌人慌不择路，到处乱窜。有一个家伙扛着一挺机枪拼命地跑，张文祥高喊着“缴枪不杀”，奋起直追。

那家伙回过头来，端起机枪就搂，没有打响。张文祥赶到跟前缴了他的枪，一挺捷克式扛在了张文祥肩上。

1940年在临沂打汉奸据点，张文祥小腿挂了彩，咬住牙冲进围子，缴获了两支快慢机，两只匣子枪。

花岩寺、金堂、陈庄三次战斗，张文祥又挂了三次花。

本来偷袭杜圩子是四班主攻，五班佯攻，但张文祥却带着五班率先冲进围子。

敌人从梦中惊醒，占据房屋顽抗。

张文祥贴着墙，往里扔手榴弹。在两腿中间，有敌人的一个枪眼。开始他还注意，把两腿分开。战况激烈之时，张文祥全身心地投入，忘记了脚下的隐患，两腿一合，一颗子弹穿进他的小腿，当时碎骨就和血一块流出来。

这次伤重，他整整休养了一年。伤虽然好了，腿却落下了残疾，行动很不方便。医生给他办理了残疾证，张文祥不承认是残废，说啥也不要，伤好就直接回到部队。

俏皮的同志送他一个外号：“条半腿”。

“条半腿也是光荣的呵！”张文祥高兴地回答。

## 五

1942年3月，张文祥他们连参加了沭阳刘凤庄战斗，增援的敌人把三连打散了。副连长牺牲，机枪班、张文祥班陷入了敌人的包围圈，机枪班长着急地叮嘱张文祥：“这三挺机枪就托付给你了。”

张文祥坚定地说：“死完了，也不会丢机枪。”

敌人冲上来了，我们的机枪怒吼了。敌人潮水般地退了，副班长乘机带着两挺机枪突了出去。

张文祥抱住一挺机枪，四盘子弹打光了，他又用步枪掩护着战友一个个突围。

天已经晌午了，阵地上只剩他一个人，这时，敌人从四面八方围了过来，咋呼着“抓活的，抓活的！”

张文祥临危不惧，冷静地寻找着敌人空隙，瞬间冲出敌群。一个敌人扑上来抓住了他的左臂，他使劲一挣，扯断了袖子，继续往前跑。敌人一大群跟在后面直追。

张文祥寻思：“奶奶个逼，这回真倒霉，大概逃不脱了。”他边想边从衣袋里摸出了组织介绍信，吞到了肚子里。

又一个伪军拦住了张文祥的退路，张文祥拔出了刺刀，伪军一闪，张文祥又窜了出去。并顺手扔出了一颗手榴弹，手榴弹未响，敌人全惊慌卧倒在地。

张文祥已跑出了几十米，身后伪军的机枪响了，张文祥感觉到脖子上，背上，屁股上像石子砸着一样痛，他坚持往前跑，直到把身后的敌人甩掉。

突围出来的同志正在远处等他，看到他浑身上下血糊糊地跑回来，连长问：“张班长，伤着哪儿了？”

张文祥这才发现自己负了伤，他喘着气伸手去摸后脖子梗儿，硬硬的，像有个钉子钉在那儿，使劲一拔，原来是一颗弹头，他又从背部和臀部抠出两颗，排长又帮助他拔出一颗，还有一颗弹头嵌进肉里，是医务所军医给拿出来的。

为什么这么多子弹这么近距离都打进身体里还没有大碍，大家都百思不得其解。

## 六

张文祥各方面表现突出，很快被提升为副排长、排长。1944年8月1日，山东军区召开第一次战斗英雄大会，共选出17名一等战斗英雄，张文祥是其中一位。

1945年8月上旬，张文祥随部队参加了滨海军区讨伐伪军李永平部“滨海警备军”的战役。8月中旬，张文祥所在的滨海军区第十三团被编为山东军区第一师第二团。张文祥是二连副连长。9月间，张文祥率领连队参加了诸城战役。10月，部队奉朱德总司令关于反攻日军的命令，千里跋涉，奔赴东北。挺进东北的时候，他是有名的‘条半腿’，走了几千里路，他不但没掉队，而且常常帮助掉队的同志背步枪，背机枪，给掉队同志很大鼓舞。休息的时候，他还常常指挥战士们唱歌。



秀水河子战斗中冲锋陷阵的解放军战士

1945年11月，部队进入东北锦西兴城一带。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张文祥任一师二团三营八连连长。

1946年2月11日，国民党十三军九十五师二六六团全部及二六五团一个营配属山炮营、运输连等在秀水河子会合。他们自恃有远征缅甸的荣耀和全部美械装备，非常傲慢地进占了秀水河子，准备攻击民主联军总指挥部驻地法库。

秀水河子位于彰武、法库之间，北山和西山是制高点。总部命令一师七旅于12日上午完成对秀水河子的包围。张文祥这个连奉命抢占秀水河子北山。北山离秀水河子8里，敌设重兵布防，是我军必须首先拿下的据点。北山的得失是整个战斗成败的关键。13日17时20分，我军发起肃清敌外围的战斗。炮兵向秀水河子北山上的敌人作压制射击后，张文祥即带领连队向制高点发起冲锋。他风驰电掣，冲在最前面，飞起一脚，踢倒了敌机枪射手，抓起发红的机枪朝溃退的敌人猛烈射击，掩护连队冲上山来，控制了制高点。敌人被压到村子的围墙边后，深知北山的重要性，全力组织反冲锋，机枪打出的曳光弹划出一道道红线，火箭筒打出的燃烧弹把雪地烧红了，有的战士被烧成了火人。八连挤在30多米长的一块坡地上。这时，张文祥已多处负伤。为了抓紧战机，他拒绝包扎，鼓励战士们说：“我们八连没有攻不下的阵地，同志们跟我冲！把敌人压下去！”敌人的冲锋一次次都被八连打垮了。在第八次反冲锋的时候，张文祥带领连队朝村北围墙继续冲击。不料一颗子弹飞来，击中了他的胸膛。他踉跄了几步，瞪眼看着围墙边的敌人，一声“同志们冲啊！”还没喊完，便倒了下去。张文祥牺牲时仅26岁。

北山战斗保证了秀水河子战役的顺利进行。14日拂晓前，经过激烈的巷战和逐屋争夺，民主联军终于消灭了敌人，共歼国民党军1600余人，缴获各种炮30余门、轻重机枪100余挺、步枪800余支、汽车200余辆和其他军用物资。1946年8月，部队在阿城召开群英会，张文祥烈士被评为战斗英雄，命名八连为“张文祥连”。

张文祥作战勇敢，但为人谦虚，牺牲前记者采访他战斗与学习情况时，他爽直的说：“认不到50个字，学一个忘一个，同志们都叫我不爱学习的老祖宗。”

# 《沂州府志》与蒙山蒙顶茶

丁富强

蒙顶茶，是明清沂州志书中记述的产在境内蒙山之顶的一种茶。史载，康熙皇帝南巡晚住蒙阴县，早观蒙山积雪时，“见土人缒石取蒙顶茶”，后将蒙顶茶“遣使驰进两宫”。清雍正十二年沂州撤州设府，辖一州六县，沂州知府李希贤在撰修的《（乾隆）沂州府志》中确认，蒙顶茶并非叶茶；同时将明王越诗“应是人间第一茶”的颂赞对象产地定为四川蒙山。200多年过去了，沂蒙茶蓬勃而起，名茶日多。但明王越诗“应为人间第一茶”的诗句，是指东蒙之茶还是西蒙之茶的争论仍在继续，以此诗证明地产茶的历史之悠久，质量之优越。蒙山蒙顶茶是何茶？到底产自西蒙山还是东蒙山？

## 蒙顶茶的提出

据《（乾隆）沂州府志》卷之首《纪·巡幸》载：1685年，康熙皇帝南巡，十月十三日来到蒙阴。“值雪，侍臣奏：明日小雪。圣祖喜，其应候十四日辰刻，观蒙顶积雪”。第二天康熙皇帝登上蒙山，一“见土人缒石取蒙顶茶”，二见“渡沂水取鱼”。之后，皇帝将蒙顶茶、沂河鱼“遣使驰进两宫”，此为临沂历史上蒙山蒙顶茶首次进宫的记录。

蒙山之上野生茶树，康熙皇帝看到的是“蒙顶茶”是树茶吗？时间过去200多年，我们仍鲜知其详。茶农“缒石”取茶，缒，意为是用绳子缚住身体，从高处降下摘取茶叶。如果是树茶，说明是长在悬崖之上的野生茶树；但十月初冬，又值小雪，茶树定无新叶可采。将蒙顶茶、沂河鱼快马扬鞭送入京师，鱼可由御厨烹制，而未曾加工炒制的茶树老叶“遣使驰进两宫”有何意义？蒙阴知县作为美景推荐于皇帝，想必蒙山山崖之上的野生古茶树有着较高的知名度，或传承于大众之口，或记载于县志之中。但翻遍《（光绪）费县志》和《（宣统）蒙阴县志》“物产”，旧志中再无“古茶树”的信息。

由此可以推断，康熙皇帝登蒙山看土人取茶，并非蒙山之崖生长的野生茶树之叶，想必另有它茶。

## 旧志中对蒙顶茶的记述

蒙山，西与龟山相连，绵亘65千米，其北为蒙阴，其阳为费。明代，蒙阴、沂水、莒州、日照四州县为青州府所辖，沂州、郯城、费县为兖州府

所辖。编撰于400多年前的《（万历）兖州府志》《（嘉靖）青州府志》，在地理志“山川”中，都把蒙山茶作为境内重要特产作了记述。

编修于456年前的《（嘉靖）青州府志·卷六·地理志》：“蒙山延袤八十余里，禹贡蒙羽其艺，山顶产云芝茶，远近珍之。”编修于421年前的《（万历）兖州府志·卷三·山水志》）和《（乾隆）沂州府志·卷二·山川》：“蒙山，山顶有白云岩，采石花为茶，其味芳烈，更异他品。”《（乾隆）沂州府志·卷三十五·艺文》董仲言诗《蒙阴道中》：“妇人入山收橡实，憨僧刮石取膏茶”。茶禅一味，佛寺僧人修行不可无茶。既然无树茶可饮，只好自己动手采石花以为茶。白云岩在何处？在今平邑县境内，蒙山的中南部。“龟蒙之东南迢递而下，蔚然深秀者，即白云岩也。”白云岩东至龙山，西至虎山，南至照山，北至大顶山，山林面积近700公顷。近年来，经过蒙山管委会的修葺，白云岩道士林重树碑碣，清扫墓冢，原貌恢复，景象一新，成为一处景色优美的旅游风景区。这是我们所看到的最早的关于蒙山产茶的记载。

旧志所记说明，蒙山茶并非野生茶树，而是一种采自于蒙山岩石上的“石花茶”，又名“云芝茶”。清代王运升有《蒙山茶歌》：“凡茶皆是水所胎，未闻石亦有根核。独见东蒙山之顶，数石产茶不须栽。云雾氤氲精华聚，不枝不干天花开。不知产在绝巔上，非在山腰他石堆。采者梯倚千寻壁，些子疏虞七尺隄。不见白骨横岩下，谁识茶从险处来。”清代朱克生在《蒙山记》：“土人采蒙茶者，始得缒绳而下。茶产石窠，形如石藓……脚下皆云生处也。”由此可以推断，康熙皇帝登蒙山看土人缒崖取茶，所取非树之茶，而是“石藓”。

蒙山之上有没有茶树？有。在《（光绪）费县志·卷二·山川附艺文》有一首《蒙山采茶词》，作者为明代蒙阴籍举人张淑躬。篇首有一小注：“采茶风景，游蒙所见大略如此，因道俗情故用竹枝词体。”诗人在游览蒙山后，晚住蒙山山民家。蒙山之上某地生长着大面积的野生茶树，张淑躬亲眼目睹了山民采茶的全过程：“五更餐饭早忙忙，唤起邻家姊妹行。山径不须怕零露，岸头红处是朝阳。牧笛樵歌乱午晴，绿螺深处见人行。携篮不辨茶多少，风度林坳笑语声。几年同住隔溪湾，情谊深深彼此关。今岁采茶多与少，相逢偶语过前山。”“偶来溪上问山村，十户人家九闭门。采得新茶春便好，不嫌蒸晒到黄昏。”诗人用明易通畅的语言，描绘了蒙山深处



云顶茶——石藓

山民起早贪黑、早出晚归采茶的过程。

## 《（乾隆）沂州府志》对蒙顶茶的辨误

旧志的记载证明，境内蒙山产茶有二种：一是生长在蒙山山石上的石藓，靠土人冒险缒崖，踏着脚下白云在石头上取的石藓，名为石花茶，也叫云芝茶。二是野生茶树。

1999年9月，临沂市地方史志办公室编辑出版的《蒙山志》一书。在“沂蒙茶”一节中说：“沂蒙山区种植茶树的历史悠久。明朝景泰年间王越在《咏蒙山茶》诗中称赞蒙山茶‘应是人间第一茶’。蒙山茶，即云芝茶，产于东蒙山，最佳者称昆山叶，有药用价值，性寒，能消积滞”，在这里明显的把石花茶和野生树茶相混淆了。在卷十三“艺文”中，收录了涉及蒙山茶的诗词多首：元代刘思温《蒙顶茶》、明代王越《咏蒙山茶》、清代王运升《蒙山茶歌》、清代王卿士《题蒙山新茶》、清代张淑躬《蒙山采茶词》，为研究蒙山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但细读发现，《蒙山志》所引明王越诗与《青州府志》收录的王越诗有着题目上的不同。一为《云芝茶》，《蒙山志》中则为《咏蒙山茶》。虽是一个简单的题目问题，实际上是涉及到两种不同的茶：石茶和树茶。

不仅如此，蒙山蒙顶茶还存在着产地山东与四川的混淆。明王越赞颂蒙山茶“应是人间第一茶”的诗句，在《青州府志》中认为是对沂州蒙山茶的赞颂，今人编著的《蒙山志》以及众多媒体引用中，仍沿用这一评价。但是，200多年前，时任沂州知府的李希贤在纂修《沂州府志》时，认为赞颂的是四川雅安蒙山蒙顶茶。在《（乾隆）沂州府志》中有二处予以辨误：《（乾隆）沂州府志·卷二·物产》中，把蒙顶茶列入“药属”：“蒙顶茶，盖因西蒙之茶而误以此山之石藓当之，有损无益。”

《（乾隆）沂州府志·卷三十四·艺文》有吴郡人叶泽森《蒙阴云山茶歌》，在序文中，诗人毫不掩饰地写道：“按茶谱，西蜀雅州蒙山五顶各有茶园，惟上清峰者最佳，以受阳气全故。芳香特异，每岁于禁火前，俟雷声发采之。多服能祛疾，唐人最重之，故谚以蒙顶茶配中冷水云。北地原不产茶，费沂之间，山石生衣，土人掬而沃之，讵有茶味，遂也谓之蒙山茶。雅州险远，其茶不可得，竟讹以东蒙之蒙为西蒙之蒙矣。余以蒙阴茶本非木本，乃苔藓之属，性寒而味苦，乃冒蜀山之名以行世，因作歌辨之，以告世之，非其实而伪其备者。”在序文之后，对蜀茶和鲁茶生产品质作了细致的描述，对西蒙之茶用最美的词句进行赞美，并不亚于明王越的赞颂。他把蜀地蒙山茶比喻为蓬莱山众仙人所饮的穆陀树茶，而把沂州府地域所产的石花茶毫不留情的贬损为“一瓿色臭殊作恶，状如疯癖气如木。未能涤壅已成灾，徒然苦口非良药。”

对沂州府境内蒙山蒙顶茶有这样的劣评，《（乾隆）沂州府志》全文收录，主持撰修志书的李希贤是没有看到还是同意保留？我认为当为后者。李希贤为四川长寿人，自然知晓四川雅安蒙山蒙顶茶的历史：早在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蒙顶茶就入贡皇室。明王越景泰三年（1452年）奉命巡按四川一年，对入贡皇室的雅安蒙山蒙顶茶给予“应是人间第一茶”的赞美，实至名归。作为四川人的李希贤知府对王越的这首诗不会不知。他治沂州府七年，修文庙，建考棚，劝垦荒，一代贤吏，对蒙山蒙顶茶（云芝茶）赞美为“人间第一茶”是否恰当，心知肚明。何况，在《（乾隆）沂州府志》修志人员中，“费县知县直隶南宮王国栋，蒙阴县知县江西广昌魏运嘉”赫然在列。各州县有资格享用国家钱粮的成绩最好的“廩膳生员”也参加编修府志：费县廩膳生有李梦麟，蒙阴县廩膳生有王广大、公淅、秦敦彦、秦克振、宋廷

珠，家乡人编写志书，对蒙山蒙顶茶是如何一种质量不会不知。

《(乾隆)沂州府志》中对蒙顶茶产地是东蒙还是西蒙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辨误，并收录于府志之中，以传后世，想必诸编修人员达成了共识，得到了沂州知府、蒙阴费县知县及廩膳生员的肯定，直至最后钹版成书。自此之后，蒙山云芝茶与蒙山野生茶树的记述消失于人们的视野，旧志中再无提及。

### “云芝茶”和石藓

旧志告诉我们，“云芝茶”并不是茶，而是石藓。不仅如此，在明清学人的著作中，也频频指出云芝茶非茶类，是蒙山石头之上所生的苔藓。清人赵学敏（公元1765年）在所编《本草纲目拾遗·卷六·木部》一书中，对“云芝茶”进行了专门记载：

“山东蒙山在蒙阴县城南三十里，高二十里许，周遭约三百余里，产茶曰云芝茶，土人售于市曰蒙山茶，然绝非茶类，乃山石中所生石衣，如苔藓之属，土人掬而沃之，冒登茗。”明代谢肇淛撰《五杂俎》一书，全书十六卷，说古道今，分类记事：“蒙山在蜀雅州，其中峰顶，尤极险秽，蛇虺虎野狼所居，得采其茶，可蠲百疾。今山东人以蒙阴山下石衣为茶当之，非矣。然蒙阴茶性冷，可治胃热之病，性寒，能消积滞。”此段文字和《(乾隆)沂州府志》中对蒙山蒙顶茶的辨误，如出一辙。

境内蒙山当地人采石花为“茶”，就像山东东北部域内将竹叶采下加工后制成“竹茶”一样，皆因当地不产茶，以石衣为茶，故明《(嘉靖)青州府志》、明《(万历)兖州府志》将其列入“茶”中，这并不足怪。连明太祖朱元璋之子朱权，也没有搞明白，也将其记入《茶谱》：“独蒙山石藓茶，味入仙品，不凡入卉。”朱权品过天下名茶，却对山东蒙山的石藓茶给予如此高的评价，品后认为味道已然达到“仙品”，不是凡间别的茶叶所能达到的，令人不解。唐代陆羽在所著的茶叶百科全书《茶经》中为什么没有记载？明代陈师《茶考》一书给了我们答案：“世以山东蒙阴县所生石藓谓之蒙茶，土夫亦珍重之，味亦颇佳，殊不知形已非茶，不可煮，又乏香气，《茶经》所不载也。”

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名词术语成果转化与规范推广项目介绍，小石藓，中药名，为丛藓科植物小石藓 *Weisia controversa* Hedw. 的植物体，具有清热解毒之功效。常用于急慢性鼻炎，鼻窦炎。外用，适量，纱布包裹后塞入鼻孔，四季均可采收，洗净，鲜用或晒干。

今天，曾经的名茶蒙顶茶与我们渐行渐远，几近于陌生，而沂蒙茶正在古沂州大地上蓬勃发展。2001年编纂的《临沂地区志》说，境内农民“用其嫩枝或叶子煮茶喝”已成为历史。1958年冬进行过“南茶北引”试验，2500公斤江南茶籽试种因冻害失败，但试种沂蒙茶的脚步从未停止。经过多次试种，终于成功。1973年秋，中国茶科所再次在临沂召开“南茶北引西迁”现场会，并将本区所产三代群体茶籽引种到西藏、新疆、宁夏、北京等地区。1983年，临沂茶叶年产量已达100万公斤。在康熙皇帝南巡“见土人凿石取蒙顶茶”的蒙阴县，今盛产沂蒙绿茶，“芽叶肥厚、栗香高爽、滋味醇浓、极耐冲泡”的品质，饮誉中外；莒南县产的碧芽春、大白银剑茶叶入选山东十大名茶。玉芽茶、沂蒙沁园春银针、杰青芽入选山东十大优质茶；沂水县产的蒙山龙雾茶“叶片肥厚、滋味浓、香气高”，独具“花芽和鲜果清香”，属山东绿茶之上品。2016年，临沂境内茶园面积达10万亩。古沂州的茶叶生产，已经走上以沂蒙绿茶为主、红茶为辅，乌龙茶、白茶等多元化产品发展的道路。

# 蒙河

本 编

蒙河古称蒙山水，因“水出蒙山之阴”而得名，是沂河的重要支流之一。干流全长62千米，流域面积672.8千米。

蒙河主源发源于蒙阴县界牌镇中山南麓的依汶庄（曾名沂旺庄）北。南流入司家庄水库，经界牌北折东南流，右汇西界牌河、河头泉河、董家庄河，左汇赵家庄河、董家河河、北庄河，在垛庄南下峪河从右岸汇入。河流方向与干流一致，流域面积最大，有的资料称为界牌河。蒙河流域呈扇形，支流多而短，主要的支流有下峪河和黄仁河。

下峪河，又名石马庄河，发源于蒙阴县垛庄镇西南部与费县交界处。源分为二支，北支源在旗杆山东麓，东流入石马庄水库；南支源在华皮岭北麓，东北流入石马庄水库。出库东流，经南芙蓉村南折东北流，在垛庄西与主源相汇。黄仁河发源于垛庄镇西南部华皮岭东麓，东流经河河水、石拉子、石屋山等村，后注入黄仁水库，出库东北流经大山寺南折东流，在彭家宅村西入干流。

蒙河流经蒙阴、沂南两个县，在兰山区的小河口村西南汇入沂河。





# 关于抗战时期刘少奇同志一行在山东若干史实的考证

王晓华

1942年3月，刘少奇同志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示，从苏北盐城阜宁县单家港（现阜宁县羊寨镇单港村）出发，途经苏、鲁、豫、冀、晋、陕六省，一路风餐露宿，历尽艰险，成功穿越100多道封锁线，行程1500多公里，历时九个多月，终于在1942年12月30日安全抵达延安。刘少奇同志的这次艰险历程，史学家们称之为“小长征”。

刘少奇同志去延安，主要是奉中共中央之命，前往延安参加中共党的七大筹备工作，其次是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委托，以中央代表身份，顺道



解决山东抗日根据地存在已久的问题。

刘少奇同志一行到山东后，大部时间都驻留在当时的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部、山东省战工会所在地——山东省临沭县蛟龙湾区西朱范村（今江苏省东海县石梁河镇，下同）。

刘少奇同志停留山东期间，顺利完成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交付的各项任务，这为打破日伪军对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封锁、扫荡和蚕食，彻底扭转山东抗日根据地被动局面，起到了转折性的历史作用。

对刘少奇同志一行来山东，解放后，许多亲历者、史学家相继撰写文章，回忆或还原这一重大史实。这些留存后世的文字，成为研究中国抗战史、特别是山东抗战史的珍贵史料。但在此过程中，由于年代久远、史料缺失等原因，在细节描述上，笔者认为还存在诸多问题，值得商榷和研究。本文仅就其中的几个问题试作考证，不妥之处，还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 一、关于刘少奇同志一行自盐城单家港起程日期的问题

这个问题，有三种说法：1942年2月中旬、3月15日、3月18日。如下：

1. 时为刘少奇同志警卫员的魏良彬在《随少奇同志到延安》一文中载：“1942年2月中旬，警卫们开始出发。行程是向西北渡盐河，过陇海铁路进入山东境内。”

2. 时为中共盐阜区党委民运部长的喻屏在回忆录《刘少奇同志在华中》一文中载：“刘少奇于3月15日离盐阜区根据地，赴延安中共中央工作。”持同样说法的，还有时为新四军无线电大队大队长、新中国成立后原任陕西省邮电管理局副局长的陈士吾回忆，他在《忆中原局无线电通信大队》一文中载：“3月15日，我和报务员黄子坤、赖平、机要科长薛丹浩等同志，带一部电台随少奇同志从阜宁出发。”

3. 时为刘少奇同志的政治秘书和生活秘书的吕振羽、江明夫妇著述的《跟随少奇同志回延安》一书中说：“1942年3月18日，少奇同志及随行人员从苏北阜宁单家港上起程回延安。”王阑西的《驰骋中原》以及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刘少奇在山东》、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沂蒙抗日战争史》等大量涉及这一史实的回忆性文章、书刊史籍，均采用此表述。山东省临沭县、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地方史志等各类市县志史料中，至今也采用这一时间。

要论证这一时间的准确性，仅参考198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赖传珠日记》中即可得以印证。赖传珠在日记中记录了刘少奇同志出发前几日及出发当日的活动动态，如下：“晴。将地图、各种统计、干部登记等交给刘政委。（3月15日）”。

“晴。下午刘政委召集军分会、华中局负责同志会谈，谈及今后工作问题。（3月16日）”。“上午刘找赴延人员开会。决定沈、齐、罗、杨等6人随去，并带一显微镜。晚上刘找我们谈工作及问题。（3月18日）”。“今日晴。八时许随刘赴延干部到军部门前集中，10时出动……我们送至黄河堤拍照，刘过黄河时我们才返部。（3月19日）”。日记中所说的刘政委或刘，即为刘少奇同志。

赖传珠时为新四军参谋长，他所撰写的这本日记，完整记录了他从1934年10月16日红军长征开始直到全国解放的亲身经历，几无遗漏，并且赖传珠的日记记载详细，连续性强，是研究我党我军历史极为重要的史料。根据他的记载，3月15、16、18日接连三天，刘少奇同志仍在盐阜区与党政要员商谈工作，研究问题，不可能像上述后两种说法那样，已经出发。更不存在魏良彬所说的“2月中旬”一说。据此，刘少奇同志一行自盐城起程的日期，笔者认为，应以《赖传珠日记》记载中的说法为准，即1942年3月19日上午10时。

## 二、关于护送部队及番号的问题

关于刘少奇同志从盐城前往山东抗日根据地由谁护送的问题，包括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刘少奇传》在内的大量文献记述中，均采用“由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教导五旅十三团护送”的说法。这种说法，笔者认为描述不够严谨。当时的“十三团”番号应具体描述为“新四军独立旅第一团”更为准确。

新四军独立旅，是新四军主力旅之一，直属军部。1941年2月由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教导第五旅改编而成。旅长梁兴初，政治委员罗华生，副旅长吴世安，参谋长李梓斌，政治部主任刘兴元。原辖第十三、第十四团。到达苏北后，按新四军序列编为第一、第二团。第一团团团长胡大荣（后周长胜），政治委员覃士冕。新四军独立旅在苏北参与了淮海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程道口战役。1942年12月，独立旅北调山东，恢复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教导第五旅番号，才有了“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五旅十三团”。而刘少奇同志启程去山东的时间是这一年的3月19日，该团仍隶属新四军战斗序列。因此，此处不应记述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教导五旅十三团”，应记为“新四军独立旅第一团”比较准确。刘少奇同志一行到达淮海区委所在地（沭阳周村小庄），传达完华中局召开的第一次扩大会议举行正式会议精神后，才离开淮海区委驻地前往山东的。第一团的任务就是负责刘少奇同志一行从淮海区委所在地安全到达山东抗日根据地。

1942年3月31日，刘少奇同志告别淮海区委，由新四军独立旅第一团团团长周长胜率领一团兵力护送至沭宿海根据地。4月1日，刘少奇同志一行与罗荣桓安排前来接应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教导二旅旅长曾国华汇合，安全通过苏鲁秘密交通线，顺利到达山东抗日根据地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部所在地——西朱范村。《赖传珠日记》中记载的“……随行人数90多人，十旅一个营接”，并不是指周长胜率领的部队。错误的原因是引用了当年刘少奇同志政治秘书吕振羽1959、1960年在《中国青年》杂志发表的回忆文章《跟随少奇同志回延安》中的记述。这个问题，吕振羽在1982年2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重新修订出版的这部回忆录中，已将护送部队的番号删除，可见，吕振羽已经发现他的回忆有误。《刘少奇传》《刘少奇年谱》等书中记述的，应该是忽略了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教导五旅挺进苏北时，接受了新四军改编、编入新四军战斗序列这一历史细节。

对于周长胜从淮海区护送刘少奇同志一行到达山东抗日根据地一事，原任新四军独立旅警卫排排长的元东方，在回忆“程道口（也有称陈道口）战役”时，也有细节描述：

“10月20日下午5点总攻开始，独立旅一团由东向西攻击东圩子，三师十九团攻击西小圩子。另三个团各行其责，至21日，胡炳云的十九团攻占了西小圩子。因顽军准备充分，工事坚固，装备精良，一团三次爆破未能成功。战况相当危急，指战员伤亡惨重。这时陈毅来电话急调三师二十团周长胜接任胡大荣担任主攻。”

“完成了陈毅代军长交给的任务。粉碎了反共势力韩德勤与顽军汤恩伯妄图夹击我军的阴谋。我八路军的英雄善战受到新四军通令嘉奖，在新四军旅长以上干部会议上，梁兴初被陈毅代军长赞誉为“虎将”。1942年3月18日（笔者注：应为19日）刘少奇返延安途经独立旅，表彰了独立旅在淮海根据地所做出的贡献，还召见了担任主攻的周长胜团长。事后由周长胜率部队护送刘少奇一行到山东一一五师驻地。”

这一片断披露出两个重要的细节：一是周长胜是从新四军独立旅旅部（沭阳县一带，属淮海区委领导）开始担任起护送刘少奇同志一行到山东安全任务的；二是准确

使用了“独立旅”这一称呼。

上述细节与周长胜的回忆也相切合。1940年秋，周长胜随一一五师教导五旅挺进苏北与新四军江北部队会师后，担任新四军三师七旅二十团团团长，主要任务是负责三师指挥部的安全保卫工作。在担任这一职务期间，刘少奇同志随三师行动，周长胜经常听取刘少奇同志的报告。1941年10月，周长胜受到刘少奇同志的接见。对这次与刘少奇同志的见面，周长胜回忆了刘少奇同志对他的谈话细节：

“目前在淮海区陈道口，战斗打得很激烈。陈毅军长来电报，要你去接任教导五旅十三团团团长职务，担任主攻。”刘少奇同志嘱咐我，要听从指挥，发扬顽强的战斗精神，一定要把陈道口拿下来。最后又说：“这是实际锻炼的好机会！”那么恳切的教诲啊！

周长胜的回忆说明，周长胜是在接替了原新四军独立旅第一团团团长职务后，领导参加了程道口战役。战役胜利后，周长胜继续担任这一职务。周长胜的回忆沿用了在八路军时的编制习惯，使用了“教导五旅十三团”这一称谓。严格意义上说，此时应该用“新四军独立旅一团”的称呼。

### 三、关于刘少奇同志一行到达西朱范村准确时间的问题

这个说法较多，分别有3月底、4月初、4月10日、4月上旬、4月底等。

以上几种说法中，目前最通用、也是最权威的准确时间是1942年4月10日。这个时间的采用，应该是依据了担任过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部机要科科长苏蕴山的《我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日记》中的记载。苏蕴山从1937年8月随师部从陕西省三原县开往抗日前线起，就开始记日记，一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他的日记为研究抗战时期我军的发展、特别是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在山东的活动提供了许多珍贵鲜活的历史史料。

他在日记中有这样一段内容，记载了在西朱范村的情况：

“4月师部都住在诸繁（笔者注：即西朱范村）。师部机关在这个月开始进行整顿三风的动员，准备开始进行整风检查，随后又转为开展学习整风文件的运动。本月10日新四军司令部机要科长随刘少奇同志来师部。我们接待了他，同他交谈了几次机要工作经验，并征求他对我们工作的意见。”

苏蕴山日记中所说的新四军司令部机要科长，应该就是随同刘少奇同志一同前来的薛丹浩。

但苏蕴山的记载是否准确呢？笔者作进一步深入考证。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彭雪枫大事年表》一书中记载，1942年3月30日这天，刘少奇同志又同彭雪枫就淮北军区和四师工作问题个别交换了意见。3月31日，刘少奇同志告别淮海区党委，由新四军独立旅第一团周长胜率领一团护送，从沐东进入沐宿海根据地，并在沐宿公路边的桑墟镇住了一宿。

4月1日，刘少奇同志一行经过东海县安峰水库东侧到达东海县曲阳乡赵庄，与罗荣桓安排前来接应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教导二旅旅长曾国华队伍汇合，这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出版的《罗荣桓传》和李文所著的《山河呼啸——八路军一一五师征战实录》中均有记录。在赵庄，刘少奇同志一行作短暂休息，护送部队的领导同志再一次检查通过陇海铁路线前的战斗部署。入夜时分，由东海县陇南区委书记周朝献（时任交通线上赵庄站负责人）带路，护送到陇海铁路南侧的后张谷村。这一细节，钱唯尧撰写的《少奇与沐阳》一文中具体描述。

刘少奇同志一行安全通过陇海铁路封锁线后，未敢停留，连夜赶到滨海区海陵县刘湾村（现属东海县温泉镇）。时在海陵县战时邮局刘湾站工作的刘书健，在后来的

回忆文章《我带刘少奇过海陵》一文中记载：

“一天晚上，我刚刚在家吃过饭，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二旅敌工科李光明找我，要我和他一起去彭宅（今属东海县牛山镇湖西村）给部队带路，说路南华中有一名高级首长今晚要过陇海铁路。”

“到了彭宅，李光明找到老沈和两个青年，没有停留又继续向南前进。我们一行5人经白岭（今属东海县牛山镇湖西村），穿过铁路，经后张谷（今属石湖乡），大约10点钟到达前张谷村。这时，我们要接的部队早已到了，只见一大片人。”

“张谷离牛山站日本据点和蔡塘伪军据点很近，又在铁路边上，不能久停。李光明、老沈和张谷交通站联系好之后，决定立刻向北出发……过了铁路，经白岭、彭宅一起向北，到鲁庄南边。不一会，队伍就到了刘湾小学附近的一个场上和松树林内，当晚就在刘湾住下了。”

对于刘少奇同志一行在刘湾村住宿的情况，刘湾人刘继明老人也非常了解这段历史。他回忆说：

“刘少奇一行是下半夜到达铁路北的海陵县白河区刘湾村的，住在开明绅士刘凤图家中。”“刘少奇一行就是我叔叔刘书健从铁路南接来的。到了刘湾后，交通站经反复研究，作了充分的准备和部署，当时化名胡服的刘少奇根据随行人员的建议，在这个刘湾村里暂时被改称为‘钱先生’。”

“第二天晚上，钱先生一行人继续北上，刘湾村交通站的人站在路口送别。”

刘书健和刘继明两位亲历者的回忆是吻合的。刘少奇同志一行在刘湾村住了一宿后，第二天晚上趁夜色北上。这也就出现了4月2日白天，刘少奇同志到刘湾小镇上体察民情，与老百姓攀谈，观看减租减息标语和天主教招贴画的情形。这一细节，时任刘少奇同志政治秘书吕振羽在其回忆录《跟随少奇同志回延安》中有过详尽描写。

4月2日傍晚时分，刘少奇同志一行到达海陵县泉子埠村（今山东省临沭县）并在此住了一宿。这在周长胜的文章《护送少奇同志去山东》一文中也有过描述。

第二天，既4月3日上午，在曾国华和周长胜的护送下，刘少奇同志一行安全抵达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部所在地，临沭县蛟龙湾区西朱范村。安全地走完了千里回延安的第一步。

按照这一时间节点来分析，刘少奇同志一行到达西朱范村的准确时间，应该是1942年4月3日，而不是4月10日。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中央文献出版社于1996年9月出版的《刘少奇年谱》一书中，就有刘少奇同志一行过苏鲁秘密交通线后到达西朱范村的描述，“4月初，越过敌人的封锁线，从山东海陵（今东海）境过陇海铁路，到达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部驻地山东临沭朱樊村。”“4月初”的时间定位与笔者的考证，也是基本吻合的。

至于史学家们将苏蕴山《我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日记》中记载的“4月10日”这一天，作为刘少奇同志一行到达西朱范村的依据，也是值得商榷的。笔者认为，经过长途跋涉的刘少奇同志一行，不可能一到西朱范村，随行人员即去拜访相对应部门，这与常规不符。

4月3日与4月10日之间，间隔7天之久，对出现的这一历史空白期，应引起史学家们的关注与重视，并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探求。

#### 四、关于刘少奇同志与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八路军第一一五师部分领导人合影时间及人物关系的问题

刘少奇同志在西朱范村工作期间，曾与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八路军第一一五师部



1942年4月，刘少奇视察沂蒙根据地与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八路军山东军区部分领导人在临沭县朱樊村合影。前排左起：黎玉、刘少奇、萧华、罗荣桓，后排左起：周长胜、陈光、梁兴初、杜明

分领导人合影留念。这张照片成为刘少奇同志抗战时期，在山东指导工作时的唯一历史见证，弥足珍贵。新中国成立后，这张照片曾被大量报刊书籍、革命历史博物馆、刘少奇同志故居等广为收录、引用和收藏，影响甚广。

在这张照片中，合影人员共八位。除刘少奇、罗荣桓、黎玉、萧华、陈光等五位同志无异议外，其他几位同志究竟是谁？研究者也是莫衷一是，多有分歧。

主要有两种不同的描述。一是前排左起：黎玉、刘少奇、萧华、罗荣桓；后排左起：朱瑞、陈光、陈士榘7人。另一位未标注人名（《刘少奇在山东》等著作及部分报刊引用）；二是前排左起：黎玉、刘少奇、萧华、罗荣桓；后排左起：周长胜、陈光、梁兴初、杜明8人（《回忆萧华》等著作及部分报刊引用）。通过比对可以看出，后者少了朱瑞、陈士榘两位同志，多了周长胜、梁兴初、杜明三位同志，其他人物一致。

但究竟哪一种说法更能还原历史原貌呢？笔者从以下三点分析：（一）按职务排序分析。从照相时的前后站位看，第一种说法基本合乎逻辑，因这七人中，除刘少奇同志职务最高外，其余六位同志从职务而言，于伯仲之间，位前位后，干系不大。如果属第二种说法，将时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的朱瑞排在后排边缘，于情于理皆不符常规，因此，后排左起第一的人物是朱瑞，可能性极小。（二）从外貌体型分析。后排左起第一的位置，一说为朱瑞，一说为周长胜。通过各种回忆文章对朱瑞体貌特征的描述及同期照片分析比对发现，朱瑞身材魁梧高大，瘦长方脸，戴高度近视眼镜，而周长胜个子略矮稍胖，国字脸；照片中的人物形像更接近周长胜；后排左起第三的位置，一说为陈士榘，一说为梁兴初。他们二位的外貌区别更大，陈士榘面部肌肉丰满，呈圆方脸形，梁兴初则为瘦削长脸，两腮凹陷，嘴唇突起，直到晚年仍无甚大变化。照片中人物无疑是梁而非陈。（三）从传记、纪念文集分析。按常理，只有自己出现在某一影像中时，书中才会加以引用、张贴、珍藏，更何况是这样一张具有重大革命历史意义的珍贵照片。而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朱瑞传》、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朱瑞在山东》两书中，收录了大量朱瑞不同历史时期的照片，唯独没有这一张。同样，陈士榘回忆录中也没有收录此照片。相反，由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回忆肖华》、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统领万岁军——梁兴初将军的戎马生涯》两书中，这张照片均有收录，并且未提及朱瑞、陈士榘两位同志，两书均有周长胜。据以

上三点，笔者认为，后者对照片中八个人的描述是真实的、确凿的。这也相应印证了陈士榘与郝世保共同为刘少奇同志几人拍照，而不在照片中的原因。

关于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按照郝世保的说法，刘少奇同志在西朱范村的这张合影应该在七月中下旬，也就是刘少奇同志即将离开山东之时。郝世保生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

“直到6月份，才有机会为刘少奇同志拍照。前后共拍摄了两次。那时拍照用的胶片，还是从山西带过来的。因为数量少，拍摄的时候都很慎重，很重要的事情才拍一张，特别重要的才能拍摄两张。为刘少奇拍摄了两次，原以为非常保险，可当他钻进用被子围起来的“桌子暗房”里，用尽各种办法洗照片时，却总不见显影出来。经过分析才知道，那些从山西带来的药粉已经过期失效，这两次拍照任务没有完成。

一个多月后的七月下旬，刘少奇同志一行即将离开山东奔赴延安，又有了第三次为刘少奇拍摄照片的机会。为拍摄成功，他事前做好了充分准备。他和有着深厚摄影功底、时任一一五师参谋长的陈士榘商量，要求陈士榘与他一起，用两个相机同时各拍一张。”

有趣的是，在周长胜的回忆文章《护送少奇同志去山东》中的描述，在时间上，却与郝世保截然不同。在这篇文章中，周长胜回忆：

1942年，局面大定。三月里，少奇同志要回延安去，我有幸地接受了护送少奇去山东的光荣任务……几天之后，我们送少奇同志到了目的地——山东临沭地区。当时中共山东分局、一一五师师部驻在这里。我们完成了任务，要回苏北了。我向他辞行，他亲热地让我吸烟，给我倒茶。他与一一师首长和我们一起拍照留念，并一再叮嘱：“战士们辛苦了，回去要好好让他们休息休息。”他还一直把我送到大门口。

根据刘少奇同志一行到达西朱范村时间是4月上旬推断，周长胜在西朱范村与刘少奇同志合影时间也应该是4月份。也就是说，拍摄当事人郝世保的回忆应该是有误差的，不是6月或7月下旬，而应该是在4月份。这从刘少奇同志等人当时的着装上也可以作出判断，山东滨海区一带的七月下旬，已进入盛夏季节，天气大暖。而照片中的所有人员，军衣军帽均为冬装，与季节不符。这样的装束，在乍暖尚寒的四月初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因此，笔者认为，《刘少奇在山东》这张照片拍摄时间，当为4月份比较准确。

# 抗战初期的鲁南百姓 (上)

大荒堂主

1938年3月初，日军侵入鲁南，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为了躲避日本鬼子的暴行，很多鲁南民众背井离乡，踏上了逃难的路途。



被日寇焚烧的村庄





逃难的鲁南民众



从图中可以看到当时鲁南民众的妆束



背井离乡的农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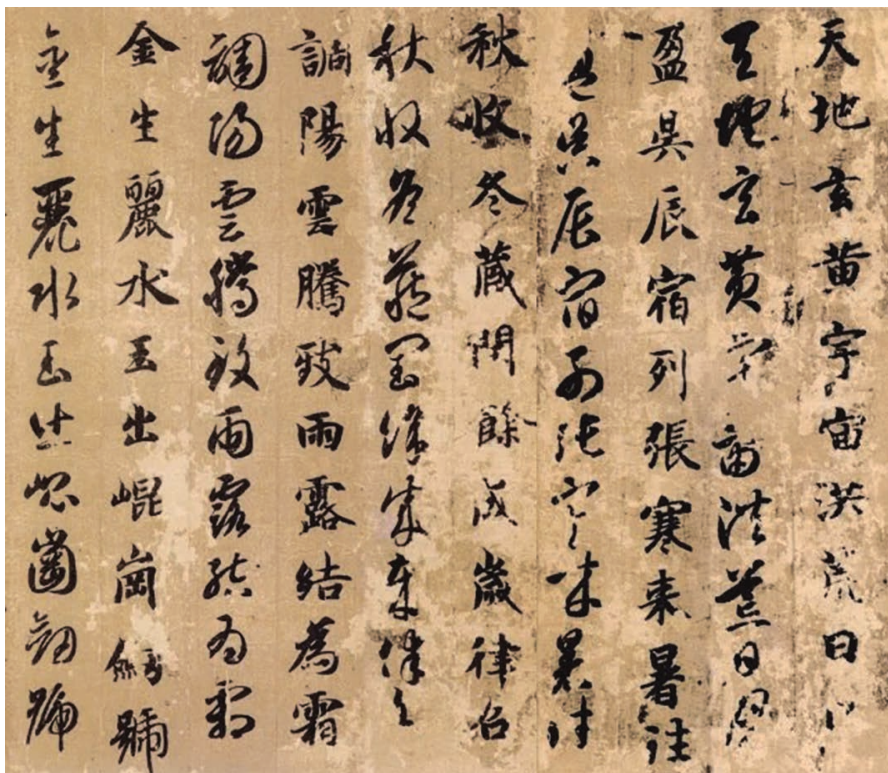
被日军杀害的群众

# 智永及其《千字文》

城视牛人

这是一位生活在隋代的僧侣人士，虽然隋历二世而亡，但是他的书法却影响深远，甚至越过东洋，是日本书道最先学习临摹的代表。他本姓王，名法极，法名智永，他还有一个身份是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第七世孙。在永欣寺阁，他继承师法，一心专研书法技艺和心得30余年，与经书香火为伴，在禅心佛道间参悟，悠悠百年岁月，似古树世纪常青，似大海安然宽容。

苏轼评其书“骨气深稳，体兼众妙，精能之至”，宋米芾《海岳名言》评曰：“智永临集千文，秀润圆劲，八面具备”。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说智永学钟繇《宣示表》，“每用笔必曲折其笔，宛转回向，沉着收束，所谓当其下笔欲透纸背者”。他所写的《千字文》，清何绍基说：“笔笔从空



智永《千字文》墨迹本（唐）

中来，从空中住，虽屋漏痕，犹不足以喻之”。我们细读他的墨迹《千字文》，看得出他用笔上藏头护尾，一波三折，含蓄而有韵律的意趣。董、何之说可谓精确、具体、恰当。

### 承祖法，退笔冢

作为王羲之的后人，智永对祖先羲之、献之的书法造诣都十分钦佩。为了使乃祖的书法万古流芳，也为了更好的静心参禅悟佛，智永练习书法极为刻苦。他在永欣寺内的僻静角落搭建了一座专供练字的小楼，并发誓“书不成，不下此楼”。他刻苦学书，30余年积退笔如山，达五麓之多，然后掩埋成一坟丘，号曰“退笔冢”，并自制铭志，可见他学书是非常用功的。

### 铁门槛，寻字诀

经过长期坚持不懈的刻苦练习，智永的书法终于写得抵势飞扬，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为了练好书法，智永禅师在书阁中一住就是几十年，在练字期间，他手抄八百余份《真草千字文》，分赠浙东各寺庙，慕名前来求字者也越来越多。人们纷纷想要得到智永的真迹，他户外之屐常满，连门槛都被踏坏，智永只好寻来铁皮加固，禅师的“铁门槛”一时被传为美谈。

一日，他在指导寺内的小沙弥练字时，几位年轻的书生前来拜访，想得到智永禅师赠字以及练字的秘诀。禅师笑道：“这赠字不难，不过我哪有什么秘诀。”书生不解，大失所望。智永向书生提及先祖羲之公和献之公，说起羲之公练笔“临池写书，池水尽黑”，而自己也是勤学苦练才有今日成就。说着便把他们引到“退笔冢”前告诉书生自己习书一生，练字秃笔尽在于此。书生见此高高坟冢，无一不慨叹万分。

### 温雅风，渡海流

随着被日本派出的遣隋使、遣唐使发现，智永书《真书千字文》东渡海流，流传到东邻日本，与其先祖的王羲之书法一起，对日本书道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后人评价其书法“气韵飞动，优入神品”，又曰其本人风骨“瑶台雪鹤，高标出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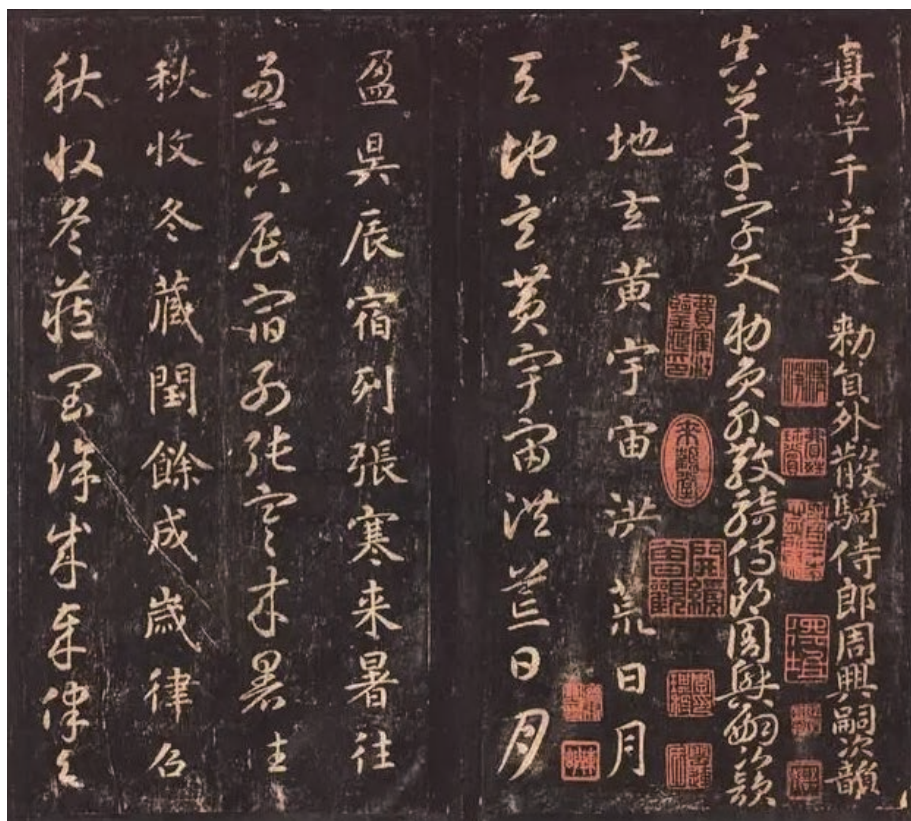
#### 1. 永字八法的传承

相传，东晋王羲之用过几年时间专门写“永”字，认为这个字具备楷书的八法，写好了这个“永”字，所有的字都能写好。智永就是在大王的基础上，将这个“永字八法”加以发扬光大，并又传给了虞世南，再后来，这个永字八法又经过很多书法家一代代传了下来，为后代的楷书立下了学习的典范。

#### 2. 《千字文》首创真草二体

《真草千字文》采用以楷书对释草书的方式，这样对于学书者而言，既可以通过楷书识认草字，又能让学书者同时欣赏两种字体，同时还起到了传播大王书体的效果，可谓是一举多得。很多人以为，智永书写《千字文》只是重复王羲之的字体，其实不然。我们现在认真识读《千字文》，可以看到，智永的楷书和草书，是在大王的基础上，藏头护尾，一波三折，含蓄而有韵律，从中也能独到晋唐笔法的一些痕迹。也因为如此，有人主张学书应从智永《真草千字文》始。但也有人认为，智永继承王羲之笔法，对初学者又过太难。孰对孰错，只有学书者自己把握选择。

#### 3. 承上启下的示范作用



北宋董薛嗣昌《千字文》石刻本

唐韩方明谓八法起于隶字之始，传于崔子玉，历钟王以至永禅师者，古今学书之机括也。从这里，我们大致可以看出，智永是继承了蔡邕、崔子玉、钟繇、王羲之等人，而又传给了唐代的虞世南，从而启发了唐代书法家的第一代人物。这是一种承上启下的示范作用。智永的书法是想保留二王的标准，并成为后世学习书法的范本。因而常常使用旧法（写字），但这并不是说他没有创新求变，他的书法其实已经超乎法则之上了。我们从日本《千字文》墨迹本上，大致也可以看出，智永在笔法的起讫顿挫上，在结构的呼应避就上，都达到了高度的流利和精微。也正是因为这样，后世张旭、孙过庭、欧阳询、褚遂良、怀素诸人都临过智永的字，即使到了宋、元、明，书家也都拿《千字文》为范本，从而出现了很多《千字文》的临本、作品。时至今日，智永的《千字文》依然是我们学习楷书的优秀范本。可以说，智永是在中国书法教学上起到了示范作用的重要人物。

保存至今的《千字文》有两个版本，一是唐代传入日本的墨迹本，一为北宋董薛嗣昌石刻本，现存于陕西省西安碑林。两个同源派别虽属一流，但都在当地的文化环境中再次生根发芽。有人说智永的书法风格只是承袭先祖毫无创新，有人说并不是创新才叫成功，传承本身就是成功。不论怎样，智永禅师穷尽一生避世习书，他的志向和嬉笑哀乐不是世人最清楚，而尽埋藏于永欣寺的“退笔冢”中。

# 战争年代的鲁中地区兵工事业

吕有礼

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我先后在山东纵队兵工厂第三分会、鲁中军区兵工厂、鲁中军区二分区军工厂、鲁中军区兵工总厂等单位任过练习生、会计等职。现把我所了解的鲁中地区兵工事业有关情况追记如下。

## 兵工发展概况

1938年1月，我山东省地下党组织发动了徂徕山起义。起义后部队迅速发展，在鲁中、鲁南、胶东、渤海、滨海地区，相继组建若干支队。但新组建部队的武器弹药供应十分困难。如何解决部队的武器弹药供应，就成为当时十分迫切的问题。

1939年5、6月间，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张经武和政治委员黎玉，找纵队司令部参谋处参谋邹国资谈话，要他任兵工建设主任，负责纵队抗日根据地的兵工建设。



1943年5月，在抗日战争烽火中，华兴铁工厂成立，工人边生产边袭击日寇据点

当时，山东纵队在沂蒙山区有两个规模很小的兵工厂一厂和二厂。

一厂设在沂河上游大资山脚下的织女洞。有工人百人左右，大多来自博山县。这些工人参军前多数是青年农民，少数人在私营的翻砂铺或鞭炮庄当过工人或学徒。该厂象样的机器只有从博山弄来的14部车床，其他都是一些简单的机加工工具，如手摇钻、虎头钳、锉刀、丝攻和扳牙等。这个厂当时主要是生产手榴弹和刺刀。

二厂设在大王庄西南的桃峪村。这个厂的来历要追溯到1938年。1938年初，山东纵队8支队在胶东寿光成立时，武器弹药十分缺乏。支队领导决定成立兵工局。约在五六月间，有曹日岚、曹日祥、曹元贵、丁继昌、岳西之、张圣真、贾汉文等几十名来自潍县华丰机械厂和阜丰机械厂的技术工人，要求参加抗日工作。支队领导对他们表示热烈欢迎，决定把他们编在支队兵工局，随部队修理枪械。1938年底（或1939年初），八支队和七支队等部队改编为第一支队。兵工局的工人携带机器设备随支队向鲁中地区转移，在转移途中遭到敌人堵击，几十辆马车的设备和物资丢失了，只剩下20几匹骡子驮着锉刀和锯条等简单工具到达鲁中山区。在过胶济路向南行进时，虽然有一部分技术工人由于乡土观念重，不愿随部队到鲁中山区，但大部分工人在曹日岚的影响和说服下，没有离队。到鲁中山区后，便组成了兵工二厂，由曹日岚任厂长。

1939年夏，以一厂、二厂为基础，成立了山东纵队兵工总厂。不久，日军开始对沂蒙山区发动麦季大“扫荡”。大“扫荡”的主要目标是我山东纵队司令部所在地大王庄和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所在地东里店，两个兵工厂也在敌人的“扫荡”范围之内。在这次“扫荡”中，护卫兵工厂的回民连伤亡20余人，兵工厂政委周兴和、指导员郑香山也壮烈牺牲。

经过敌人这次“扫荡”，工厂驻地环境开始恶化，难以坚持正常生产。根据上级指示，兵工厂除一部分迁往鲁山西麓博山县的池上和莱芜县的常庄一带外，大部分随总厂迁往沂南县孟良崮山区。总厂驻在孟良崮东侧的南瓦庄村，首任厂长孙世铭，参军前曾在青岛四方机车车辆厂当过钳工领班，1942年1月敌人大“扫荡”时，在向莱芜县转移途中病故；副厂长孙景明，是由前方部队调来的，1942年1月在向莱芜县转移前夕，在城子北山率领工人突围时，头部中弹牺牲；教导员王琪，在部队任过教导员；技术主任邹国资；总支书记李之久。

1942年春，由邹国资继任总厂厂长，王琪任副厂长，卓农任教导员，一分厂厂长曹日岚任技术主任。同年秋，鲁中军区二团副团长王凤林（名字不一定准确）任总厂副厂长，他曾在苏联学习过工兵，在任副团长期间，一条腿受重伤被截肢。这年冬天敌人大“扫荡”时，他带领部分人员转移到益都县的马鞍山上，被敌人包围，经数日激战，终因寡不敌众，全部壮烈牺牲。同时牺牲的还有益都县县长冯毅之的父亲、爱人及妹妹等。后来冯毅之曾著有《马鞍山血战》一书。

兵工总厂迁到孟良崮地区后，下设三个分厂和一个修械所。为了保密，各分厂对外统称“分会”。

一分厂设在孟良崮南侧的南书堂子村，1940年冬敌人大“扫荡”时，这个村被烧光，1941年初，迁往孟良崮东侧的夹山里和石旺圈。一分厂主要改装子弹和仿制捷克式轻机枪，自1942年起又试制鹅脖式轻机枪。

二分厂设在孟良崮北侧的大碾村。该厂翻砂组在狼窝村，弹药组在雕窝后村，木工组在猴子窟村。厂长李×兴，政治指导员边仲，文化教员王宝义。主要生产手榴弹，也根据需要批量生产地雷，还陆续研制过枪榴弹、手雷、照明弹、燃烧弹、烟幕弹等。

三分厂1941年上半年设在崖子村，同年夏天迁往书堂子村，深秋迁往蒙山脚下的佛柱村。12月份敌人大“扫荡”开始后，又转移到鲁南的抱犊崮地区，1942年1月又

转回到孟良崮地区。厂长张圣真，政治指导员李道荃，主要生产刺刀。

1942年春，部队开始五期整军，进行精兵简政，撤销了三分厂，技术工人大都分配到一分厂，练习生多被分配到二分厂，少数人分配到总厂厂部和修械所。张圣真任一分厂厂长，李道荃任指导员。

修械所设在××峪，所长翟××（1941年冬敌人大“扫荡”时失踪），指导员孙刚（1942年调往边缘地区工作，后牺牲）。

1942年，山东纵队和一一五师组成山东军区。山东军区和山东分局、山东省政府移驻滨海地区。兵工总厂归鲁中军区建制（鲁中军区司令员王建安，政委罗舜初），番号是鲁中军区后勤部兵工总厂，亦称鲁中军区后勤部军工科。

1942年冬，敌人又开始对沂蒙山区实行大“扫荡”。鲁中军区各后方机关、工厂、学校、医院、银行、报社等单位和鲁中行署所属单位，均向沂水县（今沂南县）中部地区的东司宝、西司宝、长山庄、安乐庄、隋家店子、马牧池、横河、双泉峪、耿家官庄一带转移。兵工总厂迁移到耿家官庄，厂长仍为邹国资，副厂长王琪，政委张建庚。这时兵工总厂除生产武器弹药外，还负责军区范围内的枪械弹药的采购、保管和分发。总厂各职能部门和人员也相继建立和健全。在政委领导下，设锄奸特派员和青年干事。业务部门有：采买股，负责全厂所需材料的采购，有时也执行领导机关指定的特殊任务，股长宋玉，后为吴兴周；材料保管股，负责原材料、工具、武器弹药的保管和供应，股长吴××，后为王俊卿、刘乃成；管理股，股长江××；总会计任公三，负责全厂军工生产费用的预决算和结算。

从这时起至抗日战争胜利，总厂有三个下属厂和一个修械所。

一厂设在高湖以南地区。主要任务是机械制造和维修，继续生产鹅脖式轻机枪，同时承担某些特殊修理任务。

二分厂设在艾山后的东波池和西波池，主要任务是改装子弹，如79式和38式子弹，还改装部队演习用的教练弹。厂长刘东海，指导员王宝义。

三分厂设在野竹旺和拔麻村。厂长边仲，指导员阎振。该厂主要生产手榴弹、枪榴弹、地雷、手雷等。1944年，该厂曾一度归鲁中军区二分区（司令员吴瑞林、政委王一平），番号是第二军分区兵工厂（亦称军工股），厂长王琪，协理员阎振。1945年8月日本降投后，该厂又归鲁中军区兵工总厂。

抗战胜利后，鲁中军区所属一、二、三军分区的兵工厂都并入鲁中军区兵工总厂。四、五军分区的兵工厂因情况特殊暂未合并。

合并后，由新任的总厂副厂长边仲负责，大部分工人仍留在沂蒙山区坚持生产。有少数干部和技术工人在副厂长何凤鸣带领下，随部队到新解放的博山、淄川、南定一带接收敌伪工厂和物资，先后接收了颜山铁工厂、窑业工厂和南定敌伪工厂的设备和物资，把部分急需的设备和物资运往莱芜县东部的新厂址。另一部分干部和工人，由邹国资、柴诚、曹日岚率领在莱芜县东部地区建设新厂。1945年底，原在沂蒙山区坚持生产的人员也全部来到新厂址。这时兵工总厂有了较大的发展，车床等重要设备上百台，全厂干部和工人达1200余人。下设5个分厂和1个修械所。原材料和机工具的供应十分充足，仅为保管接收敌伪工厂的设备和物资就建立了7个仓库。总厂和有的分厂还安装了发电设备，用以解决动力和照明用电。

为加强工厂管理，总厂厂部设立了工务股、采买股、保管股、会计股、管理股。工务股负责全厂产品设计、质量检验和生产管理，股长王德宽，副股长谭守文。采买股股长吴兴周，副股长是逯永傅。保管股负责产品和军区范围内的枪械弹药的分发和保管，股长隋乐三，副股长刘乃成。会计股副股长任西之。管理股长陈希振。

这时鲁中军区兵工总厂的生产已具相当规模。如82迫击炮弹日产300发，步枪子

弹日产3000发，手榴弹日产1000枚，还能自制无烟发射药和硝化甘油炸药。同时，还批量生产82迫击炮、60掷弹筒、枪榴弹筒、60炮弹、枪榴弹、地雷、手雷、爆破筒、信号弹、烟幕弹、刺刀、铁镐、铁铲、驮炮的鞍具等。

这段时间，各分厂分别住在亓山贯、冯家庄、里新、松崮、颜庄西沟、潘家沟等村庄。

1946年6月以后，国民党军队向我解放区全面进攻。为使工厂有个较安定的环境进行生产，上级指示工厂向蒙阴山区迁移。总厂厂部设在南岱崮山脚下的井旺庄。下属各分厂和修械所分别设在娄家铺子、贾庄、水营、五里沟子、明末峪等村庄。原材料、待用设备、产成品及武器弹药仓库，设在井旺庄附近深山沟的村落里。

这时总厂厂长为邹国资，副厂长何凤鸣、边仲；政委李××，李调特种兵纵队后，由王人道任政委，李玉和任总支部书记。

兵工厂这次搬迁先后持续半年之久。广大工人急前方所急，想前方所想，在“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口号鼓舞下，边搬迁边安装调试设备边生产。到莱芜战役前夕，生产基本就绪，某些产品的生产已达到搬迁前的水平。同时还根据上级的指示，为守崮部队研制了一批滚雷，并组织总厂厂部的工作人员把滚雷亲自送到准备坚守南岱崮的部队所在的崮顶上。

1947年6月底，国民党军队向我山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在这以前的几个月，兵工厂就开始疏散和掩埋物资，老弱病残人员也开始疏散。6月底或7月初，邹国资、曹日岚带领大部分干部和工人向渤海地区转移。当转移到益都县的朱崖时，总厂领导决定派我带领11个年轻力壮的干部和工人，返回总厂原驻地，依靠坚守在南岱崮和北岱崮的鲁中军区后勤部监护营一连（营长胡凤诰，荣获岱崮英雄称号，后为鲁中南纵队四十七师一四一团参谋长，淮海战役牺牲；连长为庞××），就地坚持斗争，保卫兵工厂物资和设备的安全。另一部分干部和工人由何凤鸣、王人道负责在博山县南部和莱芜县北部地区坚持斗争。

1948年初，转移到渤海地区和博山县南部坚持斗争的同志，相继回到兵工总厂驻地井旺庄、贾庄一带。就地坚持的10名同志也回到总厂厂部。经过一段时间的总结整顿之后，各分厂陆续开工生产，并开展了新式整军运动。1948年底，山东省全境基本解放，山东各地的兵工厂逐步合并，组成华东兵工局，由朱可昆任政委。



# 山东世家大族的南迁 (上)

国家史册

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九品中正制”，国家选拔官吏专看家世出身，从而导致门阀士族垄断了政府的重要官职，他们也成为世袭官僚。他们又通过大族之间互相联姻，在统治阶级内部构成了一个门阀贵族阶层，并逐渐形成了一整套的特权制度，即“门阀制度”。

门阀制度发端于东汉时期，确立于魏晋时期，南北朝时期达到鼎盛。在门阀制度下，家世名望是衡量身份的最高标准。只有那些祖辈有人做过大官，名望很高，而且世代相传都做过大官的人，才能被承认入于士族阶层。士族中间也有等级差别，一般说来，族人能长期保持上品官级的，为最高一层，称为“右姓”“茂姓”。如，东吴地区的朱、张、顾、陆四族；原在北方，后随晋东渡的王、谢、袁、萧四族；山东的崔、卢、李、郑四族；太原王氏家族；关中的袁、裴、柳、薛、杨、杜六族，都是右姓大族。其他大族虽然也在士流之内，但只能算是下一层了。这些士族特别关心的是，如何永久保持自己优越的门第族望，保持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殊地位。为了保持他们高贵的血统，他们特别讲究门当户对的婚姻，只许在同等士族之间联姻，而绝对不允许与庶族地主联姻通婚。另外，通过编撰“家谱”的办法，把士族的世系源流明确地记载下来，以备查考。士族为了标榜自己的特殊身份，还发展了一整套繁琐的礼仪法规。在平时的生活中，士族一般不与庶族人士



衣冠南渡

来往。门阀士族制度是封建等级制度的一种特殊形式，南北朝以后，这一制度日趋衰落，并最终走向灭亡。

魏晋南北朝时期，山东地区的门阀势力发展强盛，出现了许多有较大影响的世家大族。其中南迁的影响较大的世家大族主要有：

### 清河崔氏

清河崔氏家族并非全部南迁，只是崔业的八世孙崔密一支。崔密有二子：长子崔霸，次子崔琰。这一系大致从崔琰发迹，到北魏初年势力很盛。崔霸一支不太兴旺。崔琰，字季珪，曾任曹魏时尚书、中尉。崔琰有二子：崔谅、崔钦。

崔谅曾任晋中书令，崔谅之子崔遇为后赵特进；崔遇之子崔瑜，为黄门郎，崔瑜之子崔暹，曾任前秦齐郡太守、北魏御史中丞等职。崔暹有七子：二子早亡，另外五个儿子中又以崔譔、崔祎、崔颐较为有名。

崔譔在刘宋占据山东时期，曾任青、冀二州刺史。崔祎曾在刘宋为官，北魏占据青、齐后，崔祎之孙相如进入北魏，曾考举冀州秀才。崔颐起初曾任北魏太子洗马，后又升至散骑常侍，再后来又被魏太武帝任命为冀州刺史。

崔钦这一支被称为清河青州房。崔钦之子崔京，崔京之孙崔琮，崔琮之子崔辑。崔琮曾担任慕容垂的车骑属。崔辑时，随慕容氏南迁青州，崔辑曾任刘宋泰山太守。崔辑有二个儿子，长子修之，次子目连，庶子崔道固。崔修之之子元孙曾担任刘宋尚书郎。元孙之子崔亮，少年时丧父，先随母亲房氏投依了叔祖崔道固，北魏平三齐后，又被迁往桑乾。后来得到李冲的赏识，被推荐为中书博士。崔目连之子僧祐，曾担任刘宋辅国将军，后降北魏。他的弟弟僧渊，曾担任北魏南青州刺史。崔道固先在刘宋为官，担任徐、兖二州刺史从事，后又先后担任过冀州刺史、徐州刺史等职。后来降北魏后，担任平齐郡的太守。

天兴二年（公元399年），道武帝拓跋珪杀崔暹，崔暹诸子大多逃亡到南方做官。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太武帝拓跋焘杀崔浩，并尽杀其族人。所以此后所说的清河崔氏，主要是指崔暹南逃诸子后裔与灵茂的后裔，而崔浩的后裔情况后人知道得很少。灵茂后裔从灵茂之子稚宝担任北魏祠部郎中开始，才在北方政权做官。

到了隋唐时期，崔氏的势力继续衰落。特别是在黄巢大起义的打击下，清河崔氏与其他士族的大族势力基本上消亡了。

### 琅琊王氏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山东地区的门阀士族中琅琊（今山东临沂）王氏可以称得上是头号门阀。

王氏家族自东汉青州刺史王仁算起，可以分为两大系：一是王仁孙王祥、王览一系，二是王览的从祖兄王雄一系。

王祥曾担任曹魏太尉，西晋时任太保，他有五个儿子：夏、烈、芬早年死去，王肇为晋始平太守，王馥为晋上洛太守。王览在晋为官至宗正卿，他有六个儿子：王裁在晋为官至抚军长史，王基在晋为官至治书侍御史，王会在晋为官至侍御史，王正在晋为官至尚书郎，王彦在晋为官至中护军，王琛在晋为官至国子祭酒。王览的孙子们南渡后，势力发展很快，迅速成为东晋首姓，其影响极大。

王裁之子王导一支，从东晋开国王导任宰相之位起，其子孙们大多在东晋南朝

为官，成为王氏家族中最为显赫的一支。王导有六个儿子：长子王悦在东晋为官至中书侍郎，无子。次子王恬在东晋为官至中军将军，其子王混为东晋太常卿。王混有二子：王嘏在东晋为官至左户尚书，王诞在东晋为官至吴国内史。王嘏有二子：王恢在宋为官至游击将军，王偃在宋为官至左光禄大夫。王偃有四个儿子：其中王藻在宋为官至东阳太守，王懋在宋为官至光禄大夫，王攸在宋为官至太宰中郎。王懋之子王莹在齐为官至中领军。归梁后任尚书令。

王导的第三个儿子王劭在东晋为官至车骑将军，王劭之子王默在东晋为官至左光禄大夫，劭之子王穆在东晋为官至临海太守，劭之子王谧在东晋为官至司徒。王默之子王惠在宋为官至吏部尚书，王穆之子王智在宋为官至晋陵太守，王穆之子僧朗在宋为官至左光禄大夫，王谧之子王球在宋为官至中书令、尚书左仆射。僧朗之子王或在宋为官至中书监，僧朗之子王楷在宋为官至太中大夫，僧朗之子王粹在宋为官至黄门侍郎。王彧之子王绚在宋为官至秘书丞，王彧之子王绩在宋为官至黄门郎，归齐后任太常，王彧之子王约在梁为官至左户尚书。王绩之子王隼在齐为官至建安太守，王隼之子王克在梁为官至尚书仆射，归陈后任尚书右仆射。王粹之子王奂在齐为官至尚书左仆射，王粹之子王份在梁为官至左光禄大夫。王奂之子王融在齐为官至太子中庶子，奂之子琛在齐为官至司徒从事中郎，奂之子肃投靠北魏为官至尚书令，奂之子秉投奔北魏为官至幽州刺史。王融之子王诵投奔北魏为官至幽州刺史，融之子王衍投奔北魏为官至太常卿。王琛之子王翊投奔北魏为官至齐州刺史。王肃之子王绍在北魏为官至中书侍郎，王肃之子王理在北魏为官至著作佐郎。王诵之子孝康在北魏为官至尚书郎中，王诵之子俊康在北齐为官至文襄王中府祭酒。王翊之子王渊在北齐为官至仪同开府记室参军。王份之子王琳在梁为官至司徒左长史，王琳之子王铨在梁为官至丹阳尹、卫尉卿，王锡在梁为官至吏部郎中，王金在梁为官至太子中庶子，王通在梁为官至左光禄大夫，王劭在梁为官至中书令，归陈后任司空，王质在梁为官至侍中，归陈后任都官尚书，王固在陈为官至中书令。

王导第四子王洽在东晋为官至中领军。王洽之子王珣在东晋为官至司徒。王珣之子王弘在宋为官至太保，王弘之子王锡在宋为官至太子左卫率。王弘之子僧衍在齐为官至侍中。

王导第五子王协在东晋为官至抚军参军，无子。王导第六子王荟在东晋为官至会稽内史，王荟之子王廞在东晋为官至司徒左长史。王廞之子王华在宋为官至右将军，王华之子定侯在宋为官至左卫将军。

王览的其他几支后裔，也大都都在朝为官，也不乏有影响的人物。王览的次子王基有二子：王含在晋为官至光禄勋，王敦在东晋为官至大将军。王含子王瑜在晋为官至散骑常侍，王应在东晋为官至武卫将军。王览第三子王会有二子：王舒在东晋为官至东骑大将军、仪同三司，王邃在东晋为官至平西将军。王舒之子宴之在东晋为官至护军参军，舒之子王允之在东晋为官至卫将军。王览第六子王琨有二子：王棱在东晋为官至豫章太守，王侃在东晋为官至吴国内史。

王览第三子王正一支，其地位与影响也很大，仅次于长子王裁。王正有三子：王廙在东晋为官至平南将军，王旷在东晋为官至淮南太守，王彬在东晋为官至尚书右仆射，这三人分别形成了三个分支。第一支为王廙，廙之子颐之在东晋为官至东海内史，廙子胡之在东晋为官至丹阳尹，廙子耆之在东晋为官至中书郎，廙子羨之在东晋为官至镇军掾。胡之子茂之在东晋为官至晋陵太守，和之在东晋为官至永嘉太守。茂之子裕之在宋为官至开府仪同三司，裕之子恢之在宋为官至新安太守，瓚之在宋为官至吏部尚书，昇之在宋为官至都官尚书。瓚之子秀之在齐为官至吴兴太守，秀之子峻在梁为官至吏部尚书。昇之子延之在齐为官至尚书左仆射，延之子纶之在齐为官至都

官尚书。耆之子随之在东晋为官至上虞令，随之子镇之在宋为官至卫尉，镇之弟弘之在东晋为官至卫军参军。镇之子标之在宋为官至安复令。弘之子罗云在宋为官至平西长史，罗云之子思远在齐为官至侍中。罗云弟县生在宋为官至吏部尚书，县生弟普曜在宋为官至秘书监，普曜之子晏在齐为官至骠骑大将军，晏之子德元在齐为官至车骑长史，晏之弟诩在齐为官至少府卿。羨之子伟之在东晋为官至琅邪国郎中令，伟之子韶之在宋为官至祠部尚书，韶之子晔在宋为官至临贺太守。

第二分支为次子旷，旷之子羲之在东晋为官至右军将军，羲之子凝之在东晋为官至左将军，肃之在东晋为官至中书郎，徽之在东晋为官至黄门侍郎，操之在东晋为官至秘书监，献之在东晋为官至中书令。徽之子桢之在东晋为官至侍中。献之子靖之在宋为官至司徒左长史，靖之子悦之在宋为官至御史中丞。

第三分支为彬，彬之子彭之在东晋为官至光禄大夫。次子彪之子越之在东晋为官至抚军参军，临之在东晋为官至东阳太守。临之子纳之在宋为官至御史中丞，瑰之在宋为官至司空参军。纳之子准之在宋为官至丹阳尹，瑰之子逡之在宋为官至吴令，归齐后任光禄大夫，逡之从弟珪之在齐为官至长水校尉。准之子舆之在宋为官至征虏将军主簿，珪之子顛在齐为官至中军参军。舆之子进之在梁为官至左卫将军，进之子清在梁为官至安南将军，清之子猛在陈为官至镇南大将军，猛之子缮归隋后为官至开府仪同三司、普州刺史。翹之子望之，望之子泰之没做官，泰之子元弘在宋为官至平固令，元弘之子素也没有做官。

同其他豪门家族一样，王氏家族也是通过与皇家及其他门阀士族的不断联姻，来巩固自己的地位。据记载，自东晋到南朝间，王氏家族曾先后出过8个皇后，她们是：王献之女是东晋安帝皇后，王偃女是宋孝武帝皇后，王僧朗女为宋明帝皇后，王慈女为齐海陵王妃，王俭女为齐和帝皇后，王鸾女为梁简文帝皇后，王金女为梁敬帝皇后，王固女为陈废帝皇后。另外，王氏家族中，尚各朝皇室公主的也有20人以上。王氏家族和陈郡谢氏家族多次联姻，王凝之、王珣、王珣曾分别娶谢奕、谢安、谢万兄弟三人之女为妻。王氏家族还与兰陵萧氏、泰山羊氏、高平郗氏、谯国桓氏、陈郡袁氏等建有婚姻关系。

从总的发展状况来看，王氏家族在两晋时期当属鼎盛时期，特别是在东晋时最为突出。当时不仅拥有王导那样的大政治家，而且他的子孙们也多为朝中要员，从而使王氏家族在政治上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王氏家族在经济上还通过求田问舍，发展庄园，成为江南侨姓士族中实力最强的大姓之一。在文化上也负有盛名，出现了著名的书法大家王羲之和王献之，他们的书法艺术代表了东晋南朝时期的最高水平，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珍贵遗产。

虽然王氏家族在两晋时期是门第显赫的著姓，他们世代为官，但由于当时复杂的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和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使他们也免不了屡遭打击，几经沉浮，甚至沦落衰败。他们有的被起义军杀死，有的因为统治阶级内部斗争而死伤。到南朝时期，王氏家族尽管仍然还有做官之人，但其地位和影响力都大不如从前了；尽管王氏家族也曾设法维护门阀制度，但也于事无补，到陈亡时，王氏家族的势力已经明显不如两晋时那样威风了。

到了隋唐时期，王氏家族的势力远比清河崔氏、兰陵萧氏为弱。《隋书》列传中琅琊王氏士族家族成员无一人，而在新、旧《唐书》列传中，琅琊王氏士族家族成员仅有七人，且都是王贤与王导的后代，其中官至宰相的二人，即武后时宰相王琳，肃宗时宰相王珣。其余五人地位都较低。而在新、旧《五代史》中琅琊王氏士族家族竟无一人入传，可见当时其势力已经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

# 三代乡医的暖心故事

邵鲁文

沂蒙山区沂水县院东头镇的院东头村、曲家洞子村、立岩涧村的村民是幸运的。数十年来，一直有一家人在守护着当地百姓的健康。这就是院东头镇的乡村医生张道立、张在吉、张德庆，他们三代人扎根山区70载，成为沂蒙山区一道别样的风景。如今，张家第四代也已踏上学医路，立志承继祖辈衣钵，继续守护群众健康。

## 三代乡医服务基层70载

张家三代乡医的第一代张道立生于1924年，1944年张道立成为一名部队卫生员。1948年，张道立回到家乡当起村卫生员。几十年来，张道立始终任



乡村医生张德庆（右）  
在院东头镇立岩涧村村  
民家巡诊

劳任怨，利用从部队学来的医学知识为附近老百姓免费治病。

1947年出生的张在吉18岁时跟随父亲张道立从事乡村卫生工作。“20世纪六七十年代，山区老百姓生活都很困难，有了病却没钱治。”今年71岁的张在吉告诉记者，那时他和父亲用学到的中医知识，翻山越岭采药，把自制的中草药免费送给病人，并用民间流传的偏方验方，为村民解决了不少疑难杂症。20世纪70年代初，张在吉创办了全县第一家村办制药厂、第一个村级合作医疗室。

如今，张家第三代乡医，1972年出生的张德庆，仍然坚持扎根山区，为3个村子的百姓看病。“有时候，村民半夜发高烧、得急症，一晚上要起夜四五次，虽然辛苦，但我从来没想过放弃。”张德庆告诉记者，原来条件差，走家串户去看病都是骑车和步行，有时山里下大雨路滑，滑倒摔伤是常事，但只要给村民把病治好了，他就发自内心地高兴。

2004年后，村里破旧的卫生室搬到了镇上，但张德庆除了平时坐诊给村民看病外，院东头村、曲家洞子村、立岩涧村3个村近2000人，他每个季度还是要去走访一遍。张德庆常说，像爷爷和父亲一样为山区老百姓服务，是自己的责任，这一点他永远不会忘。

### 坚决不让老百姓多花钱

“乡村医生的工作看似简单，但实际上并非易事。”张德庆告诉记者，很多老百姓仍然是老观念：治病必须要打针，便宜药不如贵的管用。但他一直以来的服务宗旨是实事求是，不坑人也不糊弄人，能用便宜药一定不用贵的。为此，即便有老百姓不理解，他也坚持原则，通过疗效来说服患者。

张德庆说，去年一个干工程的小老板从县城开着轿车来看病，见只开了4块钱的药，拍着桌子大声说：“张大夫，你怎么给我开这么便宜的药？别糊弄我，我不缺钱！”但不到一个星期，这个人的病情就明显好转。“我看病开药都是按病情开，不是按钱开，坚决不让老百姓多花钱。”张德庆告诉记者，这样的行医理念，从他爷爷那辈儿起就一直坚持。

记者在现场采访的一天时间里，有近20个病人找张德庆看病。卫生室不收挂号费，不收门诊费，只收取最基本的药品费。不少前来看病的村民想输液，或是想多开些药，张德庆耐心给村民讲解用药原理，所开的药贵的几十元，最便宜的只有几块钱。

张德庆的真诚换来了乡亲们的真情回报。前年春天，因为村里闹流感，张德庆家里没顾得上种花生，准备去种时，发现乡亲们已经帮忙种上了。老家房子整修时，村里老少爷们都来帮忙，原计划4天的活，1天就干完了。“爷爷和父亲常嘱咐我，给人看病讲良心，能让人少花钱的就少花钱，这么多年干下来，理解我的村民越来越多，工作也好干了。”张德庆说。

### “医”脉相承踏上学医路

三代党员，三代从医，现如今张家的第四代依然在传承祖辈的传统。张德庆的女儿张维芝和儿子张维峰分别在大学里学习中医学和口腔医学。正值暑假，张德庆带着即将上大二的儿女走村入户，给村民查体。虽然专业知识还不及父亲，但两个孩子正努力向父亲学习，积累行医经验。

“现在张德庆的工作从原来的走村访户看病，转变成了更系统的公共卫生服



2017年，乡村医生张德庆的龙凤胎儿女考上医学类院校后，一家四代在家门口合影

务。”沂水县卫计局党委副书记类淑彬告诉记者，这些服务包括组织查体、提供家庭医生签约、定期走访重病患者等，这些工作在今后都需要补充“新鲜血液”，尤其是受过高等医学教育的“生力军”。张德庆的子女既有专业背景，又有家庭熏陶，以后如果从事基层医疗卫生工作，算是“医”脉相承。

张维芝告诉记者，不论是从医还是做人的准则，她都很佩服父亲。虽然很多时候很苦，但能够帮助别人就很快乐。张维峰告诉记者，记得小时候，不管村民多晚来家敲门，父亲都会立马起身给人去看病，这种精神值得他学习。谈及未来，张家的第四代回答很一致，“如果有机会，还要回家乡从事基层医疗工作，不仅要继承祖辈的医术，更要继承祖辈们的医德。”张维芝、张维峰说。

“从我爷爷起，我们家三代党员，三代从事乡村医生工作。现在我的子女学了医，也都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张德庆说，未来张家还要全心全意为山区百姓服务。采访行将结束时，张德庆唱起了当地人谱写的《乡村医生之歌》，“不畏路远不怕汗流，我们是最美的乡村医生，我们为乡亲守护健康，我们为健康中国增添荣光……”

# “握虎”之回春妙手

——记王德强

刘凤才

2015年，临沂电视台杰出人物大型访谈栏目《琅琊风云榜》，以一期“妙手仁心”的专题，向人们推介了临沂市中医医院的王德强。他是针灸推拿二科主任、副主任医师，临沂市针灸学会会长，临沂市中西医结合学会针灸推拿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东中医药大学兼职副教授。他干练利落，一身朝气，又透着沂蒙人的敦厚淳朴、真诚仁爱；事业上则如正中午的阳光照耀下的沃土，充满了勃勃生机而且已经有了许多丰硕的收获，在传承与发展祖国医学中的针灸推拿医术上，他用自己的一双“神如握虎”的回春妙手，成为一个突出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杏林才俊。

## 一、瑞士前国家安全部长向他竖起了大拇指

2011年4月，王德强依依告别家人和同事，乘坐远航飞机，飞往远在万





里之遥的西欧瑞士。他此行，是以一个中国优秀青年中医针灸推拿医师的身份，参加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与瑞士联邦的医疗合作项目，到瑞士联邦伯尔尼中医健康中心工作的，而且一去就是两年。

坐在远航的飞机上，王德强心潮如涌，对祖国医学的博大精深与迅速发展更是感慨万千。针灸与推拿，是祖国医学宝库中两大外治医术，尤其是针灸，更是中医的一枝千古绽放、世代飘香的奇葩，是我们中华民族发明的与疾病进行斗争的“独门绝技”。自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对针灸极为重视，对针灸之“神效”有了明确的认识，对针灸之术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将其作为主要的医疗工具与方法之一。现存最早、地位最高的中医经典《黄帝内经》中，多数章节在论及各种疾病的治疗时，几乎无不提到针灸的运用；许多章节又专门论述了针灸之术，并总结概括出了“九针”（铍针、员针、鍉针、锋针、铍针、员利针、毫针、长针和大针等针具及针法）、“五要”（五个关键）等，特别对以针治病者的思想、精神、道德等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科学、完整、严谨、缜密的针灸理论，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医学财富。而中医推拿又称按摩疗法，但它与一般按摩疗法不同：一般按摩只能作为各种辅助治疗的一部分，中医推拿则是从古代按摩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已经成为祖国医学领域中独立进行治疗的一种方法。它不但讲究手法，而且同针灸一样，还要循经取穴；既不用吃药、也不用其他医疗器械，仅凭医生双手、根据病情运用各种手法进行治疗，而且具有有病祛病、无病强身的功效。针灸与推拿适用范围广泛，疗效明显确切，其最大的优点是既不用消耗有限的自然资源、也无药物的毒副作用，既可保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又能以调整调动人体自身的体能和免疫力与疾病进行斗争，可谓一举两得，自然与人类双赢，是纯粹绿色环保、回归自然的治疗方法。随着人类社会与医学科技的不断进步，中医针灸与推拿治病的机理不断被现代科学所证明，其在人类防病治病中的作用和突出优势，也越来越引起世界医学界的瞩目。当医疗资源消耗、自然环境污染、人体免疫功能退化等问题越来越困惑人类社会的情况下，许多原来只信奉西医的医者与学生，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聚焦到了中医，集中到了针灸推拿上。目前世界上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把原来法律上规定针灸只能作为非医学治疗方式，列入了正式医学治疗方式。王德强为中医特别是自己所从事的针灸推拿而骄傲，更深知自己肩上的担子很重，责任很大。虽然自己只是众多出国工作者中的一分子，但是他工作的好与差、优与次，却直接关系到众多患者的健康与信赖，关系到中医在世界医学之林中好不容易树立起来的声誉与地位，关系到祖国的威望和影响。他更坚信，一定能够用自己的技艺与能力，让泱泱华夏文明古国的“神针妙手”在异国他乡大放异彩，夺目世界。

一下飞机，王德强顾不得浏览所有的风光名胜，立即心无旁骛、聚精会神、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

新鲜与犹豫，是所有世人对新面孔的第一普遍反映。中国人还特别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何况最讲究现实与实际的外国人。刚到瑞士，国外的同行和患者对王德强这位看着很年轻的“中医先生”究竟身怀何等绝技，还抱着看一看的态度。恰在此时，当地医院的一位医护人员因长期患有顽固性偏头痛，投医于王德强。她已经被这种毛病折磨了很多年，严重地影响着生活与工作，曾经多次就治疗，本国的不行找德国的，德国的不行找法国的，但是头疼一直不减。西医治疗主要是对症下药，服用的都是止疼药，再重了就用激素，虽然暂时缓解了疼痛，却带来了很大的副作用，尤其是药物时效一过，疼痛立即卷土重来，时间一久，不但形成了药物依赖，而且形成了恶性循环，真正是苦不堪言。王德强详细询问了其病情病史，结合西医检查的结果，进一步深入进行了诊断，最后考虑患者是由于颈椎寰枢关节半脱位及

小关节紊乱所导致的神经压迫性疼痛。他遂对症仔细分析，辨证取穴，利用针灸和正骨推拿，只治疗了10余次，患者的疼痛一天比一天减轻，感觉一天好过一天，最后头疼症状完全消失，整日紧锁的愁眉终于逐渐舒展开来。患者大喜过望，连声称赞中国医生技术高超，针灸推拿果然神奇，对王德强佩服有加。之后王德强对患者随访近两年，直到他离开瑞士，患者一直没有复发。患者本身是医护人员，王德强的技术水平与能力赢得了“圈子里人”的认可与信服，使他一下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名声不胫而走。

一天，王德强的门诊来了一位年过七旬的患者，一眼望去，气度不凡，但是气度却掩盖不住他眉头紧蹙、痛苦不堪的表情。原来，患者是大名鼎鼎的瑞士联邦前国家安全部长，专为寻找中国医生治疗肩周炎而来。这位老部长病情已经长达半年有余，其右肩已经严重“冻结”，运动极度受限，不要说举手致意、穿衣梳头，就是连举起一个小小的咖啡杯都如同力鼎千钧、力不能及，双手痛苦地颤抖着，好不容易举起杯子，却再也无法送到嘴边。王德强仔细检查了他的病情，告诉老人：请您放心，您的病能治好，需要的只是耐心与配合，老部长唯唯称是。然后，王德强运用无痛针刺、拔罐、中药“三管齐下”，开始精心地为老部长治疗。只用了一个月时间，患者的病情竟然得到了痊愈，老人兴奋地挥舞起右手，连连向王德强致谢，他与夫人一齐伸出大拇指连声称赞：“中国的大夫，中国的针灸，不但治好了我的肩膀，而且不用药物，没有污染，没有痛苦，比西医西药要好得多，Merci beaucoup! Merci beaucoup!”（法语，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王德强的名气越来越响，找他求医问药的外国人也越来越多。一次，他接诊了一位脊柱病患者，是位中学老师，也是瑞士国家射击队队员，患有脊柱关节紊乱，也被病情折磨了好长时间，一直在做西医脊柱矫正术，但是效果总是不理想。主治西医劝他在继续利用上午时间进行矫正治疗的同时，最好再利用下午时间找中国的针灸推拿师王德强先生针灸推拿治疗。王德强在检查了他的病情后说：“为了您的早日康复，我除了用针灸，还可以结合使用中医的正骨法给您治疗。”患者同意试一试。不料大出意外，治疗两次后，患者竟然停止了西医矫正治疗，只来王德强这里做针灸与正骨治疗。问其缘故，患者因为懂得一些运动医学，说：“你的中医正骨法与西医矫正法理论上似乎是一样的，但是感觉要比矫正法更合理更科学，治疗效果比矫正术要好得多。我在你这里一并进行针灸与正骨治疗，不用再跑两个地方找两位医生治疗，既省了跑路、省了时间，又省了钱，两全齐美，何乐不为？”时间不久，患者得以痊愈。虽为“洋人”，但他人情味很重、感恩观念很强，多次向王德强表示谢意，每到中国节日，还亲自动手制作明信片，写上祝福语，寄给王德强。

发达国家的工作人员，在享受着丰富物质生活的同时，却往往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快速的工作节奏、各种难以排解的矛盾，情绪与体力时常处于紧张状态，为此而引发的焦虑症、官能症、疲劳症乃至抑郁症等功能性疾病屡见不鲜。而中医在调节身心功能与精神状态、治疗抑郁方面，有着比西医西药更为有效而无副作用的优点。一位患有此类疾病的警官，找到王德强治疗。他问警官：“为什么不去看西医吃西药？”对方连连摆手，回答得很直接很实在：“不要提西药，我是吃得害怕了，越吃越依赖，越吃副作用越大，病没治好，都要中毒了。我是实在感觉不行了，才来找您治病的。”自此，王德强用针灸推拿等法给他治疗，时间不长其身心功能得到了很大改善，精神紧张、身体疲乏的感觉消失殆尽。他告诉王德强：“只要经过您的治疗，我就像获得了新生、换了一个人似的。”这位洋人也是“久病成医”。此后，只要工作一疲劳、精神一紧张，身体有不适，就赶紧预约王德强：“王先生，又得求您给我用针灸推拿彻底放松一下，来一次新的‘重生’了！”

在国外两年，王德强以自己的高度责任感、满腔热情与高超医术，让许多外国患者心身康复了，精神快乐了，但是他自己却时常经受着精神煎熬，反而快抑郁了。除了工作的紧张劳累、身体疲惫外，更重要的是一颗思念之心，一腔渴望之情。远隔大海重洋，在中国他有温暖的家，家中有温情的爱人、可爱的孩子，时时让他牵肠挂肚。国外的劳动、工作法律十分严格，看病也是要预约的。每到周末、假期，平时热闹繁华的大街上反而冷冷清清，人们都在家中或者户外尽情地享受。而他除了在宿舍中看看书看看电视，反而无所事事，百无聊赖，这让他更加思念家乡和亲人。有个朋友曾问他：“在国外最好的事、最痛苦的事分别是什么？”他用一句话作了回答：“好山好水——好无聊！”他也有规定享受的假期，本来可以如期归来亲人团聚。但是当他准备第一次休假时，一位中国同事却因患有心脏病需要回国治疗，请他替班留守。这自然是责无旁贷，他舍弃了自己的机会，毅然留下了。后来几次休假，也都因各位同事有事，他不断当了“替补”。结果两年时间，他竟然没能回一次国。两年中的亲情思念，经常让他彻夜不眠。有一次，在洋人过洋节的时候，他孑然一身，形影相吊，竟然三天三夜没合眼，眼前浮现的全是妻子孩子的身影，无论如何都挥之不去。他是医生，知道自己在精神上已经处于一种准抑郁病态，十分危险。更幸亏他是行家，赶紧自己给自己针灸调理，才使症状较快地得以缓解，坚持了工作。

王德强以自己的高超技艺与优质服务，为祖国医学特别是针灸推拿医术赢得了更大的美誉，为祖国医学更快更广地走向世界，为全人类带来福祉，贡献了一份有力的“正能量”。

## 二、瘫痪的“格林-巴利”患者向他挺起了身躯

王德强1972年出生于蒙阴县常路镇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学生时代，他最崇敬的村里人是他本家的一个叔叔。叔叔是位农村医生，勤勤恳恳地为百姓看病治病，常常只凭手中的几根针，就能给乡亲们治好头疼腹痛腰腿疼等毛病，这让王德强感到很神奇，也很羡慕。



1990年，王德强初中毕业，他没有继续上高中，而是直接报考了中专，考上了曲阜中医药学校针灸推拿专业。

毕业之前，他来到当时的临沂地区新医医院实习，就是现在的临沂市中医医院。在这里，他认识并崇拜了针灸科的赵洛匀主任。赵主任医学精道，经验丰富，教给了他许多在学校学不到的东西，包括医德医术。比起赵主任，他觉得自己在医道上还是“小儿科”，心中不由得充满了崇敬，于是下决心向老师虚心学习，力争早点儿历练出些真本事。有了这种态度与决心，他进步很快。时间不久，那根原来在他手中还不太听摆布与指挥的小灸针，就慢慢变成了一根小小的“如意金箍棒”，有了些神通。赵老师见他悟性又很用功，心里很高兴，对他很看中，记住了这个青年人。

1993年，王德强毕业，正式进入临沂市中医医院工作。由于当时针灸科里似乎并不缺人手，最早便把他分到了麻醉科。学到的东西用不上，用得着的技术不专业，这让他很失落很困惑。也恰在此时，赵主任知道了王德强来到本院工作的消息，问他：“到了这里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老师又很有权威与影响力，把他要到了针灸科，干起了学以致用用的专业。他对老师充满了感激，更加下大功夫，勤奋学习，努力钻研，积极工作，热情服务，生怕辜负了老师兼领导的希望，一定要干出点样儿来，给老师争光。

当时市里一位很重要的领导同志因腰疼来院治疗，院里决定由王德强负责。一般地讲，人们总认为医生最好是有一定实践经历的，太过年轻，似乎意味着知识的稚嫩与经验的不足。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市里的领导同志对王德强却十分满意，多次在院领导面前赞扬有加，这给了他很大的鼓励。之后，院、科领导经常让他参加全院骨关节疾病的会诊，把一些重要的治疗任务交给他，他也十分珍视这种信任，当成自己向老医生学习的极好机会，进步更快。

2006年，王德强到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的岳阳医院进修，师从中华中医学学会推拿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沈国权教授，深入系统地学习中医正骨推拿技术。得到先生的真传，让他感到十分幸运。他抓住难得的学习机会，全神贯注地观摩老师的操作示范，认真仔细地加以体会，时间不长，手法就渐趋娴熟，沈老师对他的悟性与刻苦大加赞赏。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石学敏，是王德强开始从医时就在心中崇拜的偶像，特别是大师的“醒脑开窍”理论与技术在治疗中风偏瘫后遗症上，有着独到优势与肯定的效果。十几年来，他认真地学习钻研这一医术，经验日益积累，体会日益深刻，深得大师青睐。2015年，在院方推荐与主持下，王德强正式拜石大师为老师，成为大师的入门弟子。

人类疾病，从大的范畴上可分为两类：器质性疾病与功能性疾病。器质性疾病，大多可通过西医的各种治疗措施、手段与药物加以治疗，有的可以收到立竿见影之效。而功能性疾病包括免疫功能、生育功能、消化功能、循环功能、神经功能、运动功能等疾病，则往往因其病因的复杂多样、病情的迁延缓慢等，治疗不可能一蹴而就，所谓“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西医往往显得力所不及，而中医包括内治、外治尤其是针灸则表现出特殊的优势与功效。临床20多年来，王德强在此方面，特别是在一些疑难重慢病症治疗上，取得了显著成效甚至是突破。下面这些医案治例，可见一斑：

——让瘫痪的“重症格林-巴利综合症”患者站起来。此病又叫“急性多发性感染性神经根炎（GBS）”，是一种不明病毒感染导致的神经系统疾病，虽然发病率不是很高，但是一旦发病，就会导致肌肉进行性萎缩，肢体瘫痪，治疗就很困难。如果病情严重发展，可导致患者呼吸肌麻痹而引起死亡，而且病死率很高。西医主要强

调病因治疗以及脱水治疗、营养神经等对症治疗。中医将该病列入“痿症”范畴，认为其主要病因是由于暑热、湿热，病机乃湿热侵淫经脉，筋脉弛缓，日久伤及肝肾脾三脏，致使精血亏损，肌肉筋骨失常。早在十几年前，王德强就接治过一例50余岁的女性患者，发病已经月余，由于基层医院的误诊，治疗不当，来市中医医院就诊时已经四肢瘫痪，由家人抬着来的。王德强按照中医“治痿独取阳明”的治则，对其取穴针灸，并辅助以中药和西医神经科疗法，仅仅两个星期后，病人的病情就得到了有效控制，两个月后得以顺利康复，这位瘫痪了数月的患者热泪盈眶，用刚刚能够站立起的身躯，给王德强深深地鞠了一躬。无独有偶，王德强在瑞士工作时，也接治了一位同样患者。病人是一位年仅30岁的青年，虽然经过西医治疗，控制了病情发展，但是却难以痊愈，整日四肢无力，极度疲惫，动作十分吃力困难。因长期受疾病折磨，患者的心理也受到极大影响，整日萎靡不振，默默不语，神情沮丧，精神抑郁，几乎失去了生活信心。王德强一方面鼓励病人坚定治疗信心，一方面用中医针灸等法为其治疗，三个月后，患者身体状况终于有了显著起色，肌力基本恢复，行动自如如初，同时精神状态也为之一振，一改抑郁，谈笑风生，重拾生活信心与快乐。

——让几次想自杀的重度抑郁症患者扔掉了药袋子。王德强曾经接治了一位同业内女性重度抑郁症患者，因家庭、工作等原因，钻了“牛角尖”，陷入了精神困境甚至是绝路。虽然经过西药长期治疗，但一旦停止用药，就再次发作，她曾经三番五次想自杀了事，幸亏家人及同事们及时发现才得以挽救。王德强按照中医对此种疾病的认识与治则，实行辩证施治，以疏肝理气、活血化瘀、清心补肾等为主，于肝、心、脾、肾经轮流取穴进行针灸，同时辅以原来的西药治疗，两星期后，其病情大为好转。在中医针灸治疗的同时，逐渐减少西药用量。两个月后，病人痊愈。

——让40多年的顽固性便秘患者得以痊愈。而老年功能性便秘，是一种常见多发病，也是困惑与折磨广大老年人的顽疾。王德强在用针灸治疗此病上，也积累了丰富经验，为无数老年患者带来了福祉。他曾接治过一位年过六旬的特殊女性患者，自年轻时就患上了功能性便秘，土法洋药用了吃了不计其数，40多年没有治愈，而且越到晚年越是严重，每次只能靠开塞露通便，不仅给身体健康带来严重影响，而且给日常生活造成了严重不便。加上病人同时患有高血压症，由便秘造成的疾病风险更大。王德强用针灸法，每周只需针治两次，治疗一个月后，患者症状就大为改善，两个月后，大便完全恢复了正常。老人一身轻松，喜不自禁，连声道谢。

——让多年的哮喘病患者不再惧怕寒冬。在用针推等治疗疾病的同时，王德强根据中医方剂，也同时活用传统方法治疗其他病患。如在治疗常见呼吸道疾病特别是其中的顽症哮喘病上，他采用“穴位贴”（三伏贴）治疗方法，辩证选穴，贴敷上药贴，两小时后即可取下，每伏一贴，方便经济省事省劲，但是疗效显著。电视上对此作了推介后，患者蜂拥而至。仅2015年夏天，他们就以此法治疗了3000多人。一位80多岁的顽固性哮喘患者，每年最怕的就是过冬天，天气一冷，其病必犯，一个冬天就只能在不上气不接下气的喘息中挨活着。自从用了一季的三伏贴，这年冬天再怎么提心吊胆，哮喘病就是不再发作。

20多年来，王德强结合自身临床经验，在针灸推拿治疗技术上，不断取得了一些突破和突出的成绩，在骨、内、外、妇、儿、神经等各科疾病治疗中，都取得了显著或者较好的疗效。如运用中医正骨推拿手法治疗各种类型的颈椎病，运用针、推疗法治疗颈性眩晕、偏头疼、神经根型颈椎病方面疗效独特，在治疗腰椎间盘突出、面瘫、肠胃疾病等方面也有较好效果。在运用小儿推拿、小儿足部按摩治疗小儿腹泻等疾病方面，在治疗妇科不孕不育、月经不调等方面，也都有自己独特的优点。特别在运用院士石学敏老师的“醒脑开窍”针灸治疗各型中风后遗症上，都取得了很好的临

床效果。他总结自己临床经验，先后在省市级医学刊物发表论文数篇，出版医学专著两部，获得市级科技进步奖4项，并于1996年获得由省卫生厅和团省委授予的“山东省青年岗位突击手”光荣称号。

### 三、轩辕大帝向他寄托着更大的担当

自从学习中医，读过《内经》，对我们华夏伟大祖先、中医开山鼻祖充满了敬仰之情的王德强，就牢记着轩辕大帝的那个期待：要使针经、针法、针技“万世不绝”，世代相传，直到永远。王德强虽然不是医院与卫生系统的行政领导，虽然前面还有很多前辈与老师，但是作为华夏后裔、杏林未来，对继承弘扬祖国医学，造福人类，他义不容辞，责无旁贷。他脚踏实地地干好眼前的工作，又不断思考着国人健康与中医事业的“深、远、新”等重要问题。

2013年，王德强回国，踌躇满志、信心百倍，要把针灸推拿这一中医事业弘扬广大，服务国人。当时临沂北城新区建设已经初具规模，各小区居民陆续入住。新区规划时，由于条件所限，市中医医院没有考虑在新区建新院或者分院。王德强积极主动地建议领导：可以在新城区建立一所标准化的国医堂。王德强的建议与领导的设想不谋而合，很快采纳了他的建议。深信他的院领导委他以重任，从“国医堂”选址、筹建到开业，他全部参与其中。通过积极努力，终于在已经高楼林立、“寸土必争”的新区谋得了一片天地，建立了一所“国医堂”。王德强被委以副主任的重托，负责基本设施建设与诊疗业务。国医堂实行全日诊疗，中医医院的专家们，每天轮流到这里坐诊，候诊厅经常是座无虚席，患者盈门。为了保证“国医堂”这块牌子，王德强每天忙得不可开交，经常是早出晚归，周一到周末，从来无闲暇。

新城有了国医堂，王德强又把目光盯向了广大基层特别是农村基层，这也是他一直挂在心中的一件大事。他多次向市卫计委和院领导提出充分利用国家大力扶持发展祖国医学的政策、为基层医疗机构培训人才的建议。并主动提出，国医堂可以利用自己的优势与条件，办成一处培训基层人才的基地，免费为基层各医疗机构分期分批地培训针灸推拿人才。他的建议得到了领导的充分肯定和认可，而且他也正在着手



准备实施这一计划。

关注、关爱一下代的健康与成长，关心祖国的未来，也是他心中的一件大事。在临床上，王德强经过对众多少儿和中学生患者的检查与诊断，发现了一个普遍而严重的问题：多数小患者都是颈椎出了问题，皆是由于作业任务太重，更加上现代社会“低头一族”看电脑、玩手机等不良现象已经发展蔓延到了下一代，导致了他们小小年纪就使颈椎负担过重、超负荷使用，造成了肌肉韧带劳损或者是小关节紊乱等问题而产生的病症。治疗这种病，对王德强来说，是经验丰富、举重若轻，几次针灸加上正骨治疗，就可以使之痊愈。但是，如果提前宣传预防、及早干预治疗，就可以防患于未然。既然国家早就把保护视力等健康保健列入了学校的教育内容，为什么不能把检查、保护学生颈椎这样的内容也列入各级学校的健康普查、教育内容呢？他忧国忧民忧孩子，忧思忧虑忧责任，正在不断把自己的设想通过各种渠道，向人们做宣传，以期引起社会的重视，变成未来的现实。

笔者在与王德强交谈时，他还谈了很多自己的设想，都是关系到国民健康、中医事业发展、针灸医疗的推广等等的“大动作”“大梦想”。我深深被他的责任意识、超前意识、忧患意识、发展意识所感动，半开玩笑地说：“您不但是一个优秀的医生，如果参政，可以当一个分管卫生的大行政长官了！”他却很认真地对我说：“古人早就讲过，宁当良医，不为良相，如果能为国人健康、祖国医学的发展做点贡献，我就心甘情愿、心满意足了！”

轩辕大帝，我们华夏儿女的祖先，您大可以放心。

市史志办召开中央巡视组反馈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9月6日，根据市委统一安排，市史志办党组召开中央巡视组反馈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会议由市史志办党组书记、主任刘志强主持，市纪委监委驻五组副组长宁丽到会指导，市史志办党组成员段洪、唐少清、于芹参加会议。

《临沂市志（1995—2010）》第三册志稿评审会召开。9月11日，《临沂市志（1995—2010）》第三册志稿评审会召开。会议由省史志办副主任李刚主持，省政府办公厅党组成员、省史志办主任刘爱军，临沂市政府副市长张玉兰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史志办相关处室负责人，省修志业务专家咨询组部分成员，市史志办及各县区史志办有关人员参加会议。其间，临沂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庆斌会见了刘爱军一行，并就史志工作进行了充分交流。

《临沂市兰山区志（1995—2013）》志稿评审会召开。9月11日，《临沂市兰山区志（1995—2013）》志稿评审会召开。会议由市史志办党组书记、主任刘志强主持，省政府办公厅党组成员、省史志办主任刘爱军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史志办副主任李刚参加会议。

《临沂市河东区志》志稿评审会召开。9月18日—19日，《临沂市河东区志（1995—2012）》志稿评审会在河东区召开。会议由市史志办党组书记、主任刘志强主持，省史志办副主任李刚出席会议并讲话。

市史志办召开方志馆布展工作推进会。9月13日，临沂市方志馆布展工作推进会召开。会议由市史志办党组书记、主任刘志强主持，市委党史委原副主任刘兆东，方志馆负责人及布展设计人员参加会议。

市史志办到郯城县调研督导年鉴

工作。9月13日，市史志办副主任段洪一行到郯城县督导年鉴编辑工作。

市史志办领导班子参加廉政教育活动。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党委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目标要求，加强廉政警示教育，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and 反腐败斗争9月17日，市史志办副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到市廉政教育馆参加了廉政教育活动。

《罗庄区志（1995—2013）》志稿评审会召开。9月10日，《罗庄区志（1995—2013）》志稿评审会召开。会议由市史志办党组书记、主任刘志强主持，省政府办公厅党组成员、省史志办主任刘爱军，临沂市政府副市长张玉兰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史志办副主任李刚参加会议。

沂水县史志办开展史志成果进新华书店活动。8月31日，沂水县史志办到新华书店开展史志成果“六进”活动。沂水县史志办向县新华书店赠阅了价值近2万元的《沂水县志》《沂水年鉴》等部分志书、年鉴，并在县新华书店开辟了沂水史志阅读区。

平邑县史志办向平邑一中校史馆赠送志书。9月13日，平邑县史志办向平邑一中校史馆赠送了《沂蒙革命根据地志》《平邑年鉴》《蒙山文化丛书》，以及《蒙山文化研究》杂志等一批书刊。

临沭县史志办到东营国家方志馆黄河分馆参观学习。近日，沂水县史志办与沂水县科学技术协会开展史志成果“六进”活动。此次活动，沂水县史志办向县科协捐赠了《【康熙、道光】沂水县志》《沂水县志（1991—2008）》《沂水年鉴》等志书、年鉴，并在县科协开辟了“史志阅读区”。

平邑县扎实做好《平邑县志》评审后修改工作。《平邑县志（1989—2013）》评审会召开以后，平邑县

史志办采取切实措施，对志稿进行精雕细刻，在提高志书质量的前提下，力争尽早出版。

《费县年鉴（2018）》出版发行。近日，《费县年鉴（2018）》正式出版发行。

《费县年鉴（2018）》约88万字，共设21卷，在延续上年编纂框架的基础上，内容作了进一步优化调整。

平邑县63个农家书屋有了“史志专柜”。2018年以来，平邑县史志办公室向县内条件较好的村级农家书屋赠送史志书籍，建立“史志专柜”。截止目前，已在63个农家书屋设立“史志专柜”。

《沂水县乡村医生志》研讨会在沂水县院东头镇召开。

莒南县史志办开展“慈心一日捐”活动。

沂水县史志办开展史志成果进科协活动。

沂水县召开《牛岭埠村志》发行座谈会。